

■ 高等教育

应用型高校“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案例研究

——西安欧亚学院的实践与思考

胡建波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以学生为中心”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高校转型的重要衡量维度之一,但高校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面临外部非支持性政策环境与自身不完全具备范式改革条件的现实困扰。基于西安欧亚学院的案例研究,应用型高校从“传授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型需要具备四个关键要件,即政策环境支持与高校领导者价值观的引领,系统规划设计与全面探索相结合,审慎把握和确定学生学习目标,保持教师队伍高成长性、高成本投入与资源基础的平衡。

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 应用型高校; 范式转型;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2022)01-0001-13

“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ness)的本科教学改革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随后“以学生为中心”理念逐步得到全球教育界的认可,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显著趋势。在我国,“以学生为中心”已成为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方向,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衡量维度之一,高等教育应彰显“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1]。“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虽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但尚未在高校办学实践中得到全面落实,学生的学习动力、学习投入、学习效果并未获得整体性提升。与此同时,应用型高校开展“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还面临内外部环境的条件约束和现实困扰,需要系统化构建转型实践体系并寻求突破路径。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是高校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高校的转型与改革都应从有利于学生“学”的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并通过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和非正式学习活动

予以落实。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从2006年开始实施,迄今已开展了十五年,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方向和定位,也基本完成了校园环境在教学条件的建设,专业教学和课程改革还在路上。笔者从亲历者、实践者的视角,对学校推行的“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理论、“新三中心”原理和范式转型理论,探讨我国教育政策环境下应用型高校“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实践框架、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笔者期待与“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研究者、实践者进行交流,并得到他们的指正。

一、“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概念框架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及内涵

1952年,卡尔·罗杰斯首先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

收稿日期: 2021-12-30

作者简介: 胡建波,男,陕西西安人,教育博士,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者开始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理念，引发了本科教育基本观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的系列变革，对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了“以学生为中心”本科教学改革运动。欧洲学者关注和研究“以学生为中心”同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欧洲学者兰德和金尼斯出版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指导》一书，首次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概念。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并提出具体要求，即国际高等教育决策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注的重点，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该要求有两层含义。一是关注学生需求。这代表了教育理念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二是如何关注学生的需求，让学生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所谓参与，并非简单地听取学生的意见或以学生个人喜好来改造教育模式，而是要让学生以主角身份整体、全程地参与教育改革，包括教育目标设置、教育过程实践和教育结果评价，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他将获得什么，如何有效达成教育目标以及如何衡量学校教育的成效。

1999年欧洲启动了博洛尼亚进程，不仅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而且通过系列行动路线提供了政策和工具上的支持^[2]。如要求欧洲大学基于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课程设计、开展学习评价；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对学生的学习和课程工作量进行学分的累计和互认，其中学习成果以及与其相关的工作既包括课堂学习，也包括学生课外自学以及实践活动等^[3]。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关注学生的学习及其成效是教学的中心工作。2010年，欧洲学生联合会（European Students Union）正式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概念，指出它既是特定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观念和文化，又是由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支撑的一种学习方法。在师生交流互动中，通过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学习，把学生看作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等可迁移能力^[4]。

我国学者涉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领域的学者在介绍国外先进的外语教学方法时引入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提法。笔者将“以学生为中心”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得出2000年以前发表的成果为293篇，再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其中与外语教学相关的文章高达119篇，且这类文章发表时间越早，占比越高。这可能与外语教学领域的学者更容易接触国外前沿教学思想有关。2000年之后，国内学者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从引进、介绍到独立研究都有涉及，但内容主要集中在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层面，学校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等系统视角的研究较少。这大概是因为“老三中心”（教材、教师、教室）和“新三中心”两种范式的主要差别在于课堂教学模式不同^[5]，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的重心是课程教学设计。

赵炬明教授开展的“以学生为中心”本科教学改革系列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他提出了“新三中心”理论，认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它们分别回答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下的教育目标、过程和结果问题。“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指的是基于学生当前状态和阶段性特定发展任务，发掘学生潜力，促进每一位学生全面发展；“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指的是在所有教育活动中学习是中心，学生应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指的是把学习效果作为判断教学和学校工作成效的主要依据，重视测量和反馈在学习中的作用，并建立有效的及时反馈机制^[6]。“新三中心”理论形象地表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特征，与“老三中心”理论相比，更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

范式是“以学生为中心”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涵，由巴尔和塔格于1995年在《从教到学：本科教育新范式》一文中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仅限于教学活动的局部改革，而是一场范式转型，新的教学范式需要系统层面特别是学校体系的支持，否则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7]。

范式概念的提出明确了“以学生为中心”

改革的性质和范围，将“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称为一场范式转型更能说明其方向性和系统性。所谓范式转型，代表着三个层面的系统转变。首先是理论基础的转变，“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不是对“传授范式”的修正或拓展，而是建立在一套全新的哲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的教学模式，“传授范式”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8]，“以学生为中心”范式则以认识论哲学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支撑。其次是教学活动重心的转变，由“老三中心”转变为“新三中心”，从注重教师如何“教”转向关注学生如何“学”。再次是组织系统的转变，现有学校制度和结构都是围绕传授模式组建起来的，落实“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需要从整体上对学校的组织系统进行调整和变革，构建一整套新的生态系统来支撑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赵炬明教授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概括为七项内容：“以学生为中心”观念、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技术支持和资源配置、学校行政管理、学校文化，以及外部影响因素——社会环境。“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源于教育教学观念的转变，观念的改变引发教学活动的变化，为促使更多教师持续坚持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需要管理、技术、资源、文化方面的保障。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 2012 年年会上，国内教育学者围绕“以学生为中心”展开了深入讨论，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如教育者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改进教学方法，重视教师培训和课程建设，建立学生学习指导支持系统，匹配相关管理制度，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文化，以及加强政府政策的引导等^[9]。这些建议同样符合“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三个层面系统转变的要求。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政策演变及其影响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政策演变及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语境中没有“以学生

为中心”这一概念或术语，而是采用“立德树人”“育人为本”“学生为本”等具有实质等同含义或相关、相近的表述。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大致经过全面重建（1978—1991 年）、结构优化（1993—1998 年）、规模扩张（1999—2010 年）、内涵建设（2011 年以来）四个阶段的变迁^[10]。从政策文本中可见，“以学生为中心”的相关表述主要是在“规模扩张”“内涵建设”两个政策演进阶段逐步出现的，大致分为理念导入、影响扩散、走向应用三个阶段。

1. 高规格政策文件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导入

随着高校扩招和学生规模的急剧扩大，经费保障、教师资源、教学投入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高等教育质量开始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作出“把高等教育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重要决策。2007 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启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拔尖创新人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等“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开始受到关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合格人才，同时也要关注学生个体发展。这是我国首次从宏观教育政策和战略层面明确提出“教育既是国计也是民生”的理念，阐明教育的基本功能涵盖国家大计和民生福祉双重含义，使得长期以来教育工具化的单一功能定位得到延展，体现了“学生为本”的高等教育改革取向。《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育人为本”的工作方针：“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11]纵观各种政策文本，这段话是与“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和内涵最为接近的表述。所以，《教育规划纲要》是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引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战略走向和高校办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1年4月，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注重更新教育观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和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和系统培养观念。^[12]”此次讲话从思想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环境的转变，也是高校办学方向的重要指引。

2. “以学生为中心”在多元化政策供给中时有提及，影响有限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以提升质量和内涵发展为主线，相继出台了有关创新创业教育、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双一流”建设、产教融合、审核评估、教育评价改革等综合专项或改革政策文件，政策供给较为丰富，多元化特征较为明显。整体来看，“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及其相关举措在这些政策文件中时有提及，但并不连贯、持续和稳定，说明“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导政策和主流价值导向。但这些综合或专项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推动“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发展与应用。

尽管2010、2011年的高规格政策文件中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相关表述，但之后几年都没有相关政策文本大张旗鼓地倡导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直到2018年，随着“以人为本”“四个回归”政策导向的提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甚至课堂教学质量成为关注的热点，“以学生为中心”的表述再次进入政策文件，并有了更大的应用力度。

3. “以学生为中心”融入教育教学标准，进入发展与应用新阶段

2018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在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学生中心，全面发展。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既注重‘教得好’，更注重‘学得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同时在工作部署中提出“推动课堂教学革命。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通

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积极推广小班化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大力推进智慧教室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该文件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工作部署中都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和内涵，并使用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表述，表明“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发展和应用进入新阶段。

与此同时，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改革也开始在专业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中得到重视。2018年教育部发布我国首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突出三大原则，即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标志着“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已从国家教育政策层面转变为全国高校开展专业教学和质量建设的主要指导原则。

综上所述，一方面，“以学生为中心”从理念引入到政策表达再到发展与应用，与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主题和内涵式发展重点相伴随，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渗透和融入的过程；出现频次越来越高，对高校办学和教学改革的指导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话语体系中处于非主导地位，“以学生为中心”相关政策表述主要集中在抽象的理念、指导思想原则层面，以及微观的专业和课程教学层面，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高等教育的单一价值取向已逐步趋于多样，但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改革逻辑与高等教育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行政管理逻辑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有机体。尽管与“以学生为中心”改革密切相关的专业与课程教学、教师发展、管理体制都有持续的政策推动，但面向学生的学习系统建设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政策环境及其对高校转型的影响

当前，我国高校推行基于“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范式转型处于非支持性政策环境中，主要表现在宏观治理与管理体制和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导向的高等教育宏观治理与管理体制，对“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需求导向和价值理念的建立与传播形成了制约。从公共治

理角度分析，美国和欧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改革历程与西方国家政府接受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有着密切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市场机制和客户意识，以改善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13]。加拿大教育学家史密斯认为，“市场化是一种组织导向，把顾客置于决策过程的中心，它可能引发高等教育文化的转型”，“高等教育市场化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根据顾客的要求提供合格的高等教育，其必须综合考虑所有顾客和赞助者各式各样的需要，为其提供满意的高质量服务”^[14]。当然，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治理具有准市场化特征，即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计划管理机制发挥辅助性作用。

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是一种双重体制下的类市场化治理模式，在高等教育管理和资源配置方式上既发挥着行政体制机制的作用，又发挥着市场体制机制的作用。不同于准市场化机制的是，双重体制中由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它决定着在高等教育中是否推行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在哪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推行和运用市场机制^[15]。高等教育缺乏准市场化机制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高等教育准市场化程度决定高校获取资源的途径，如果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改革就不会为高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优势，高校也会因此缺乏开展大规模改革的动力；二是对于实施“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高校而言，如果学生无法“用脚投票”，就不能通过市场竞争与客户选择来检验改革的成效，外界也无法认识和判断改革的价值。纵观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政策的重大改革实践，如项目治教、管办评分离、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社会第三方评价、建立政府高校新型关系，都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逐步走向准市场化。只不过建立高等教育的准市场化环境是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这也使得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必要之举。

二是资源投入导向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实施“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要求不相匹配。我国高校教学评估始于20世纪90年代，

从参与范围、影响效果来看，水平评估、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是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评估形态。2003年教育部实施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有效提升了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政府和高校对教学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被评估高校的办学条件、教学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其不足在于价值取向较为单一，评估标准过于刚性和重视教学条件、资源等硬件投入，不利于高等教育多样性、特色化发展^[16]。2011年，教育部启动了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并强调三个基本，即“办学条件基本达标、教学管理基本规范、教学质量基本保证”，“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开始在评估指标中有所体现，质量评价向“两个满意度”即学生对学习效果满意度、用人单位对高校培养人才质量满意度转变。但合格评估的定位和目标决定了其指标体系仍以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基本管理和基本质量保障为重点，侧重学校办学水平的指标建设^[17]。审核评估的对象是通过水平评估和合格评估的高校，第一轮（2013—2018年）已结束，第二轮（2021—2025年）正在开展。与水平评估和合格评估相比，审核评估倡导“学生中心”“成果导向”和“持续改进”三大理念，第二轮审核评估实施方案还将“学生中心”作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主导要求，并将学生发展设置为二级指标，在课堂教学改革的三级指标中也明确要求“以学为中心，以教为主导”。但审核评估的内涵依然限定于教学工作，未将人才培养全过程纳入其中；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反映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行为的即时动态数据较少，目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特征还缺乏相应的审核要点和数据指标支撑；学生、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也不够^[18]。可见，资源投入型质量观在高等教育评估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学生为中心”作为评价尺度的规制性、约束性有限，对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指引与带动作用较小。

总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与制度环境并不优先支持高校进行“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与改革。邬大光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大学转型的困境就在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之“型”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些根植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

式仍留存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并对当前大学转型形成明显的牵制作用^[19]。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高校转型发展更具行政导向和功利化倾向，更为关注学校发展而不是学生发展，更多是提供者导向而不是需求者导向。

三、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实践探索

（一）转型历程与整体框架

西安欧亚学院创办于1995年，先后经过了创业与规模扩张期（1995—2000年）、规范发展期（2001—2006年）、战略转型期（2007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是学校战略转型阶段的发展主线和主要特征。2006—2010年是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导入和办学方向探索期，最终形成了基于“以学生为中心”价值导向的战略规划和办学目标，为学校转型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方向指引。2010年学校第三次教学工作会议召开后，全面推进教学改革和教学模式转型，基本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框架，主要思路是“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和生活质量”，从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师发展、学生事务三个方面深入实施改革，同时也开展了内部授权体制改革、管理体系优化、教学信息化与学习系统建设、校园环境与服务空间改造等支持系统的建设工作，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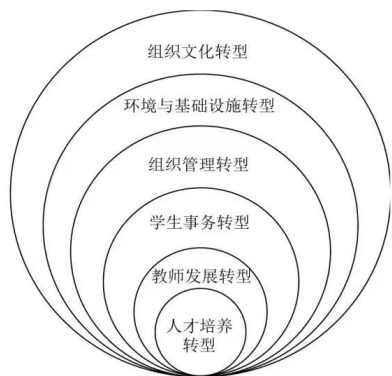


图1 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管理体系与支持系统改革在先，教育教学模式转型在后，与“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理论框架不完全一致。

经咨询赵炬明教授，他认为这与学校的具体情境有关，属于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不一致的问题，是正常现象；行动次序可以有差异，但结构上不能有缺失。

（二）转型实施

1. 以战略规划为先导

西安欧亚学院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融入学校战略规划，历经“2006战略”“2007战略咨询”和“四四二”战略（2008—2012年）三次演进，最终构建了包含“质量、经营、声望、组织与管理体制、信息化建设”五个主题的战略框架^[20]。前三者为战略任务，后两者为战略支撑，其中的质量战略重在全面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该战略框架是在持续行动和反思中形成的，具有“行动反思模式”特征^[20]。

2.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第一，学院与专业调整。遵循“专业依托行业”的原则，从原来以学科划分学院转变为以产业划分学院，陆续完成了专业归属及二级学院调整。这一调整旨在通过学科专业组织体系重构，来建立稳定的行业、产业对接机制，从而落实应用型办学定位。学校根据行业、产业需求论证设置新专业和动态调整已有专业，建立了专业设置“漏斗”模型，为构建专业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2012年，学校首次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之后于2016、2020年再次进行大的调整。三轮改革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贯穿了“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并逐步整合与细化，每一轮改革都是一次系统性的完善与持续改进。比如，2012年的修订重在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投入度，并注重通过产学合作来培养人才；2016年的修订重在加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同时提出人才培养方案要为学生提供清晰的学习地图；2020年的修订明确提出设置高挑战度的认知能力学习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促进其学习投入。

第三，课程体系重构。将课程整合归类为专业知识、通用知识、专业能力、通用能力、专业素质、通用素质六个模块，根据行业需求与企业联合开发模块课程内容，并在课程大纲中增加

学习成果评估的内容,实现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和学习效果的一体化设计。课程体系设计采用教学“矩阵对应表”,各级教学目标相互支撑。为提升教学全过程质量协同和基层教学组织能力,创立了课程小组制度,增强课程开发、设计与教学实施的团队力量,学校匹配支持政策与激励政策,向课程小组赋权。

第四,教学方法改革。学校转型伊始就建立了卓越教学中心,开展“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和教学范式的培训,专职教师培训覆盖率达80%,促进了布鲁姆法则、项目学习等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普及与应用。此外,将非正式课程和学习活动作为重要学习单元,每周三下午设为“无课日”,由社区、社团、二级学院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融入社会和职业环境。

3. 教师发展转型

在学校发展的早期阶段,师资队伍建设面临中青年骨干教师不足、高层次人才和“双师型”教师短缺等问题。进入战略转型期后,教师队伍的视野、观念、素养、能力与“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和范式转型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受制于资源约束的现实,学校注重教师队伍建设的长期性与高成长性,逐步缓慢地优化教师数量与结构,并把教师培训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和“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方向。2010年,学校开始与美国杜肯大学合作开展为期五年、面向全体教师和领导干部的“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范式培训。之后,逐步建立教师发展体系,针对不同类别教师分层制定培养地图,对处于不同能力层级的教师设计包括提升管理能力在内的特色培训内容。同时,注重通过挂职锻炼、产学合作、企业咨询等支持机制,提升教师的专业与实践水平。

4. 学生事务转型

建校初期,学校的办学层次以专科为主,学生事务的主要职责是严抓纪律,保证安全稳定。随着升本、生源结构变化以及“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提出,2006—2012年学校进行了学生事务从强调严格管理转向基于学生发展与面向学生服务的第一轮改革。但总体而言,这个阶段学生事务工作的专业化程度欠缺,强

调促进学生发展的理念不够落地,与教育教学结合也不够紧密。学校经过大量实地调研,发现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英、美等国的一流高校,学生事务独立于学术事务成为一个专业化领域,并且以学习驱动为特征。以此为基础,结合标杆经验,2013年学校开始探索和推行学生事务社区制改革,先后成立了德鲁克、孔子等八个青年社区。社区内的学生跨专业、跨班级住宿,以便他们相互了解与合作。

社区制改变了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被动接受管理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也打破了依赖行政班级管理学生事务与开展学生活动的组织形式,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二级学院与社区难以协同、学生缺乏适当的外部管理压力、学生的时间资源被条块化分割等问题。基于此,2019—2020年,学校对社区制进行了适当回调,强调将学生管理、学生发展和学生服务三者相融合,适度强化班级行政管理力度。这项措施带来的启示是,欧美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较为领先,但未必适应我国高校的具体情境和学生特点,借鉴“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经验要实事求是,注重在地化和适应性问题。

5. 组织与管理体系改革

第一,以授权为核心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将人事、财务、教学管理等权力在学校和二级学院之间重新分配,同时要求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导向转变为支持和服务二级学院,实行管理重心下移。

第二,战略分解与绩效管理体系。战略分解过程遵循“理念—策略—行动—结果”的逻辑链条逐一展开,其中融入绩效管理与考核流程,包括学校绩效、部门绩效、个人绩效三个层面,每个层面构建PDCA管理闭环,重在即时反馈、持续改进并形成多样化激励。

第三,基于波多里奇质量奖准则的二级学院管理机制。引入波多里奇卓越绩效准则并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此为框架设置二级学院绩效目标,引导二级学院以客户为导向追求卓越。

西安欧亚学院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有一半的人具有EMBA学习背景,超过60%的中层正职管理干部拥有MBA学习背景,他们所具有专业化的管理思维和方法为推动学校组织与管

理体系的改革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6. 校园环境 with 基础设施转型

第一, 校园环境与学习空间改造。基于“办百年名校”的目标, 学校早期的校园建设做到了高起点、高标准。引入“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后, 提高学生生活质量、打造学习空间和育人环境, 成为校园建筑与环境改造的主导原则。在学生公寓楼周围建设“大学生客厅”, 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空间和生活服务空间。每个二级学院的教学楼均按照学科专业特点和学习活动需求进行设计, 以营造全面支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的物理学习空间。校园的每处空间都考虑人的舒适性感受, 同时采用绿色环保材料, 践行绿色理念。

第二, 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以承担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项目为契机, 持续建设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综合管理平台、支撑卓越教学中心的网络教学平台以及提升学校组织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支撑平台, 形成了教育教学信息化服务体系 and 可行的教育教学改革模式。

第三, 资源配置优先保障。通过内部管理体制变革、全面预算管理、资产管理以及管理会计的全面实施, 优化行政后勤、招生宣传等费用, 从而将有限经费持续、优先地投入教学。2012年以来, 每年教学经费预算固定增长额度均在500~1000万元之间, 教学人工支出平均每年以1000万元左右的幅度增长。

7. 组织文化转型

转型初期, 学校没有形成主导的价值与文化体系, 来自创办人的创业文化、公办高校退休专家学者的严谨治学与规范文化、退伍军人的部队文化、招生市场的竞争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随着转型的推进, 新的多元文化逐步形成, “以学生为中心”成为主导的教学文化。学校领导在一份讲话稿中写道: “西安欧亚学院的文化具体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PPT文化, 代表我们重视逻辑的思考, 艺术的表达, 有效的沟通; 其次是强调团队合作、长期主义、种树思维、以学生为中心, 注重驱动因素而不是简单关注结果, 注重批判性思维、数据思维、战略思维; 还有艺术素养与体育精神等。”

(三) 转型成效、经验与不足

范式转型整体成效显著。2019年, 学校组

织了一个专项小组对十年战略转型成效进行了评估与评价, 认为“质量、经营、声望、组织与管理体制、信息化建设”五个战略主题均获得明显进展和突出成绩。学校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并获得外部认可。如2010—2014年承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2013—2017年承担了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项目并被评为优秀示范单位, 2018年获陕西省质量奖提名奖等。

教学改革取得了突出成绩。学校2012年开始参加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调查”项目, 是国内第一所参加该项目的民办高校, 调查结果显示, 在校学生对校园环境支持度的评价高于地方本科院校常模8~10个百分点。此外, 教学信息化建设效果明显, 目前学校所有课程资源都实现了线上运行, 在线课程开出率(门次) $\geq 93\%$,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 师生对在线课程的满意度均高于全国常模5~10个百分点。

学校总结过去十多年转型发展的经验, 认为主要得益于五个方面的坚持: 一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二是坚持战略规划引领学校发展; 三是坚持领导力发展与学习型组织建设; 四是坚持高品质的育人环境建设; 五是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关于问题和不足, 学校认为“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进行了十五年, 但目前更多体现在支持系统的改革上, 教学模式的转型仍处在持续探索阶段, 教学与学生学习系统转型的目标、思路和过程的有机协调、效果的评测和显现, 都不如战略规划和管理体系的改革深入、成熟和有效。赵炬明教授参加学校“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的总结会时指出: 校园生活体验已有很大改进, 成就卓越; 学生学习体验需要继续提升, 形成显著优势; 下一步的重点仍是包括专业和课程在内的教学改革。学校自评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 学生学习质量未能获得与生活质量的同等改善与提高; 学生对教学改革的感觉与获得感有待加强; 学生的就业层次和就业率与预期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

整体来看, 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和学校整体发展成效明显, 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但在教学质量、学习效果、学生就业等方面与预定目标仍有距离, “以学生为

中心”的改革还在路上。

四、应用型高校“以学生为中心” 范式转型的关键要件

（一）“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有赖于 政策环境支持与高校领导者价值观的引领

西安欧亚学院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早期动因是为了应对因生源下降可能带来的生存危机。之后，学校意识到只有依靠内涵、质量和特色才有未来，但转型之初学校的资源基础和组织能力都很薄弱，参与同质竞争缺乏条件，“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有利于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赵炬明教授介绍的“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及其引导和启蒙，也与学校决策者的办学偏好和价值取向相契合，“以学生为中心”进而成为学校价值体系的核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质量观也逐步成为学校的内在追求和文化自觉。转型之初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与价值体系，这是一个重要条件。基于这样的理念引导，学校的重大决策与资源投向才能超越生存、竞争的现实发展阶段，既解决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价值起点与驱动力问题，也形成了方向引领。

当前，我国高校“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所指向的战略重点和资源投向缺乏政策匹配和评价制度支持，大多数高校更倾向于选择响应政策，很少把“以学生为中心”作为转型的方向和思路，因为实施“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很难得到支持、奖励等正向反馈，学校的发展甚至会异常艰难。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高校范式转型面临的首要挑战不是“以学生为中心”转型之难，而是为何要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转型。这一方面需要高等教育政策和制度转型，构建准市场化宏观政策环境，把“以学生为中心”作为政策供给和评估评价制度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维度。当前，我国正在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评价标准，审核评估也提供了面向应用型高校的可选方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但整体而言，“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其中的主导思想，与“以学生为中心”直接相关的要求较少，需要强化。

另一方面，需要高校领导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认知体系来引领办学方向。

首先，要认识“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的科学性。“以学生为中心”改革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其次，认识到“以学生为中心”改革既具有价值独特性也符合现实目的。在当前的高等教育政策环境中，高校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意义在于通过走差异化路线获得资源、办学质量和声誉，因此具有价值独特性。美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表明，美国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办学特色之所以能满足高等教育人口多元化的需求，主要在于美国高校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贯穿教育的全过程。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多样化、高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在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种类型的高校阵营中，后两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均以教学为主，如果它们亦步亦趋地效仿研究型大学则很难获得突破，通过“以学生为中心”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办学特色和优势，进而以特色获取更多资源和声誉，将是这些高校相对可行的转型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观。价值观属于主观和精神世界的范畴，但与客观世界相联系，它的塑造和建立会受现实环境的影响。欧阳明高院士认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遵循了从生存与安全驱动到市场竞争驱动再到价值观驱动的发展逻辑^[21]。“生存—竞争—价值观”的价值认知演变过程，也较为符合应用型高校的现实发展路径。我国小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依然面临生存压力，大部分应用型高校处于竞争阶段，但基本围绕政府政策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展开同质化竞争，很难获得突破。当前，选择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这样“难而正确”的事情，作为教育变革者的高校领导者不仅要有情怀与信念，还要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观引领办学方向。

（二）“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需要理性 规划设计与全面探索相结合

在美国，反思“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

面临困境的一个共识性理由是：缺乏学校结构与系统层面的支持^[22]。“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是范式改革，需要整个学校予以支持和保障，其涉及范围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注定“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是一场艰难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既需要理性的顶层设计，对“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与教学改革进行系统规划，也需要在各个部门持续探索，逐步构建完善的实践体系与工作机制。之所以需要理性规划设计，是因为“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既有规律性，也有长期性、复杂性，要始终把握改革的方向不发生偏离；还要全面探索，这是因为“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在全世界都是一件新生事物，就连在美国，除了少数学校和专业取得较好的成效外，整体上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我国从2018年才开始大力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目前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因此，高校“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正常的。

西安欧亚学院一方面注重以战略规划统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的战略性结构，整体上符合范式转型的要求；另一方面注重持续、全面的探索，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思考框架和行动模式。在转型过程中，以“以学生为中心”理论和“新三中心”原理为指导，几乎对每项工作所涉及的教育教学领域与管理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的在地化、适应性改造。虽然学校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已有十五年，但至今为止仍是边干边学，在不间断的改革实践中摸索，向既定的战略目标不断靠近。

我国大部分高校推动“以学生为中心”改革尚不具备范式思维所要求的重要条件。首先，教学并非所有高校的战略核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虽然“以本为本”的办学理念得到重视，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并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学校的整体决策安排、教师评价制度、资源配置重点等，均未把本科教学作为根本方向和目标。其次，我国高等教育界引入“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时间较短，高校改革实践尚在浅表层面，多数高校还没有真正经历“以学生为中心”

改革面临的决策两难、思想观念和利益冲突以及久不见效的阵痛等问题。巴尔和塔格的“以学生为中心”范式是在分析美国大量“以学生为中心”改革失败案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范式思维是一种实践性思维，只有经历改革才能真正理解“以学生为中心”范式概念。第三，管理体系和组织能力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短板。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面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管理结构错综复杂、权责难以界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难以协调等管理难题，加之管理体系和组织制度又是围绕“老三中心”和“传授模式”构建起来的，并不适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所以很容易导致改革理念难以落地生根。正因为如此，在“以学生为中心”支持系统改革中，需要特别强调管理体系与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第四，依据范式转变的要求，高校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系统转型势必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涉及的方向转变等问题更是具有一定的决策风险，这对任何一所高校的领导班子来说都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校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对此项改革的全面性、系统性、复杂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耐心，要精心设计改革与实践框架，制定战略规划，实施战略管理。转型过程中会面临“以学生为中心”范式理论难以触及的大量具体问题和实践细节，需要全面、持续地探索。

（三）“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难点在于教与学系统重构的复杂性，学生的学习目标难以形成共识和公认的评价标准

“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的关键是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但我国高校真正关注学生学习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传授模式”转向“新三中心”模式，让“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有效落地，还面临较大的困难。

目前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学习效果尚未达到预期目标，学校对此总结出了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新三中心”原理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未能认真理解和有效贯彻；注重学校系统

转型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但缺乏对“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系统设计，教学改革的重心不够稳定且缺乏连贯性；对学生学情研究不够，对学生的学习动机未能准确识别、学习目标没有真正有效界定，甚至部分学习目标的设定是教师和管理者的一厢情愿；教师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评价学生学习过程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管理流程，未能形成教与学的PDCA循环。教学之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缺乏足额的经费、师资等长期投入的资源基础；外部评估与各类竞争性评价等阶段任务对改革形成了干扰。

西安欧亚学院的案例表明，“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启动首先有赖于管理支持系统的改革；而在范式转型的深入实施过程中，管理支持系统的改革相对容易做到，但学生学习系统的转型比较困难，这是改革面临的真正难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以大学生学情调查为代表，强调以学为本、关注学生需求已得到高度重视，但大学生学习研究、学情研究在政策结构和社会情势上均具有较大的复杂性^[23]。赵炬明教授基于对“以学生为中心”科学基础的研究，揭示了学生学习的重要性，在教与学的二元结构中重构了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关系，对解决“怎么学”“效果如何评测”等问题也有系统的研究，但对“学什么”的问题并未直接涉及，对学生学习重要性的认识途径也主要通过教学体系设计和教师的转变来实现，未回答学习内容的来源及其科学合理性问题。西安欧亚学院的教学改革团队也倾向于认为，对学生学习的相关问题尚未思考和研究清楚，主要包括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么学”“效果如何评测”。学校尤其对“学什么”，即“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科学性”持审慎判断甚至质疑态度，学校开展的通识教育改革、应用型培养目标设置、产学合作教育模式、课程体系重构等大量教学改革工作也是在反复探索“学什么”的问题，因此体现在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的改革上就表现得较为犹豫迟疑和不够坚定。

我国高校学生到底应以什么为学习目标？

实践中，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学生学习目标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考研、英语四六级等考试目标相对容易形成公认标准，但过于单一和短视；就业目标容易受学生、学校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其标准需要与产业界密切对接才能确定；学生成长目标偏重人文导向，需要通识教育来支撑，同样缺乏客观评价标准。比较而言，研究型、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培养目标相对清晰，多方利益相关者更容易达成共识和建立公认的评价标准，而应用型高校的培养目标则很难确定。究其原因，“应用型”概念界定的科学性不足，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学校、学生、教师对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有着不同的诉求和看法，加之缺乏统一的外部评价标准，因此应用型高校很难对多维度的教育目标统一协调和精准定位，教学改革缺乏科学、稳定的学生学习目标。在此情况下，多数高校都把政府要求和评估评价指标作为优先达成目标，而这些目标与人才培养、学生发展的教育属性往往有所偏离。西安欧亚学院在前一阶段的教学改革中未把通过四六级英语考试、考研通过人数、就业率、科研成果数等作为评价学生发展与成长的重点，以至于多年后，学校在政府组织的各类竞争性评价、科研评比中因缺乏这方面的成绩导致排名靠后。面对新的审核评估压力，学校不得不适当调整方向，重新兼顾多方目标。

相比应用型高校学生面临的学习目标困境，如果不考虑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指向，可以说新东方等教育培训机构和衡水中学这类“名校”，反而真正落实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其标准而严格的教学体系，保持了学生学习目标、过程、结果的一致且验证有效。这个例子未必合适，只是要说明在应用型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中，“学什么”即学生学习目标的确定并不容易，它受到太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很难像教育培训机构那样定出简单、清晰、较为单一的学习目标。

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实践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确定学生学习内容的科学性？换言之，“学什么”的问题是否可以在“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即教

师教学转型中得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探索。但无论如何,应用型高校实现“以学生为中心”,需要真正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在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与社会环境中认真研究学生的学情和特点,精准识别和确定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目标,把它们作为设计教学体系和构建学习系统的基本依据。

(四)“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关键在于保持教师队伍高成长性、高成本投入与资源约束之间的平衡

师资队伍对高校“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赵炬明教授结合美国高校教师管理实践和中国高校实际,为我国高校改进教师管理提出了三条建议:加强基本制度与文化建设;引进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体系与方法;全面倡导学术专业主义和大学教师职业化^[24]。对于大多数应用型高校而言,这些建议属于高阶要求,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和时间积累是很难达到的。

在西安欧亚学院转型的不同阶段,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重点任务有所不同:首先是解决教师人数不足的问题;其次是教师队伍结构优化;然后是教师培训、发展与能力提升;最后才是教师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这些基本问题总是同步存在、叠加出现,而且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持续不断的资源投入为前提。如果教师队伍建设超出学校的资源承受能力和超前于学校的发展阶段,就会导致各方面的资源投入失衡,继而引发其他潜在问题。在此情况下,应用型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既需要创新突破,更需要尊重现实,稳步推进。

西安欧亚学院转型之初启动了为期五年的“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改革培训,之后组建了教师发展中心,并逐步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将教学业务培训拓展为多方面培训,将传统线下培训形式升级为多种方式结合的教师发展模式,常态化实施教师发展计划。期间,学校还推出了“彩虹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全面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灵活的创新举措,突破教师队伍选、育、用、留的传统做法,分类制定不同层次师资队伍的实施策略,化解了“以学生为中心”范式转型所要求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建设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现实矛盾。在转型过程中,学校始终高度重视全员的学习与培训,并投入足额经费,培养了一批实施“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的领导干部、管理者、教学设计师和骨干教师。

但作为民办高校,西安欧亚学院始终面临教师队伍高成长性、高投入要求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突出矛盾,教师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目标达成任重而道远。西安欧亚学院的实践探索表明,应用型高校宜以较长的建设周期和可承担的资源投入去推进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整合资源保障教师人数基本稳定与结构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和制度创新,建立完善的教师培训和发展体系,让教师队伍保持高成长性,并逐步向实现教师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目标靠近。这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五、简要结论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全方位转型。邬大光教授指出,任何国家的大学转型都是基于本土文化的重塑过程,大学转型表现为一种“合乎规律”与“符合目的”的主体觉醒与选择过程,甚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19]。西安欧亚学院的实践案例,展现了一所应用型高校如何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为指引来实施本土化的系统转型。其转型过程、成效、不足与经验反思,不仅提供了“以学生为中心”理论框架下的实践细节和面临的具体问题,而且对巴尔和塔格的范式概念、赵炬明教授的“以学生为中心”改革理论进行了延展,也提出了在中国当前政策环境下应用型高校从“传授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型的关键要件与路径,包括政策环境支持与高校领导者价值观的引领,理性规划设计与各领域全面探索相结合,意识到构建教与学系统的复杂性,审慎考虑和确定学生的学习目标,保持教师队伍高成长性、高成本投入与资源约束之间的平衡。

面向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高校转型的路径是多元化的,基于“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范式转型具有多重价值,值得探索和期待。赵炬明教授在研究中指出,“以学生

为中心”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传统习惯，如果能克服这些习惯，经过十至二十年的努力，完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我国高校的本科教育质量是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1] 瞿振元. 着力向课堂教学要质量[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 (12):1-5.
- [2] 刘海燕.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欧洲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命题[J]. 教育研究, 2017, (12):119-128.
- [3] 刘海涛. 欧洲和北美高校学分转换体系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欧洲 ECTS 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CAA 的分析[J]. 外国教育研究, 2016, (12):106-115.
- [4] European Student Union. Overview on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EB/OL]. <http://pascl.eu/wp-content/uploads/Overview-onStudent-Centred-Learning-in-Higher-Education-in-Europe.pdf>.
- [5] 赵炬明. 聚焦设计: 实践与方法(上)——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三[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 (2):30-44.
- [6] 赵炬明. 论新三中心: 概念与历史——美国 SC 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一[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 (3):35-56.
- [7] BARR B, TAGG J. 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J].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1995, (6):12-26.
- [8] 何克抗, 李克东, 谢幼如, 等. “主导—主体”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J]. 电化教育研究, 2000, (2):3-9.
- [9] 张俊超. 推进从“教”到“学”的本科教育教学变革——“院校研究: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 2012 年年会综述[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8):104-109.
- [10] 祁占勇, 李莹.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4):16-22.
-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EB/OL]. http://www.gov.cn/jrzq/2010-07/29/content_1666937.htm.
- [12] 胡锦涛.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gov.cn/lhdh/2011-04/24/content_1851436.htm.
- [13] 柳云飞, 周晓丽. 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比较研究[J]. 前沿, 2006, (4):170-174.
- [14] 张永红. 高等教育市场化: 内涵、局限与突破[J]. 中国成人教育, 2016, (22):47-49.
- [15] 张应强, 张浩正. 从类市场化治理到准市场化治理: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方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6):3-19.
- [16] 刘振天. 从水平评估到审核评估: 我国高校教学评估理论认知及实践探索[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 (8):4-11.
- [17] 吴维仲, 李国庆, 关晓辉.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思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162-166.
- [18] 陆根书, 贾小娟, 李珍艳, 等.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本科教学评估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19-29.
- [19] 邬大光. 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呼唤[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 (8):4-9.
- [20] 胡建波. 一个战略的演进、结果与反思——基于高校战略规划“行动反思模式”的案例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1):44-57.
- [21] 欧阳明高. 创新驱动发展, 什么驱动创新[EB/OL]. http://alumni.cas.cn/yywg/202010/t20201031_4558684.html.
- [22] 崔乃文, 李梦云. 困境与出路: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何以可能[J]. 现代大学教育, 2017, (4):97-103.
- [23] 史静寰, 王文. 以学为本, 提高质量, 内涵发展: 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的学术涵义与政策价值[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4):18-27.
- [24] 赵炬明. 美国大学教师管理研究(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1, (6):68-83.

(下转第 23 页)

■ 民办高等教育

我国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动因、瓶颈及对策

阙明坤¹, 王云儿²

(1.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2. 宁波财经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民办高校, 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破解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洼地”现象的迫切需要。当前,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面临外部制度供给存在缺陷、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失序、社会评价体系不健全等瓶颈问题。对此, 需要科学谋划, 多管齐下: 实施“高水平民办高校”工程, 助推高质量发展; 健全内部治理结构, 形成高水平治理能力;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建立高水平筹资机制; 优化民办教育外部环境, 建立高水平政策保障体系。

关键词: 高水平民办高校;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高校内部治理; 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14-10

我国民办高校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 摆脱了早期无土地、无校舍、无师资的“三无”境地, 但从整体来看, 依然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端, 陷入“质量洼地”, 民办高校仍然普遍弱于公办高校, 两者的教育质量和综合实力存在较大差距, 这既是高校分层分类的结果, 也是高等教育竞争的结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高等教育专题规划》明确提出“办出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民办高等学校”, 这是我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中首次正式提出“高水平民办高校”概念的发端, 从此掀起了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热潮。近年来, 关于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呼声建议不绝于耳, 推动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的实践也在如火如荼探索之中。我国为何兴起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热潮, 尚存在哪些瓶颈

问题, 究竟该如何破解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中的难题, 本研究试图对此予以探讨。

一、我国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动因

所谓“高水平民办高校”, 目前学界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尚无统一的界定。我国高水平民办高校是一个具有发展性、比较性的概念, 主要是指具有高水平教师、学科、专业、条件、生源、理念、制度的民办高校。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一直是众多民办高校及其举办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和矢志不渝的梦想。近代以来, 一批私立大学灿若星河, 在高等教育史中熠熠生辉。截至 1946 年底, 我国在办私立高校数共计 46 所, 占全国高校总数约 35%^[1]。

改革开放后, 民办高校重新复苏, 一批办学者继续秉承我国近代私立大学的优良办学传

收稿日期: 2021-09-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我国独立学院转设风险防范和推进机制研究”(BIA200206)

作者简介: 阙明坤, 男, 湖北安陆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无锡太湖学院副校长, 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民办教育研究。

统, 励精图治, 努力朝建设高水平民办大学的目标迈进。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矢志建设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 西安翻译学院创始人丁祖诒率先提出创“东方哈佛”, 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直呼“一定要争当第一”, 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秦和表示要建设百年私立名校, 一个个民办高校办学者的铮铮誓言彰显出民办高校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信心和决心。显然,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 国家层面的高水平大学应该有民办高校的一席之地, 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应该充分考虑民办高校这一庞大群体。“过于强调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 可能会损害某一特定的大学或院校系统。这样做有可能使得精力和资源偏离更重要并且可能更现实的目标。”^[2]

面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新目标, 改变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民办高校, 提升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底端的质量, 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一)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描绘了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教育现代化是一种教育高水平的发展状态, 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 教育理念、培养方式、教师队伍、治理模式、国际办学均需要现代化, 这给民办高校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有学者对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五大梯队进行分析, 发现美国位居第一梯队, 英、德、法、日等国构成第二梯队, 中国等金砖四国位于第四梯队, 目前正处于追赶阶段^[3]。《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 140 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排名, 美国取代瑞士位居第一, 中国排名第 28 位, 中国大陆劳动力技能水平排在第 63 位, 仅 64 分, 为 28 国(地区)最低^[4]。由此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差距。

目前, 在加快“双一流”建设背景下, 探索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差别化一流建设之路, 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 有利于形成“高原崛起、

高峰凸显、高原之上建高峰”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5]。潘懋元先生提出, 新时代加强“双一流”建设, 既要建设学术性研究型大学, 又要激发不同类型高校争创各种类型的一流, 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所长, 传统学术性研究型大学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应用型大学同样有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6]。

在此背景下,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大势所趋, 有利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加快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显然, 随着越来越多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 在校生占全国高等教育近 1/4 份额的中国民办高校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没有民办高校的现代化和质量提升, 高等教育现代化将无从谈起, 遑论教育强国目标。单纯依赖公办高校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可能会产生“创造了少数的获胜者, 但是牺牲了大多数”的窘境^[7]。美国马里兰大学罗伯特·伯恩鲍姆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 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而是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理工学院、世界一流的社区学院、世界一流的农业学院、世界一流的教师学院, 以及世界一流的区域性州立大学^[8]。

(二)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是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需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变化体现在教育方面, 就是人民对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诉求,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 低水平低层次的高等教育服务逐渐被市场淘汰。与此同时, 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产业急剧变革、技术更新换代、企业转型升级对民办高校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产业革新大势, 创建一批高水平民办高校, 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是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社会不再需要低水平低层次的高等教育服务, 正是高水平民办高校崛起的最佳时机。

长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资源配置

的剪刀差”，重点建设政策在促进重点院校快速发展的同时有失偏颇，民办高校学生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服务。无论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抑或“双一流建设”“双高计划”，均是政府集中有限资源扶持少数高校，通过国家意志进行重点投入、重点建设、重点培育，这种身份认定主要是靠行政手段，而非完全的市场竞争，如此导致高校形成“差序格局”，不同高校之间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大学永远没有被赶超的后顾之忧，而处在低端的民办高校则几乎没有赶上的可能。项目制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已经内嵌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在带来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违背学术治理规律的空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双一流”建设巨额经费集中到少数研究型大学，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序列中处于中、底部，在办学中能够获取的资源非常有限^[9]。在此背景下，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填补短板，让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是破解民办高等教育质量危机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民办高校发展困难重重，陷入“质量洼地”，对照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是师资队伍短缺，质量结构欠佳。全国普通本科高校36~55岁中年专任教师比例为57%，而相同年龄段民办本科高校比例仅为35%，西部地区民办本科高校35岁以下年青专任教师比例高达54.3%^[10]。从职称结构来看，两头小中间大，呈“纺锤形”，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匮乏且流动性大。二是学科专业薄弱，教学改革滞后。许多民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追求大而全，热衷于开设低成本的文科类专业。在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学生学科竞赛等方面，民办高校与同类公办高校相差悬殊，培养质量相形见绌。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总数为452项，而民办高校只有2项，仅占0.44%。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分析报告显示，公办本科院校的校均获奖数为16项，而民办本科院校的校均获奖数为2项^[11]。三是科研水平不高，社会服务能力偏低。民办高校以及独立学院科研工作起步晚，

发表学术论文和承担课题偏少，一半以上民办本科高校授权发明专利数为零，无法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多数民办高校在经费投入上缺乏保障，年度科研经费超过500万元的学校更是寥寥无几，80%以上民办本科院校尚未形成科研团队^[12]。

《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民办教育品牌”；教育部《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19年工作要点》提出，“鼓励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培育优质学科、专业、课程、师资、管理，整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这些都为新的历史阶段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了遵循。许多省份也相继出台了支持民办高校提升层次水平的举措，如陕西省每年设立4亿元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支持民办高校发展，遴选3所一流民办高校建设单位，予以重点支持；上海市开展小规模、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试点，支持有条件的民办高校开展专业硕士学位点申报；浙江、山东、江苏等省确定一批民办高校为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培育建设单位。

二、我国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瓶颈问题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是一项重要政策倡议，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推动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并非易事。为何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陷入低水平、低层次的发展困境和路径依赖？当前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面临着哪些瓶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直面的问题。

（一）外部制度供给存在缺陷

我国高水平民办高校发展背后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缺陷问题，制度缺陷是民办高等教育陷入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民办高校投资办学行为与社会文化认知相冲突，长期以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之初规定“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是，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出允许“合理回报”，导致一大批出于投资目的企业和个人争

相举办民办高校, 虽然法律地位上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 但是本质上却打着非营利性的幌子行营利之实, 这是当时法律环境下举办者寻求经济收益的无奈之举。在这种法治体系的形塑下, 社会对于民办高校的“文化认知”逐渐固化, 即认为许多民办高等学校是赚钱机器和劣质教育, 成为人们的“次优选择”, 甚至真心育人、捐资办学的真正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也一同受到歧视。由于民办高校鱼龙混杂, 投资办学和经济回报成为社会攻击民办高校的对象, 类似这种行为被哈耶克称之为“哲学家的盲目”, 即只有把好处留给别人的行为, 才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赞成的, 而着眼于个人利益的则是最恶劣的行为^[13]。民办高校成了社会各界鄙视的对象, 人们甚至“谈民色变”。

在这种氛围下, 政府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供给存在明显缺陷, 主要表现为由配套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制度真空”和执行不力导致的“制度乏力”。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涉及财政、人社等十多个部门, 受科层制影响, 协调难度较大。正如西蒙所言: “不同部门的人员对事物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 由于职业训练、经历和职责分工的差别, 他们的关注焦点并不一致, 往往重视其中的某些现象而忽略另外一些。”^[14]当前, 民办高校尚未落实与公办高校同等的法律地位, 教职工待遇保障相差悬殊。虽然法律规定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师生的合法权益, 但这一制度设计在地方层面却难以得到有效回应, 各地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往往原则性强、操作性弱, 有些甚至是对上级条文的照搬照抄, 配套制度供给存在严重缺陷。民办高校教师退休工资、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和公办高校教师相比更是天差地别, 导致教师流失率较高。

(二) 办学经费捉襟见肘

目前, 我国民办高校绝大多数是依靠学费滚动发展, 学费占学校总收入的85%以上, 学校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创收和筹资能力不足, 这显然不利于民办高校的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 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扶持力度偏弱,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构建了差异化的财政扶持体系, 强调进一步加强财政扶持民办教育的力度, 在总体框架的指引

下, 部分省市强化了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的投入, 如目前上海市财政扶持资金已占民办高校的学费收入的15%以上^[15]。但全国多数地区对于财政补贴的标准、条件和重点领域表述不明, 较多地表达出扶持意向, 但真正纳入同级预算的较少。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 民办高校应当获得合理的公共财政资源, 但与公办高校的扶持力度相比, 民办高校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比如在“以奖代补”层面, 民办高校获得项目资源的成功率远低于公办高校, 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时存在明显的“政策倾斜”。

我国民办本科高校的办学经费极为短缺, 其中公、民办院校的生均拨款差距明显, 民办高校每生仅有约119元; 其余项目除学费收入外, 民办高校普遍低于公办高校。民办本科院校生均教育事业收入为10908元, 公办新建本科院校为14517元, 相差3609元^[16], 二者之间差距明显。考虑到民办本科院校教育事业投入还要用于学校基础建设, 因此实际用在学生身上的经费更是相差悬殊。综合来看,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领域社会捐赠较少, 财政扶持的资金来源也不稳定, 各方面因素导致民办高校办学经费短缺, 继而引发师资建设不强和办学条件跟不上等问题。经费不足是制约民办高校高水平发展的重要问题, 也是导致民办高等教育陷入“质量洼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失序

民办高校是利用非公共财政经费举办的高等教育组织, 投资办学是我国民办高校的基本特征^[17]。投资办学的国情导致民办高校治理结构复杂, 投资者权力过大, 限制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并使其陷入相对低端的图圈。许多民办高校把财力放在硬件建设上, 对软件建设重视不够, 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社会能力、毕业生就业质量等不尽人意, 一言堂、家族式管理较为普遍, 招生、管理、财务等不够规范, 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社会认可度较低。民办高校缺乏科学制衡, 决策、监督、执行体系不健全, 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不够稳定。

在资本的冲击下, 部分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变更过于频繁, 通过资产受让或控制权转移的

方式完成举办者新老交替,频繁变动对高校的办学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当前阶段一些民办高校纷纷谋求上市,已有50多所民办高校被上市公司打包上市,上市后遭受的外部风险更多,股价变动可能导致学校资金链断裂,股东的营利诉求迫使民办高校偷工减料,严重影响民办高校发展。投资办学带来的不稳定性使学校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社会歧视现象依旧存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适龄人口下降、出国留学潮的兴起,民办高校面临生源危机,一些独立学院在外省招生遭遇“零投档”,部分民办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完成率不到50%,有的民办高职院校报到率仅30%,面临倒闭风险。全国范围内已有民办高校倒闭,倒闭问题背后折射出部分民办高校的资金渠道单一、办学质量不佳甚至存在短期办学行为,倒闭现象更加诱发了社会公众对民办高校的信任危机,民办高校陷入低端循环的怪圈^[18]。

(四) 教育评价体系尚不健全

我国民办高校办学历史较短,2000年后才开始举办本科教育,在硬件条件、师资队伍、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与公办高校相差甚远,受到很多诟病,社会普遍将民办高校作为次优选择和“二等公民”,许多民办高校甚至成为劣质教育的代名词。院校声誉是社会承认逻辑的产物^[19],它由各式各样的评价标准所塑造。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民办高校无疑处在声誉链条的底端。我国高校的评价体系有一个圈层结构:前三圈是C9高校、“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第四圈是1999年之前兴建的老牌本科院校,第五圈是新建本科高校,最后一圈是高职高专院校^[20]。民办高校基本上均属于第五圈和最后一圈,评价标准的分层反映出民办高校的社会认可度较低。无形中中国高校等级体系已经划分为从民办高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到北大清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21]。

一般而言,民办本科高校大多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少数致力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其发展与定位有别于“研究型”和“技能型”高校,更加强调实践与动手能力,培养能将理论转化为应用的专业性人才;而民办专科高职院校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强调学生的职业技术能力。

不同类别的学校定位不同,评价标准也应该有所差异。但目前,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尚不健全,社会上各种评估模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科研成果的数量规模、博硕士点占比以及被SCI、EI等收录数与CSSCI引文数作为评比和排名依据。以单一性指标评估非学术型高校往往会造成民办高校定位的迷茫,以及被社会所误解。

国家虽然强调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构建分类评估标准,但尚不健全,导致单一的评价体系依然备受追捧。这种不公平的评价方式无助于激励反而会起到消极误导的作用,致使众多民办高校不顾条件盲目攀比,竞相追逐单一的发展目标,造成教育生态位高度重叠,最终陷入“组织趋同”“结构趋同”的陷阱。从差异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制订不同的评估指标,至少应按三大类型制订三种或更多的分类评估指标,使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开展公平的竞争^[5]。

三、建设我国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对策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引导民办高校关注教育质量,回归初心,走出质量洼地,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和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谋划,多管齐下,久久为功。

(一) 实施“高水平民办高校”工程,助推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以国家模式为主导,国家根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重点制定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实施“211工程”“985工程”及“双一流”建设,遴选并打造出一批高水平大学,对提高中国大学国际竞争力、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国家模式主导下,中央通过提供足够的资源来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强那些由于缺乏资源而显得薄弱的活动,以保证整个高等教育标准的一致性^[22]。然而,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长期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资源配置项目,这不利于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目前,亟需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补充类似“双一流大学”战略安排,制定出台《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方案》,

保障教育公平, 促进我国民办高校质量提升, 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一是打造高水平民办高校。按照“扶优扶强扶特”的原则, 在国家层面探索遴选建设 30 所左右公益办学强、党建思政优、教学质量高、管理水平好、社会声誉佳的高水平民办高校, 集中优先发展^[23]。在资源倾斜过程中要注重引入动态竞争机制, 避免陷入“没有公平的低效率”窠臼, 健全基于绩效、有进有出的支持机制, 充分激发民办高校百舸争流、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 引导民办高校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二是建设高水平专业。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 是民办高校提升质量、办出特色的切入点, 可由教育、财政等部门遴选建设 100 个左右社会声誉好、示范带动作用强、紧贴产业链的优势特色专业, 支持其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验实训条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 支持高水平专业参加专业认证和国际认证, 提升民办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大学发展的关键, 建设高水平的民办高校, 必须培育高水平教师。我国近代私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非常注重延揽人才, 引进名家大师, 如中华大学为学生博采众家之长, 遍请国内外名流学者如杜威、泰戈尔、章太炎到校讲学; 南开大学坚持请同行专家举荐人才, 由专家教授约聘相关科系教师, 以此人为核心, 而树立此科系。可以借鉴上海经验, 开展“强师工程”, 将民办高校教师纳入各类培养培训专项计划, 支持民办高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要依法落实民办高校教师与公办高校教师平等法律地位, 通过购买补充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等, 解决教师后顾之忧。

(二) 健全内部治理结构, 形成高水平治理能力

高水平治理体系是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基石。高校治理的核心在于权力与资源配置, 实质是决策与控制, 高水平的治理即意味着一个组织中各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通过权力的配置和运作达到平衡及协调。在一个组织中, 各种不同的群体有着自己特定的利益和信念, 甚

至有其自身的神话和游戏规则^[24],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需要尊重这些群体的治理诉求, 尊重权力运行的逻辑和规则。阿什比曾言, “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24], 在劳动分工和知识专业化的背景下, 大学组织逐渐脱离个体或单一群体的控制, 现代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更加复杂, 权力表现也更加多元。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要妥善处理学校内部的各种权力关系, 明确民办高校董事会、校行政、党组织、监事会的权力边界, 厘清职权分工, 充分发挥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内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一是发挥章程的引领作用。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 章程建设要与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的步伐相一致, 及时修订完善大学章程以适应办学理念及内部组织机构变化的需要, 赋予新生事物合理合法性; 在不断完善章程的同时还要推动章程落实, “章程的生命力就在于实施, 章程的尊严也在于实施”^[25], 要建立章程实施监督及问责机制, 畅通投诉、处理渠道。

二是健全董事会制度。克拉克·克尔曾经指出: “董事会的好坏取决于其成员的优劣。”^[26]建设与高水平民办高校相匹配的董事会制度需要广泛吸纳社会贤达以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一方面要配置专家型董事, “专家型董事可提升董事会的决策质量”^[27]; 另一方面要吸收部分代表型董事, 构建民办高校与政府、社会的良好关系, 依法规避举办者亲属进入董事会, 弱化民办高校家族化管理现象。

三是推进校长职业化建设。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是民办高校的“金字招牌”, 高水平民办高校呼唤教育家型校长, 要求校长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 推动校长角色由“学术领袖”向“职业校长”转化, 依法保障法律赋予的民办高校校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权。

四是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政治权力是大学与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体现, 政治权力对高等教育组织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伯顿·克拉克认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没有这种形式的权力。”^[24]我国民办高校应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发挥党的领导在民办高校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优势，是建设高水平民办大学的重要保证。要选强配优民办高校党委书记，保证党组织在重大事项决策、监督、执行各环节有效发挥作用，将民办高校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育人优势。

五是要加强民主管理。“大学中包括两个体系，即基于法律权威的董事会和行政体系与基于专业权威的教师体系，大学的治理就是为实现两个体系的微妙平衡而设计的结构和过程。^[28]”民办高校要发挥基于专业权威的教师体系在办学治校方面的专业才能，落实“专家治校、教授治学”，完善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学代会，让民办高校走出私人领地，增强公共性。要健全监事会制度，建立监事激励约束机制，构建保障监事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体制机制，增进监事会的监督实效。

（三）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高水平筹资机制

民办高校在资源获取方面“先天不足”，在发展过程中擅于拼凑各种资源，“主要集中在财力资源拼凑、硬件资源拼凑、人力资源拼凑、学术资源拼凑、政治资源拼凑等方面。^[29]”充足的经费是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的支撑，是民办高校打造高水平师资、专业的重要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私立大学在与市场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筹资机制，铸就了一批私立大学的辉煌与卓越。我国民办高校自市场中兴起，其活力亦在于市场，从市场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这是扩大经费、提高质量的源泉。我国民办高校长期依赖学费滚动发展，在迈向高水平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利用市场中的其他渠道，提高资金筹措能力。

一是设立教育基金会。国外私立大学的基金会在学校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模式，基金会筹资在其经费份额中占比可观^[30]。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需要借助基金会的力量，来构筑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向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校友获取资金支持，通过基金会开展大宗募款，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

二是兴办产业园区。对接地方产业是国际

高水平大学筹资的重要手段，由普林斯顿大学发起建立的佛瑞斯塔研究园区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间的三角研究园，每年为学校带来可观的创收^[31]。我国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也应该依托学术资源，盘活资产，增强造血功能，大力发展校办产业，打造科技园区、文化创意园区、创业园区、数字经济园区，建设产业学院、技术转移中心，从企业获取办学资源和经费支持。例如，潍坊科技学院在校内建立软件园，入驻企业达240家，2019年产值达11亿元，软件园被确定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民办高校以产业学院为突破口，打通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引入行业标准，校企联合构建专业核心能力与职业发展需求相结合的课程体系，让企业从局外人变为高校人才培养活动的参与者和管理者^[32]。

三是争取财政拨款。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部门对大学的拨款已经从道德层面的责任和义务转变为市场逻辑下的行为，拨款决定的作出更多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33]。在此背景下，一些私立大学却独领风骚，如2017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收到联邦政府拨款达21.8亿美元，比受资助比例位居第二的密歇根大学（公立）高出8.3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将目光从学校的属性移向了学校的贡献，财政经费开始向高水平大学倾斜，使其拥有充足的经费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提高综合国力。我国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需要按照市场逻辑争取公共财政资金，政府应加大支持，毕竟公共财政不等于公办财政。

此外，民办高校要建立绩效型财务体系。民办高校需要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效能，可以采用平衡计分卡，实施战略绩效管理，探索二级学院“包干制”财务管理模式，鼓励创收，让二级学院成为自主运营的办学主体，支撑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

（四）优化民办教育外部环境，建立高水平政策保障体系

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依托于公平、健康的外部秩序，离不开高水平的法治体系，法治和

秩序紧密联系。高水平的法治前提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这是一系列强制性的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某种框架的公开规则^[34]。当这些规则是正义之时,它们就为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建立了合法期望的基础。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需要抵御市场化挑战,过度市场化带来恶性竞争和盲目逐利。吉本斯(Gibbons)指出,大学正变得更像公司,而公司变得更像大学^[35],公司与大学概念的模糊侵蚀着大学声誉,不利于大学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体系,促使民办高校坚守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而不至于迷失大学的本职,沦为赚钱的机器。

一要健全民办教育政策体系。2021年4月,国务院颁布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我国民办教育法律体系逐步完善。随着民办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增强民办教育改革的综合性、系统性、协调性,落实民办教育改革多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土地、税收、补偿奖励等政策落地。特别是要进一步健全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财务监管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第三方质量评价办法等,为高水平民办高校的生成提供政策保障。

二要稳步推进分类管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鼓励民办学校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种组织属性开展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创新。”面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办学的国情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教育需求,既要允许营利性民办高校合法健康发展,更要优先扶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实施差异化扶持举措,世界一流私立大学无不是非营利性的,要大力支持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创建高水平民办高校,加大财政、土地、税收、教师、购买服务等政策的倾斜力度。

三要探索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单一的评价体系致使众多高校不顾条件盲目攀比,竞相追逐单一的发展目标,最终陷入“组织趋同”“结构趋同”的陷阱。要坚持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健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建立民办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改变以科研数量、博硕士点、SCI论文收录数等单一性指标作为评价依据的状况,落实《关于加快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意见》,支持民办高校申报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为高水平民办高校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四要落实政府“放管服”改革。加快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减政放权”,归还民办高校作为知识部门应享有的权利,使其依法自主办学。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治理机制,促进政府由对民办高校直接干预和具体操作的“划桨人”向宏观规划和调控协调的“掌舵者”转变。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国家的作用是建立规则,充当确保公民得到高水平服务的管家……管制必须是少而精的。^[36]”政府应努力为建设高水平民办高校提供系统配套的制度规则、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公平的外部环境,为民办高校的“崛起”提供有益助力和充分保障。当前,东方理工大学等企业捐资举办的新型大学呼之欲出,民办高校坚持“小而精”办学定位,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坚持有限学科,汇聚一流人才,建设类似西湖大学的新型高水平民办大学^[37]。

参考文献:

- [1]徐绪卿.民办院校办学体制与发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38.
- [2]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31.
- [3]沈文钦,王东芳.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五大梯队与中国的战略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14(1):1-10.
- [4]邓莉,施芳婷,彭正梅.全球竞争力教育指标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基于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J].开放教育研究,2019(1):13-24.
- [5]徐高明.基于分类分层的一流大学差别化发展框架[J].现代教育管理,2019(2):25-31.
- [6]潘懋元.“双一流”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N].人民日报,2017-11-19(5).
- [7]王一涛.探索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可行性[N].中国教育报,2016-04-07(12).
- [8]BIRNABUM R.No World Class University Left Behind[J].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07(47):7-9.
- [9]李立国,张海生.高等教育项目治理与学术治理的张力空间——兼论教育评价改革如何促进项目制改革[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5):

- 135-145.
- [10]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114.
- [11]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分析报告(2012—2019)” [EB/OL]. (2020-02-23) [2021-09-16]. <https://m.gmw.cn/baijia/2020-02/23/33582250.html>.
- [12] 阙明坤. 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困境与策略——基于全国141所民办本科院校的实证调查[J]. 复旦教育论坛, 2016, 14(2): 79-85.
- [13]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 冯克利, 胡晋华,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47.
- [14] 赫伯特·西蒙.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 [M]. 孙涤,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9: 71.
- [15] 王纾然, 何鹏程. 分类管理背景下民办教育财政扶持政策转向[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7): 16-20.
- [16]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90.
- [17] 潘懋元, 别敦荣, 石猛. 论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与营利性[J]. 教育研究, 2013, 34(3): 25-34.
- [18] 卢彩晨. 危机与转机: 从民办高校倒闭看民办教育发展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48.
- [19] 彭学文, 蒋凯. 制度理论视角的院校声誉 [J]. 大学教育科学, 2019(3): 49-53.
- [20] 吴红斌, 郭建如. 高等教育分层系统中的地方本科院校: 困境、优势与出路——基于全国本科学子调查数据的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2): 75-82.
- [21] 闫树涛. 近十年我国大学的组织演进: 制度主义视角——基于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的案例研究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2(5): 38-44.
- [22]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M]. 王承绪, 徐辉, 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82.
- [23] 阙明坤. 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路径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6): 57-58.
- [24]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M]. 王承绪, 徐辉, 等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120, 121, 134.
- [25] 孙霄兵. 推进大学章程实施提高高校治理水平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6(19): 5-7.
- [26] CLARK KERR, MARIAN L GADE. The Guardians: Boards of Trustees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 Washington, DC: The 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1989: 39.
- [27] HARRY DE BOER, JEROEN HUISMAN, CLAUDIA MEISTER-SCHEYTT. Supervision in “Modern” University Governance: Boards under Scrutiny [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0(3): 317-333.
- [28] ROBERT BIRNBAUM. The End of Shared Governance: Looking Ahead or Looking Back [J]. New Direc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2004(127): 5-22.
- [29] 阙明坤. 资源拼凑视域下我国高水平民办高校生成机理探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23(1): 52-62.
- [30] 秦和. 基金会: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制度创新的一种探索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21): 47-53.
- [31] 亨利·埃兹科维茨. 三螺旋创新模式: 亨利·埃兹科维茨文选 [M]. 陈劲,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34.
- [32] 王云儿. 双元协同双院联动培养应用型紧缺人才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7(2): 56-58.
- [33] 克拉克·克尔. 大学之用 [M]. 高钰, 高戈,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33.
- [3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何包钢,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84.
- [35] 杰勒德·德兰迪.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 [M]. 黄建如,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67.
- [36]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M]. 韩朝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77.
- [37] 阙明坤, 陈春梅, 王华. 我国建设新型高水平民办大学的背景、挑战与策略——以西湖大学为例 [J]. 高校教育管理, 2020, 14(4): 32-41.

The Motivation, Bottlenec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High-level Private Colleges in China

QUE Mingkun¹, WANG Yun'er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ingbo 315175, China)

Abstract: As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mber of high-level private colleges with characteristics is an urgent need for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 realiz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rack the phenomenon of "low quality" i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private colleges is meeting with the problems in bottlenecks, such as the defects of external system supply, the insufficient funds for running schools, the disorder of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unsound social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multi-pronged efforts: 1) carrying out the "high-level private colleges" project to boos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2) improving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form a high-level governance capacity; 3) broadening the funds-raising sources to establish a high-level financing mechanism; 4) optimiz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s of private education to establish a high-level policy guarantee system.

Key words: high-level non-governmental colleg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l governance of colleges;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上接第 13 页)

A Case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er-centered Paradigm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HU Jianbo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learner-centered paradig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to measur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arner-centere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practical problems of external non-suppurativ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ncomplete conditions of paradigm reform.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teaching paradigm to the learning paradigm requires four key elements: the support of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guidance of college leaders' values, the combination of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the prudent grasp and determin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the balance of high growth, high cost investment and resource base of teachers.

Key words: learner-centered;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teaching reform

■ 民办高等教育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特殊性与提升路径

石猛¹, 侯琮²

(1. 山东女子学院 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2. 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是民办高校的利益主体共同开展治理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办学目标的能力。主体性因素是影响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 但不同主体对治理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的特征及举办者控制型管理模式带来了诸多利益冲突, 使民办高校治理面临着与公办高校不同的难题,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有其特殊性。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下创新外部管理制度, 通过修订章程推进依法治理, 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

关键词: 民办高校; 高校治理能力; 分类管理; 管理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24-07

分类管理新法颁布以后, 我国已有部分民办学校开始选择营利性办学。尽管在整个民办教育体系中, 这些学校还是“非主流”, 但这确实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已经在实践上进入了分类管理的新时期。当前, 不少省市明确提出了规范管理、分类发展、办高水平民办高校的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出了“规范和扶持”“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要求。由此, 规范发展、内涵提升将成为新时期民办高校发展的主题。众所周知, 我国民办高校有明显的投资办学的特征, 而投资有获益的诉求, 许多学校由此形成了举办者控制的特征, 因而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其特殊性。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是直面投资办学的特殊性及举办者控制的特征, 从而形成问题的分析框架,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内涵解读

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是从词根“统治”派生

出来的概念, 是对管理活动的描述。别敦荣^[1]教授指出, 治理主要包括利益主体共同举办、共同决策、共同监督、参与分享四个方面。眭依凡^[2]教授认为, 治理是在共同目标支持下强调效率的活动, 其基础是协调与共同管理。因为治理强调协调与共同参与, 与传统管理有根本区别, 所以王洪才^[3]教授强调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就是善治。我国教育界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 与国家政策的演变, 教育政策的宣传、施行、落实密切相关, 与大学管理改革的趋势相吻合^[4]。在相关研究中, 研究者大多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来搭建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型。根据弗里曼^[5]的解释, 利益相关者是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人或是受组织发展影响的人。张维迎^[6]等人认为, 虽然每个人对大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但没有人能够对大学发展承担全部责任, 只能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发挥各自的作用。据此, 民办高校治理可以理解为民办高校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 又称共同治理。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活动的目的是保证集体秩序和

收稿日期: 2022-03-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组织属性及运行制度研究”(BIA180168)

作者简介: 石猛, 男, 山东青岛人, 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 教育博士,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民办教育政策研究。

集体行动, 并使组织利益和多元主体利益最大化。那么民办高校治理能力可以理解为民办高校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活动, 最大程度实现治理目标的本领, 是治理效能的体现。

能力是人在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状态, 所以能力属人,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依赖于多元主体的能力。民办高校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等外部主体以及举办者、办学者、教师和学生等内部主体, 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不同的诉求, 产生了通过治理协调利益的需要。保证公共性是政府的职能, 所以通过各种方式保证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民办高校治理, 有利于民办高校按照社会需求办学, 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避免人才培养的办学风险。举办者是民办高校的高专用性投资者, 办学者是民办高校的经营管理者, 二者都是民办高校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教师是民办高校办学活动的传导者, 学生是办学效果的承载者, 他们参与治理有利于出台符合学校发展实际的政策, 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素质准备状态, 在民办高校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民办高校因此展现出不同的治理水平。

组织的运行涉及了各种具体活动, 治理目标的实现机制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活动。治理能力的核心问题是决策权力的分配问题, 即谁具有决策权力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决策^[7]。民办高校的实践运行分为三个层次, 在技术层面表现为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职能, 在管理层面表现为一般行政人员承担学术和行政管理职能, 在决策层面表现为董事会、校长及其行政团队承担决策职能^[8]。董事长与校长因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方面的高专用性投资而享有最高决策权, 决策权力是由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决定的。由于民办高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 董事长和校长的决策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可, 关键看是否兼顾了所有人的利益。只有其他主体参与决策协商才能形成兼顾其利益的决策, 所以参与决策、享有决策权力是民办高校一般利益主体分享学校发展利益的关键, 民办高校治理需要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与利益分享的局面。

治理活动外在地表现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两个互为支撑的层面,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发挥需要以治理体系为依托。治理体系是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其关系体系, 具体体现为一定的内外部制度结构。大学需要形成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各利益主体参与决策并分享决策带来的利益。可以说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基础, 大学治理是一项基于制度的集体行动^[9], 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10]。所以,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运用制度管理学校事务进而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治理能力的实现必须有制度的保障, 所以制度能力是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本质特征。作为外部制度的体系包括法律政策体系、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和有效的中介组织, 这三者主要解决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组织属性以及其他主体参与民办高校治理的问题; 作为内部制度的体系主要指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等组织机构及其管理体系, 主要保障民办高校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执行的高效性和监督的有效性等问题。

二、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

组织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主体能力的发挥来实现的, 主体性因素是影响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因角色与地位的不同, 民办高校的利益主体在治理中具有不同的特点, 他们对民办高校组织治理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 政府政策促进了民办高校治理水平的提升

大学的发展与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 在影响现代大学发展的外部力量中, 政府是最主要的力量^[11]。政府主要依靠行政机制对民办高校施加影响, 但政府的影响基本不依靠具体的行政措施, 而是通过政策要求来实现的。在恢复发展初期, 政府通过相对宽泛的政策默认民办高校的发展。后来, 民办高校不断壮大, 在高等教育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提升, 内部管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政府由此加强了对民办高校的规范管理。这种规范主要也是政策性的, 即要求民办高校在审批设立、办学运行时达到一定的规范化条件, 表现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规范权责运行机制, 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以规范办学行为等方面。从以上来看, 政府的规范以民办高校自主办学

为基础,以主动完善法人治理环境、防范办学风险、提升办学质量为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发挥公共性,满足社会需求,发挥示范效应,政府还给予办学规范、特色突出的民办高校一定的财政性资助。政府的规范、扶持基本是政策性的,有时还处于失位或缺位状态,但为民办高校快速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1994年进入国家高等教育计划招生序列的民办高校仅有4所,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时增至173所,到了201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时已有747所。

(二) 社会参与对民办高校经营模式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学一方面通过服务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与使命;另一方面也从社会汲取必要的资源,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这是当前大学发展的重要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让渡一部分控制权给社会,让社会参与治理,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修正自己的办学行为,所以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12]。民办高校具有鲜明的非政府财政投资办学的特征,其他一些社会组织或个人因而对参与民办高校事务缺乏兴趣。但民办高校办学资源不足,迫切希望能够获得外界的支持,所以往往会主动接触一些外部资源,而其自主办学、自控性管理的特征正是与社会互通的便利渠道。借助这种自主机制,民办高校灵活地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构建利益相容点,调动他们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和其他个人等外部社会主体在直接参与决策、专家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民办高校少数人闭门造车式地决策,对学校的经营模式与办学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一些发展较快的民办高校体现得尤为明显^[13]。所以,民办高校办学主体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外部主体的参与提高了学校的决策能力与水平,有利于民办高校提升办学质量。

(三) 内部主体对民办高校治理能力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鲍德里奇^[14]认为,大学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只有提高决策的参与度才能缓解不同主体间的矛盾,因而决策比领导、管理等方面

都重要。根据在决策中的地位,民办高校的治理主体可以分为核心利益主体和一般利益主体。核心利益主体的典型特征是进行了高专用性投资,承担了高风险,从而在组织发展中不可或缺。举办者持续投入办学,民办高校才得以存在;他们主导管理队伍与管理制度建设,承担着经营风险,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利益主体。校长及其行政团队是办学者,他们的经营管理促进了民办高校的规范化发展,他们的稳定对学校的发展相当重要,因而也是核心利益主体^[15]。其他的主体都可认为是一般利益主体。教师参与治理更多的是基于对学术自由与民主管理的追求。然而,民办高校发展历史较短,从一些排行榜来看,整体的教学科研水平不太高,教师在决策中的治理价值还未充分体现出来,而且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特殊性也限制了教师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民办高校学生参与治理的质量并不高,但在毕业证书和学位颁发等切身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通常会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导致政府的介入,影响到民办高校的治理^[16]。

三、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特殊性

高等学校因其学术组织的特殊性与功能、使命的特殊性面临着特殊的治理问题,治理能力有其特殊性^[17]。而在高等教育系统内,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也面临着不同的治理难题,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有其特殊性。

(一) 外部关系对民办高校治理能力影响的特殊性

公办高校所要处理的外部关系主要包括与政府的关系及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尤以府校关系为主,这与公办高校的投资办学体制有关。财政投入是公办高校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因而许多公办高校都比较依赖于政府财政,与政府形成了一种从属关系。作为举办者的政府既对大学投资,又对大学进行直接控制与管理,不但规定了大学办学的基本行为规范,还从具体行为上控制了学校的办学,从而导致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不完整,也造成大学对政府的服从与依赖。公办高校都希望与外部社会建立支持性关系,但政府对高校设置、监督和统筹等方面的权力在保障学校发展的同时,也束

缚着学校的手脚, 限制着他们与社会的合作^[18]。由此可以认为, 公办高校与社会关系的根本阻碍还在于政府。近年来, 我国已对政府的管理权进行了调整, 但那只是政府有限地把一些权力交给高校, 大学的控制权仍掌握在政府手里, 大学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府行政模式特点的羁绊^[19]。所以, 府校关系是影响公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与公办高校的这种外部规定性不同, 民办高校是独立办学的法人实体, 在办学体制与经费上与政府机构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民办高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 把握着学校的宏观发展方向。如果出现董事缺额, 董事会可以自我增补。董事会选聘校长负责教育教学和行政, 如果校长出现缺额, 可以根据办学需要自主选聘。这种自我增选机制是公办高校所不具有的, 与公办高校党政领导主要由政府任命存在着重大区别。根据《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向民办高校选派了党委书记。民办高校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决策上的参与权以及行为上的监督权^[20], 主要是保障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方向。所以党组织参与讨论或决策的权力具有有限性, 没有改变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的事实。相对于公办高校, 民办高校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政府对民办高校组织的限制性规定, 以保证其公益性为主要目的。政府也会对民办高校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管理, 但一般是基于政策的调整而非直接的行政命令, 因此外部关系对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影响具有特殊性。

(二) 内部核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关系是影响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

我国公办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学校管理活动需要在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授权范围内进行, 内部治理遵循的也是授权治理的原则。这种治理的权力主要源于外部党政组织的授权, 治理的合法性是外部党政组织所赋予的, 治理的范围、内容、形式、程序等都是由相关政策法规文件所规定的^[21]。在指令控制下, 学校要按照外部的精神

来办学, 依靠行政手段保证上级精神的贯彻执行; 作为办学的主体, 二级学院不得不动应付外来的和内部党政部门的要求, 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教师的学术权力也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 有时相互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所以, 我国的公办高校实质上还是一个行政性治理主体, 这是由政府行政赋予的。解决公办高校治理能力偏低的问题, 核心在于在府校间建立一种新型、平等性法律主体关系, 给予公办高校法定的治理主体地位, 而不仅仅当作是治理的对象; 扩大其办学自主权, 培养公办高校作为法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促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17]。

民办高校主要依靠举办者及其家族成员、办学者等的智慧发展起来, 基于资本权力与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人格权威, 举办者成为学校决策的核心, 对学校具有控制性的影响力, 因而民办高校的治理体现为以举办者为主导的精英治理。举办者通过让渡个人资产给学校法人, 获得了组建董事会、参与董事会会议并对学校重大事务做出决策的强制性产权权力契约^[15]。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是民办高校最基本的治理制度。董事会所聘用的校长承担着重要的管理职责, 肩负董事会决策执行的使命。同时, 民办高校以举办者为核心集聚了一批家族成员, 比照家族的方式进行管理, 形成了家族治理模式。家族治理因决策权相对集中、家族利益统一等原因, 在学校发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部分举办者过分追逐控制权, 控制了董事会, 并在家族成员间分享控制权, 形成了家族化管理的现象。其结果是民办高校决策、执行与监督权责不分, 董事会制度悬置虚化, 举办者及其家族权力过大, 校长及其行政团队的办学权得不到有效落实, 其他一般主体的权利也无法保证; 若家族成员产生权力诉求或过分的经济诉求, 又会因内部矛盾引发学校的动荡。由此可见,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理顺好内部权力关系, 形成对举办者权力的制衡。

从以上分析来看, 与公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处理好管学、办学、内部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不同, 民办高校举办者投资办学的特征

及其控制型管理模式带来了诸多利益矛盾的冲突,是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首要面对的问题。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关键是围绕举办者控制权,解决校内核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关系,在矛盾形式上主要是解决举办者及其家族团队决策与校长管理团队参与治理等问题,实现学校利益最大化。

四、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

治理反映了民主、科学、协商、合作等现代精神或价值追求,所以治理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反映了管理过程中现代性因素的增长。治理的工具性价值在于坚持依法治校、民主管理^[22]。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创新内外部管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富有执行力的操作系统,使民办高校走上法治化与民主管理的道路。

(一) 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创新外部管理制度

外部管理制度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责任主体依法设计形成的行为规范,以及所采取的激励性与规范性制度安排。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下,民办高校举办者只能按照规定选择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如果选择前者,举办者将具有投资收益权;如果选择后者,举办者将在事实上丧失部分产权权益,现有举办者退出时可以获得补偿与奖励。同时,不同法人类型的民办高校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扶持政策。当前的民办高校以投资办学为主,是在“合理回报”的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民办高校之所以存在一些治理难题,关键是不少举办者存在着产权诉求,不断通过追逐控制权来获得产权权益。所以,投资办学及其伴随而来的对控制权的追逐是民办高校治理问题的根源性障碍。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下,解决这些难题首要的是创新外部管理制度,加强制度性权力,使举办者依法办学。

外部制度设计是民办高校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只要投资办学的现状不改变,创新管理制度、干预举办者的办学行为就必须尊重这一现实。一是探索建立激励性制度,激励举办者加大投入、规范办学。分类管理后,投资获利的思想惯性使举办者对营利性选择存在着担心,又对非营利性选择存在着不舍,这成为影

响民办高校营非法人属性选择的重要障碍。激励性制度的设计主要是明确举办者的身份权,完善税收、捐赠、差异化扶持等关键问题的政策,确定合理的奖励与补偿措施,保证不同法人类型举办者的财产与非财产性权益,激发他们安心办学、规范办学。二是探索规范性制度,约束举办者的办学行为。规范性制度的设计是就举办者的权力而言的,是要形成规范权力的约束机制。这需要强化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权,规范举办者要素的变更,防范办学风险;加强学校财务监管,保证办学经费投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推进重大问题的信息公开。三是培育和发展第三方社会组织,强化社会治理职能。培育第三方社会组织有利于协调政府及其他职能部门与民办高校的关系,使高等教育治理更有成效,因而有明确的政策需求与强烈的实践需求。这需要政府部门明确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健全民办教育治理体系;明确界定其权限和服务方式,发展第三方办学综合评鉴制度,将评价结果与政府的扶持挂钩,推进民办高校规范办学。

(二) 修订民办高校章程,推进民办高校依法治校

章程是为保证依法治校和学校正常运营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相应法定程序,以文本的形式对重大、基本问题做出详细规定的治校总纲,其权威性决定了章程的合法性及其在学校治理中的根本性^[2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机构设立的最基本条件是有组织机构和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也指出高等学校必须有自己的章程。所以,章程建设是大学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是法人治理的重要依据。民办高校章程应该成为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的依据,但通过研究发现,民办高校章程文本内容关于举办者权力要素的规定比较突出,而关于监督机制、基层民主权力的规定相对较弱,在实践中往往被束之高阁。民办高校治理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合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法制定章程,按章程规定办学,把民办高校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

营非选择后,民办学校需要修改章程继

续办学, 所以章程的修订是现有民办高校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通过修订章程来修正民办高校治理的问题, 一是需要明确参与章程修订的主体, 反映各方的诉求。根据《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参与章程制定的主体应该包括举办者、办学者、教师与学生的代表、主管部门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或其代表。通过反映各方诉求来对民办高校举办者权力形成制约, 需要在章程的修订中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参与权, 使章程变成由举办者、社会相关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以及大学自身协商认定的关于办学目的与要求的共同契约或纲领^[24]。二是需要明确章程修订的关键问题, 为学校内部治理提供依据。章程应该规定学校管理中最根本的事项,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的特殊性决定了民办高校章程最有可为的空间是厘清内部权力主体间的关系, 形成稳定的权力运行机制。所以, 章程的修订应该明确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 从而确定权力运营的基础; 明确举办者参与办学、管理的权限与程序, 界定其他利益主体的治理地位, 理顺他们在民办高校发展中的权力关系, 完善内部组织机构的权力运行机制。三是需要推动审核工作, 确立章程在民办高校办学实践中的法律地位。通过核准的章程应该成为大学法人存在与法人权力运行的依据, 学校、社会、管理部门共同管理、监督民办学校的抓手。政府及各界应该推动对章程的审核、公示, 甚至是经由立法机关审议, 从而实现章程的法律化, 成为民办高校治理的“宪法”。

(三)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民办高校决策水平

法人治理结构是内部利益主体间建立的一套有关权力与责任的组织机构与机制, 是民办高校治理有效性的框架基础。在外部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的背景下, 民办高校应该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构建一个制衡性的权力运行框架。在此架构下, 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发挥最高决策职能; 校长是最高行政长官, 通过组建管理团队处理教学和行政事务; 党委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监督和执行; 教师和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基层民主机构参与学校决策。这有利于吸引管理者、教师等其他办学主体参与决策, 形成合理的决策; 约束

举办者及其家族的权力, 形成合理的监督机制, 防范办学风险; 对举办者及管理者形成合理的激励, 促进办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样既能保证公益性办学目标不受侵害,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各主体的利益。

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 关键是形成合理的决策、监督、执行机制, 对举办者权力形成制衡。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对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加以完善: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 打造中国特色的民办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最大的制度优势, 许多省市在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时做出了关于党委书记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的规定, 这就明确了民办高校党委书记的法律地位。民办高校加强党的领导, 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 落实工作责任; 要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 探索党委、董事会、校长三马驾车的决策模式。二是完善决策制度,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民办高校的决策制度主要是举办者及其领导团队决策的程序与规范制度、决策执行与监督制度等。现实中主要是着眼于董事会制度建设, 明确董事会的结构、职责及其权力运行, 保证其他主体参与决策的权力。三是完善执行制度, 提高决策执行力。完善执行制度的核心是着眼于校长法律地位建设和专业发展问题, 完善职业校长的遴选制度、激励制度与团队建设制度等, 保持校长工作的权威与行政团队的稳定性, 打造一个贤能治理体系。四是激发监督责任, 完善监督制衡机制。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需要建立与董事会平行独立的专职监督机构, 规范决策与执行人员的合理结构, 形成对权力主体的监督; 完善机构与制度建设, 加强基层民主监督机构建设, 形成教职工参与决策、监督的激励机制, 从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

参考文献:

- [1] 别敦荣.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系[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1): 29-33.
- [2] 哇依凡. 从管理到治理的嬗变——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校内部管理模式变迁的线索[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7(3): 29-32.
- [3] 王洪才. 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略[J]. 复旦教育论坛, 2020, 18(1): 12-18.

- [4] 别敦荣. 治理之于我国大学管理的意义[J]. 江苏高教, 2007(6):2-4.
- [5] 徐绪卿. 我国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研究[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2: 79.
- [6] 张维迎. 大学的逻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0.
- [7] 周光礼.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现状问题与对策[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6): 2-4.
- [8] 罗伯特·伯恩鲍姆. 大学运行模式: 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3: 18.
- [9] 周作宇. 大学治理行动: 秩序原理与制度执行[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 41(2): 1-29.
- [10] 李立国. 大学治理的基本框架分析——兼论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的关系[J]. 大学教育科学, 2018(3): 64-70, 124.
- [11] 李立国. 现代大学治理形态及其变革趋势[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7): 9-16.
- [12] 王建华, 钟和平. 高校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 大学教育科学, 2011(1): 49-52, 58.
- [13] 胡建波. 一个战略的演进、结果与反思[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1): 44-57.
- [14] 阎凤桥. 大学组织与治理[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6: 71.
- [15] 张宏博. 中国私立大学有效经营的制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王一涛. 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与国家监督——基于举办者的视角[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287.
- [17] 张应强, 唐宇聪. 大学治理的特殊性与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 41(3): 6-13.
- [18] 孙霄兵. 我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发展及其运行[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9): 9-15.
- [19] 张圣祺. 治理理论视域下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2: 4.
- [20] 石猛. 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的治理价值及其实现[J]. 复旦教育论坛, 2019, 17(2): 15-20.
- [21] 别敦荣. 论我国大学治理[J]. 山东高等教育, 2016, 4(2): 1-7, 101.
- [22] 睦依凡. 关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的框架性思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38(12): 21-32.
- [23] 张茂聪. “双一流”建设中的现代大学内部管理制度[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64(3): 90-96.
- [24] 别敦荣. 论我国大学章程的属性[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2): 19-26.

The Particularities y and Improvement Paths of Governance Ability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I Meng¹, HOU Cong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the ability that interest subjects jointly carry out governance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running an institu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subjects are the main components that affects the governance ability, but different subject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e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investment from social sectors and the management model controlled by investment sponsors have brought about many conflicts in interest, which would cause many governance problems for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at governmental universities do not have. Therefor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s their own particularitie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the ex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men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to promote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raise the level of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governance capacity of colleges;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s

■ 国际高等教育

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群体多样化

——基于NCES来源数据的分析

欧妍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伴随着高等教育在规模以及入学机会上的规模不断扩大, 学生群体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年龄、学历及其社会阶层等方面。因此, 入学学生群体可能出现难以适应高等教育的状况, 而更多学生趋向于主动寻求在各方面更加适合自身的大学教育。结合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及普及化阶段学生的数据分析, 探究美国在普及化阶段所呈现的学生群体特征, 为我国高校在多样化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上提出改进意见。美国作为在1971年首个迈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 颇具影响力, 本研究使用1976—2018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 通过不同年份数据的变化和趋势试图找出在普及化阶段美国高等教育学生群体在社会组成、学习需求和学习经验与GDP变化的特征。

关键词: 美国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普及化; 学生群体多样化; NCES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2022)01-0031-08

一、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及数据来源

自美国进入高等教育高速发展阶段, 在此过程中, 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提升, 美国高等教育也亟待性质及其功能上做出相应改变, 从而对其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 借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官网上的理念统计数据进行详实的分析和探究, 从而更具有说服力地对美国普及化阶段大学生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学习经历进行阐释和说明。

(一)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内涵

尽管学界不同学者在对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分类的基础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但目前高等教育学界的研究学者基本遵循着马丁·特罗的三阶段划分理论, 根据其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 将所有

年龄在18~20岁之间, 接受了不同程度、形式和类型的高等教育入学学生人口数量与同时期的总人口数量作为比率, 以此作为划分的基础和标准, 当这个比率在15%以下时, 被称作“精英化”阶段, 而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比例是介于两者之间, 比率在15%~50%之间。当其超过50%时, 则已经成功进入“普及化”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发布的《世界教育报告》中显示, 早在1992年,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82%, 在收入中等的国家中此比率也达到了21%, 在低收入国家达到6%。

(二) 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重要转折战争, 在此战争的帮助下, 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为了保证世

收稿日期: 2021-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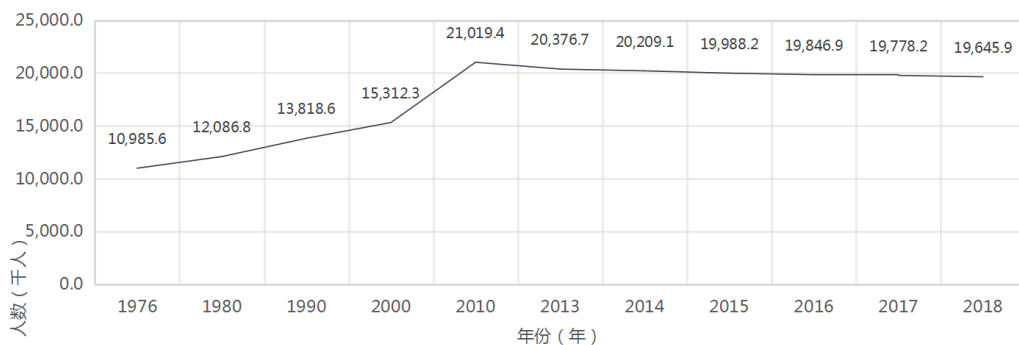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欧妍, 女, 福建南平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史研究

界民主化这一浪潮影响下对教育民主化的需求,也为了提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对劳动者素质和能力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补偿参战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以及提前预防大量退伍军人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原因进入市场后导致的高失业率问题。因此,1944年5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的颁布,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为所有美国退伍军人提供为期一年的与教育培训等相关的经费,在这一法案的支持与帮助下,从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全美有2000多所大学吸纳了约225万名退伍军人。

在《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颁布的卓越

条件下,美国成为了全世界首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该法案为美国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其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基础,帮助美国从一个工业型国家转向知识型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率先实现了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高等教育普及化,为全球其他亟待迈进或正在努力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国家提供了参考和榜样^[1]。

在美国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的30年里,其高校入学人数激增,2010年总入学人数达2101.94万人。在此之后,美国高校在校生总体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约在1960万~2100万人之间,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 <https://nces.ed.gov/>

图1 1976—2018年美国高校入学人数变化图

(三) 美国普及化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

借鉴金子元久的高等教育升学率提升理论,将毛入学率的提升划分为“横向扩大”和“纵向延伸”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最传统和普遍的方式,这是一批从高中毕业后自然地进入大学的学生,从而引起升学率上升。纵向延伸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接受学习年限的延长,例如,从大专生到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水平的最高学历的逐步提高。另一个是就学年龄的上升,也就是说,一些学生在有工作经验或辍学后选择再次上学的这样一种非连续性升学行为。有研究表明,在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上,“横向扩大”的确是导致其增长的原因之一,然而,更为主要的推动力是来源于美国高校中非全日制成人学生人数的增加,也就是本文所提到的第二种“纵向延伸”模式。

(四) 普及化阶段学生生源不确定性

数量上的增长和增多是高等教育扩张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在质的层面上的转变。其中一个质的转变体现在教育需求者层面上,即进入大学的学生群体在家庭背景、学习需求、学习参与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不同学力层次、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拥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各个类型、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学习。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高校培养目的更多集中于将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高能力、高品格的社会劳动者,而不仅仅局限于在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培养的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精英或领导^[2]。大学生的来源也不仅仅是传统的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同时也包括了其他大学的在校生、社会工作者和外国学生等。

二、纵向延伸是普及化的主要推力， 学生社会构成多样化

美国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主要以纵向延伸为主，学生群体在性别、族裔及入学年龄等方面都产生了变化。

（一）高校女性注册学生比例增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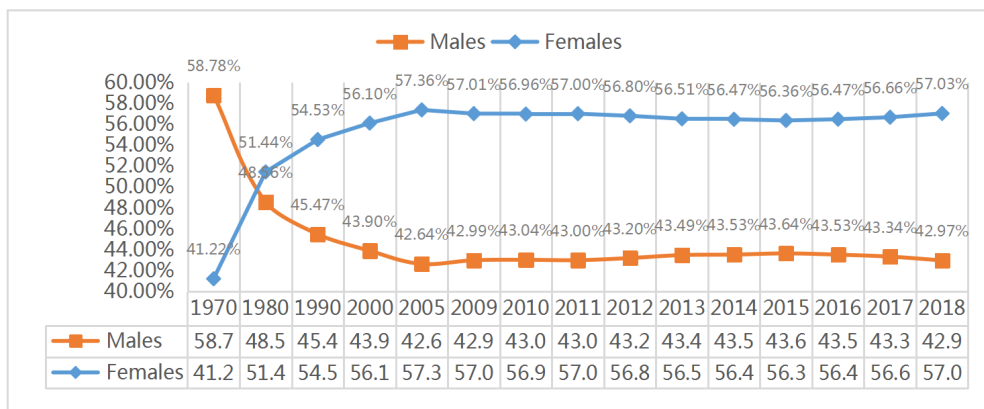
目前许多教育理论把对学生的假设和概念丝毫未有性别区分地加之于笼统的全部学生上，在一些研究中，还会把男性作为研究对象的结论应用于女性。

基于以上说到的教育公平和性别公平，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问题一直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了保证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程度的提升，联邦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法案以缓和男女受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那么，随着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到普及化阶段，高校中的男女性百分比有什么变化和突破？

根据数据显示，1970年，美国高校中授予学位的女性入学人数比例已到达41.22%，1980年，达到51.44%。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注册学生中女性比例不断攀升，2005年就已达57.36%，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保持稳定，如图2所示。

通过图2可以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入学人数都一致呈现增长状态，但差别在于高校内女性入学人数比例不断增加，男性学生比例则下降，从而达到了男女性在人数上的男女入学机会均等；1980年以后，女性获得入学机会已经超过了男性，并且女性的机会优势日益显现。



数据来源：<https://nces.ed.gov/>

图2 1970—2018年美国授予学位高校注册学生男女性百分比变化

导致数据变化明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美国联邦政府为提升和扩大高校入学人口数量而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法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包括《高等教育设施法》在内的三个修正案颁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纳税人减免法案》分别颁布在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大学成本降低和入学机会法案》《高等教育机会法案》《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在21世纪颁布。以上这些法案都是联邦政府通过向学生提供相应的助学金和贷款等经济支持，增加了适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适龄学生进入高校的热情和积极性的提高与美

国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收入不断提升存在很大关系。

其次，受21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推动，女权主义者们开始为女性发声，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逐渐暴露出来，她们强烈要求女性应有的权利。自此，美国社会关注焦点的转变从性别角色到性别平等。在教育领域，女权主义者要求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男女生享有相同的入学条件，另一方面，在女权运动的大范围影响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开始逐渐觉醒和清晰，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可发挥的社会作用，不仅仅只是家庭妇女这一单一角色，她们对自

己的人生开始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更有自我认知的尝试,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成为了越来越多女性的选择。在女权运动和联邦政府法案颁布的共同作用下,女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人数开始显著增加。

(二) 高校少数族裔学生构成多样化,各族裔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黑人学生的比例不断增加,其主要原因来自于1970年左右颁布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由表1可知,1976年,黑人学生的比例达到了9.6%,并且,在此后的不断发展中,2010年已经提高到了15%,然而,这一时期白人学生的比例已发生改变,下降至62.6%的比例(见表1)。

根据研究数据表明,在1971年,美国全日制大学生中,第一代大学生比例为38.5%,然而在2005年,大约30年后,这一比例已惊人的降低至15.9%^[3]。少数族裔一直在第一代大学生比例中占据主要位置,其中,第一阶为

西班牙裔和非美国裔,69.9%为西班牙裔学生,62.9%的比例来自非美国裔,第二阶为印度裔和亚裔,44.8%是印度裔学生,42.5%为亚裔学生。同时,每个族裔中的第一代大学生比例自1970年以来在不断减少^[3]。

其中,这些第一代大学生大多从普通的公立高中毕业,并且,毕业于私立高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人数比例在1975—2005年间不断下降,这一比例从13%降至7.5%,由此可见,第一代家庭毕业生倾向于在公立高中就读^[4]。

更加细致的研究数据显示,1971年有42.5%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进入公立的四年制高中,30.5%的学生进入私立学校就读。并且,无论是在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家庭第一代学生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公立以及私立学校里家庭第一代学生的比例差距从1971年的12%递减到了4.7%^[3]。

表1 1976—2018年美国授予学位高校注册学生族裔百分比

年份 \ 族裔		1976	1980	1990	2000	201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白人	白人以外族裔	黑人	拉美裔	亚洲裔和太平洋诸岛	亚洲裔和太平洋诸岛	阿拉斯加原住民	其他				
白人		84.3	83.5	79.9	70.8	62.6	59.3	58.3	57.6	56.9	56.0	55.2	
白人以外族裔		15.7	16.5	20.1	29.2	37.4	40.7	41.7	42.4	43.1	44.0	44.8	
白人以外族裔	黑人	9.6	9.4	9.3	11.7	15.0	14.7	14.5	14.1	13.7	13.6	13.4	
	拉美裔	3.6	4.0	5.8	9.9	13.5	15.8	16.5	17.4	18.2	18.9	19.5	
	亚洲裔和太平洋诸岛	1.8	2.4	4.3	6.6	6.3	6.4	6.6	6.8	6.9	7.1	7.3	
	亚洲裔和太平洋诸岛	亚洲裔	-	-	-	-	6.0	6.1	6.3	6.5	6.7	6.8	7.0
		太平洋诸岛	-	-	-	-	0.3	0.3	0.3	0.3	0.3	0.3	0.3
	阿拉斯加原住民	0.7	0.7	0.8	1.0	1.0	0.8	0.8	0.8	0.8	0.8	0.7	0.7
其他	-	-	-	-	1.6	2.9	3.3	3.5	3.5	3.7	3.9		

数据来源: <https://nces.ed.gov/>

(三) 25岁以上学生入学率不可小觑

近50年(1970—2018年)的数据显示,驱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力量主要来自于18~24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但25岁以上人口的入学率增长亦不可忽视。严格意义上说,这虽不是当代学生群体的结构特征,但经过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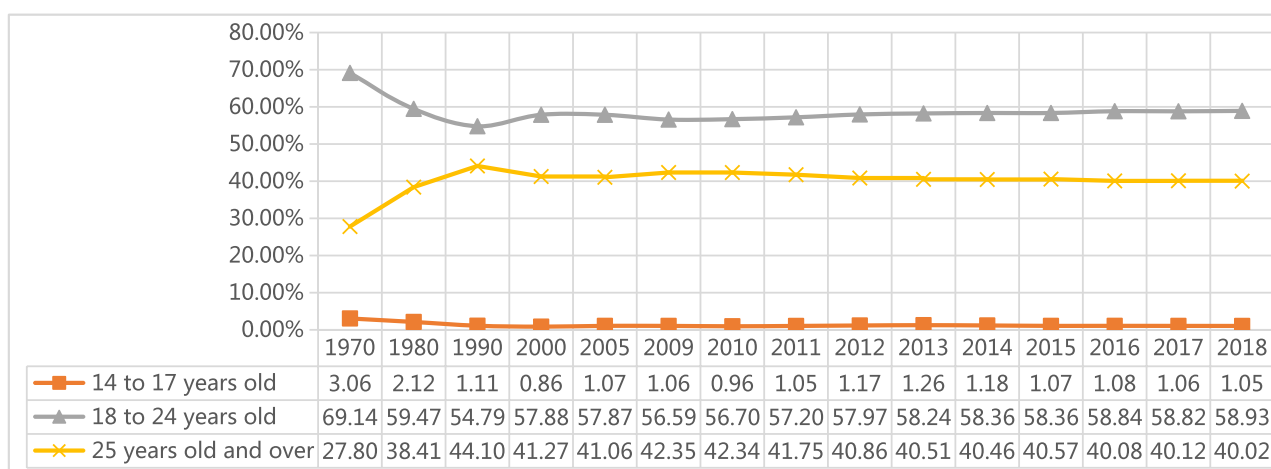
50年的发展,这种趋势日渐明显,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展示了美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在年龄意义上的可能空间。

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18~24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自1990年以来始终

保持在 57% 上下浮动。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25 岁以上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普及化初期的 27.8% 升至 1990 年的 44.10%，增长了约 17 个百分点。之后的 30 年间，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尽管逐渐减少，但这个年龄段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然在 40% 上下浮动。

同时，从图 3 还可以看出，到了 1990 年，18~24 岁年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比例与 25 岁以上年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比例的情况基本相同，而在此之前，18~24 岁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明显高于 25 岁以上人口。

此外，从图 3 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近 30 年来 25 岁以上人口的入学率变化非常缓慢。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其实并不是其高等教育成就的，因为这将很多入学的大龄学生（超过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年龄阶段）排除在外。事实上，从图 3 可以看出，在美国刚刚进入普及化阶段的 20 年里，美国 25 岁以上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 27.8% 增长到 44.10%，从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看，这将近 17 个百分点的提高实属珍贵和难得。



数据来源：<https://nces.ed.gov/>

图 3 1970—2018 年美国高校学生占相应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图

（四）两年制非全日制学生比例增加明显

2011 年美国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在 2011 年发布的数据表明，

从 1970 年开始，美国高校的非全日制学生比例不断增长，在 1990 年已有将近一半的非全日制学生就读，该比例达到 43%（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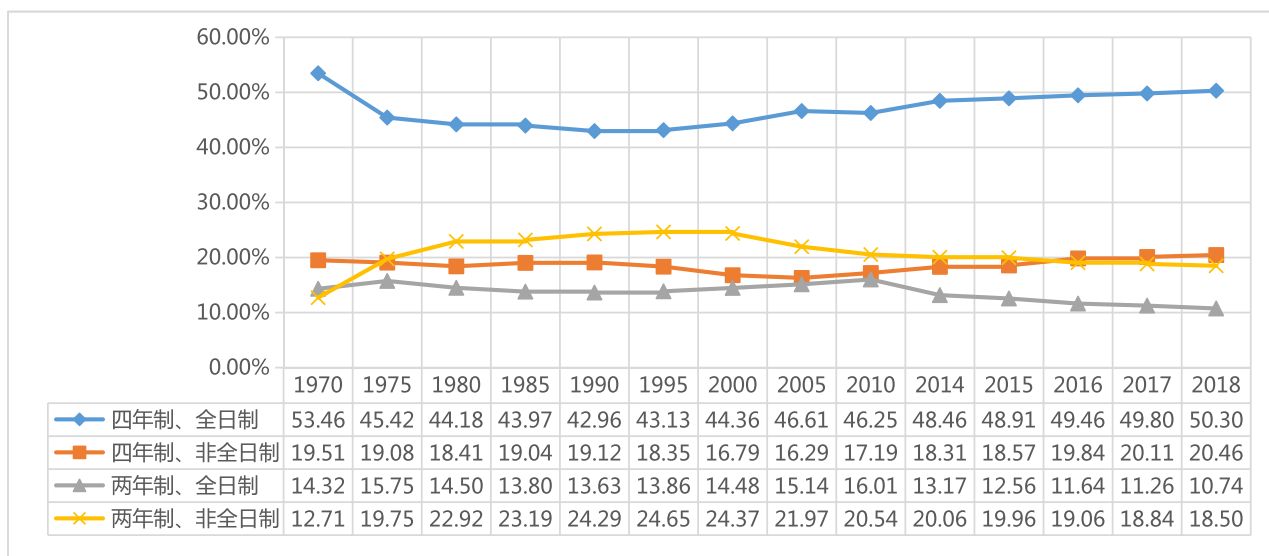
表 2 1970—2018 年美国授予学位高校非全日制学人数及百分比

年份	人数	百分比	年份	人数	百分比
1970	2,764,597	32%	2005	6,690,464	38%
1975	2,764,597	39%	2010	7,932,256	38%
1980	4,998,937	41%	2014	7,754,628	38%
1985	5,171,834	42%	2015	7,700,692	39%
1990	5,997,652	43%	2016	7,721,590	39%
1995	6,132,979	43%	2017	7,702,010	39%
2000	6,302,689	41%	2018	7,654,197	39%

在不同层次院校中，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比例相差很大。有数据表明，在美国四年制院校中，研究生和本科生投入学习的时间很不一样，如果将公立院校、私立院校中的非营利以及营利性学校的学生作为百分之百的比例，则这三类院校本科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比例分别为32.8%和8.6%，56.3%和12%，31.9%和8.6%，前者为后者的4倍左右。而研究生的情况则不太一样，前两类院校（公立和私立院校中的非营利）全日制研究生比非全日制研究生比例略低，分别为4%和5.1%，11.3%和

12.7%；而私立营利性院校中研究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比例则为9.2%和2.5%，前者的比例比后者要高出近3倍，这表明在私立营利性院校中，研究生更倾向于全日制学习。

两年制学院中，公立院校的本科生更倾向于部分时间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比例分别为18.7%和29.3%），而私立院校的本科生则更倾向于全日制（私立非营利性院校的这两者比例分别为1.2%和0.5%；私立营利性院校中为23.5%和3.1%）。



数据来源：<https://nces.ed.gov/>

图4 1970—2018年不同层次学校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生比例分布变化图

图4反映的是1970—2018年期间，不同层次院校中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生）的比例分布情况。在这里，100%代表的是美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所有学生。在普及化初期（以1970年为例），四年制院校中全日制学生比非全日制学生的比例要高33.9%，而在两年制院校中，这个比例则只高1.6%。然而在进入普及化后的20多年，尤其在1995年，这个变化最为明显，四年制院校中全日制学生比非全日制学生的比例高24.8%，比1970年减少了9.1个百分点，更有趣的现象是，在两年制院校中，全日制学生比非全日制学生的比例则低了10.6%。

总的来说，自美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来，两年制院校（绝大多数为社区学院）

非全日制学生在该层次院校学生总数不断增加（除在2000年后有下滑趋势，但总体增加），即这类院校中有更多学生选择的是业余学习。从图4还可以计算得出在美国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整个高等教育中，以较为显著的1995年为例，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的比例分别为56.9%和42.9%，可见在美国有近四成的学生是通过业余时间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不可谓不高。

三、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义务，学习经历多样化

（一）学生学习背景多元化

根据三阶段理论的划分，且伴随着社会的

发展，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已逐渐成为人人都应履行的义务，不再是精英化阶段的特权和大众化阶段的权利。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严格的能力限制已不再是必须的，也就是，我们开始认为，进入大学学习前不一定必须要有达到水平的学术能力，现实情况也出现这样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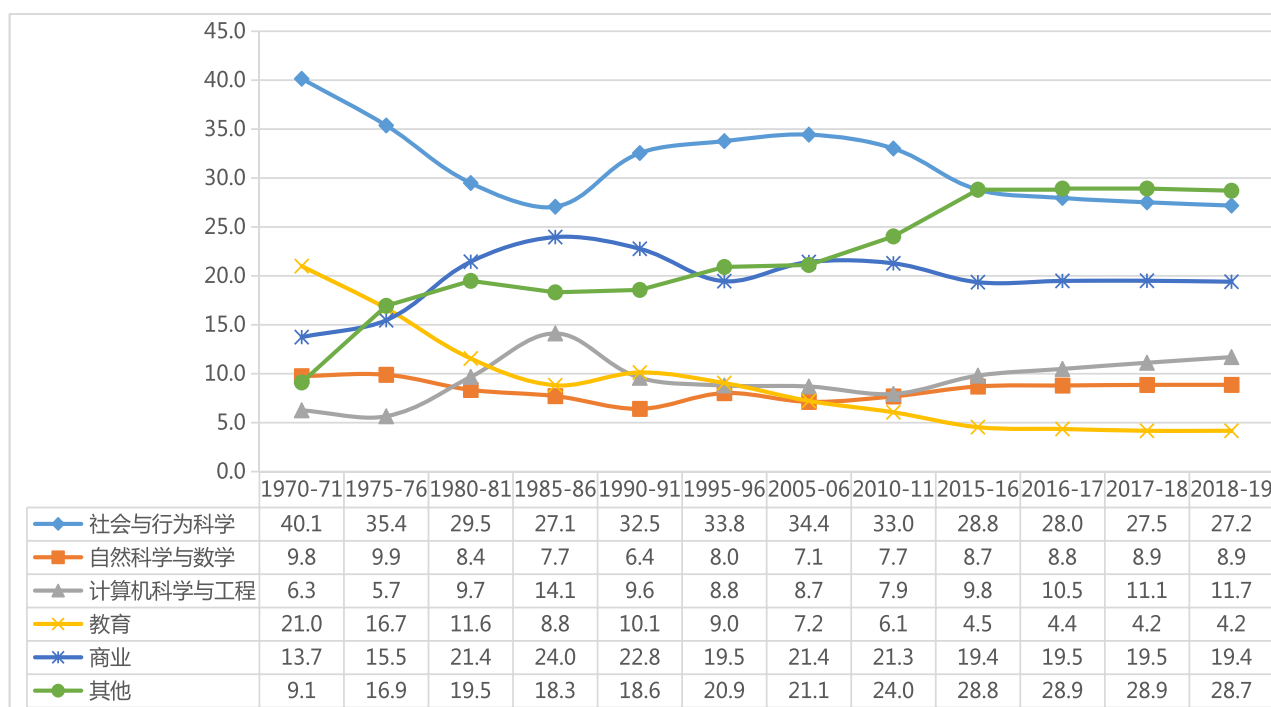
（二）学生学习目标多样且复杂

进入大学逐渐成为一种义务且高等教育目的不明确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一个现实问题。大学生群体的学习目标在普及化阶段的各个时期也发生了不同的改变，逐渐出现了更多的学习目的和目标，学生有的为了求知，有的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或阶级跨越，有的为了学习后提高生活质量，有的为了布鲁贝克所谓的“认识论”中满足对高等知识的“闲逸”好

奇心，有的求学目的或许更加多重多样。

数据显示，1967年，85.8%的学生的求学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加有意义的生活。然而在2006年，这比例已经递减至46.3%；同时，1967年，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经济基础是41.9%的学习动机，在2006年这一学习动机的比例达到了73.4%，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5]。

1970年以来，美国高校入学人数比例较高的学科包括了行为社会科学（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信息科学与工程（Computer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教育（Education）和商业（Business）等。然而10年后，学生对于专业选择的兴趣逐渐转向商科，获得商科学士学位的高校学生比例在1985年达到了24%，获得教育领域学士学位则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且在接下来的30年里，此比例不断下降^[5]。



数据来源：<https://nces.ed.gov/>

图5 1970—2018年各研究领域本科学位授予百分比变化

四、启示

通过以上对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生群体多样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转变不仅仅是入学人口和年龄上的变化，学生群体的社会组成和学习经历也有很大差异和异质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经验值得学习，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根据中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需求特征，并基于中国本土将其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具有不同学习经历的学生，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多种教育选择。由于学生来源的复杂性、个人的独特性和入学动机的差异

决定了他们的教育选择的多样性,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调整传统课程的教学方法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研究发现,在课程方面,高等学校往往注重丰富性,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应该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需求而专门设置开设一些课程,满足其个性化要求。例如,在课程学习方面,高等教育机构应尽力消除“非传统学生”学习的时间和障碍,并努力为他们提供灵活便捷的学习方法,以帮助学校满足“非传统学生”的学习愿望。由此可知,从精英化阶段过渡至大众化阶段,再平稳地进入普及化阶段的过程中,一系列颇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和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在中国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前期,能够适当借鉴欧美国家,从政策颁布和学生角度出发,高等教育的改革尤为迫切。

参考文献:

- [1] 高书国. 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模式 [J]. 世界教育信息, 2006 (9): 34-36.
- [2] [美] Martin A. Trow. 高等教育の構造変動, 高学歴社会の大学: エリートからマスへ [M]. [日] 天野郁夫, 喜多村和之, 等译.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6: 53-123.
- [3] SAENZ V B, HURTADO S, BARRERA D, et al. First in My Family: A Profil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t Four-Year Institutions Since 1971 [M].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2007: 6, 10, 7.
- [4] ASTIN A W, OSEGUERA L, SAX L J, et al. The American Freshman: Thirty-five Years Trends [M].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2002: 53.
- [5] ASTIN A W, SAX L J, PRYOR J H, et al. 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or Fall 1966—2005 [R].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1966, 1974, 1984, 1994, 2005.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tudent Groups in the Stage of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 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nrollment opportunities, student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e in terms of age,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tudents who a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actively accept plac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U.S. mass and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roup of U.S. mass and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nd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ina.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from 1976 to 2018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s in social composition, learning need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group and GDP.

Key wor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diversification of student groups; NCES

■社区教育

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刍析

胡啸兵^{1,3}, 胡宏力^{2,3}, 赵军镜^{1,3}

(1. 西安欧亚学院教育创新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2. 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3. 西安高新社区教育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社区教育社会功能是受社会发展需求牵引在其对居民个体育人功能基础上形成的服务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性功能。从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生作用过程和新时代我国社区教育需求结构和作用的社会职能领域看, 其社会功能应具备政策宣传、能力提升和实践推进三大功能类型和党性党史教育、社会法治教育、社区治理服务、就业创业教育、文化建设服务、绿色环保教育等六大功能板块。针对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结构内涵和发展需要, 应从树立大局意识、服务国家战略, 建立联动机制、促进社会协同, 加强政策引导、增加评价权重, 推行开放模式、凝聚社会合力, 充实课程资源、夯实教学支撑, 革新技术手段、扩大普惠效应等方面具体推进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建设。

关键词: 新时代社区教育; 教育社会功能; 内涵结构; 社区教育建设

中图分类号: G7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39-06

一、引言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 社区教育是面向社区居民开展的普惠性全民终身教育活动。21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区教育需求不再局限于文化普及、职业技能等社区居民生存性和生计性需要, 而越来越转向居民生产、生活及精神层面等更具发展性的教育学习领域, 同时社区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其他社会事业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 社区教育的社会功能需求也因之不断更新和拓展。社区教育需求的变化, 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社区教育既有功能定位, 对社区教育功能的理论讨论也因之逐渐活跃, 迄今出现了人与社会双功

能论^[1]、教育补偿论^[2]、本体功能与派生功能论^[3]、社区治理功能论^[4]、因地制宜功能论^[5]等多种代表性观点, 学者们对社区教育功能做了多视角、多维度理论分析, 也注意到了社区教育针对居民个体的育人功能与服务社会发展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区别, 为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但聚焦于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专门研究较少, 其中孙灿成^[6]率先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究, 提出社区教育除了具备育人功能外, 还具备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服务等社会功能, 缪涛江^[7]以无锡新区为例重点阐述了社区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的转型促进、移风易俗与教育帮扶等社会功能, 米海敏等^[8]认为社区教育主要具备包括社区治理、文化传播与公民素质提升

收稿日期: 2021-12-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话语交往质量提升路径研究”(19JDSZK170)

作者简介: 胡啸兵, 男, 陕西蓝田人, 应用经济学博士, 西安欧亚学院教育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西安高新社区教育研究院院长助理, 主要从事社区教育研究。

等社会功能,这些研究多从社区教育育人功能延伸开来讨论其社会功能,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内涵的分析揭示较为片面,未能从新时代我国社会总体发展大局和实际需要出发予以系统全面研究,因而所得研究结论的实践参考价值具有一定局限性。

党的十九大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水平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我国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客观上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提出了社会化、多样化、立体化的更高要求,如何全面准确认识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要求,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进行内涵调整和合理定位,是新时代我国社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方向性问题之一。本文立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审视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需求结构,进而对新时代我国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内涵结构进行审视和重构,并提出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具体建设路径,以其为新时代我国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建设和社会化创新发展,提供理论认识基础和实践路径参考。

二、新时代社区教育功能的社会需求考察

社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开放教育形式。陈乃林[1]指出,“关于社区教育的功能,就其基本方面可概括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区全面进步两大功能”。从社区教育作用的对象看,社区教育直接服务社区居民生存、生产和生活教育需求,具有促进社区居民个体全面发展的基本教育功能;从社区教育所处的社会系统看,社区教育是具有特定系统功能的社会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通过针对社区居民的教化育人活动以促进社区全面发展的社会功能。

(一) 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形成发展机制

社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生发于社区教育直接作用于社区居民的基本教育功能基础上的,

能够影响社会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乃至社会系统整体运行发展的衍生性功能。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到社区教育基本功能的基础制约,同时又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大系统整体环境的限定和规范。人类社会系统是一种处于持续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动态系统,社会系统的动态发展决定了受其限定和规范的社区教育社会功能也必然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形成和发展是社区教育小系统本身基本教育功能内因约束与社会大系统对社区教育小系统功能需求外因牵引共同决定的动态过程。教育价值导向、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育评价标准等社区教育教学育人基本功能的具体内涵及实现形式的变化将改变其社会功能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进而引起社会功能内涵及其实现形式的变化,社区教育教学育人基本功能由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与技术发展水平等社会基本条件决定,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与技术发展水平为发生明显质变时,社区教育基本功能也会保持稳定;在社区教育基本功能既定条件下,其社会功能的动态变化主要受到社会系统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对社区教育功能需求变化的牵引,社会系统结构变化既包括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的明显质变,又体现在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在特定发展阶段目标、规划及相应实践作用下保持本质特征不变所发生的渐进量变,社会系统内部发生的渐进量变是特定稳态社会中社区教育社会功能需求变化的主要动因(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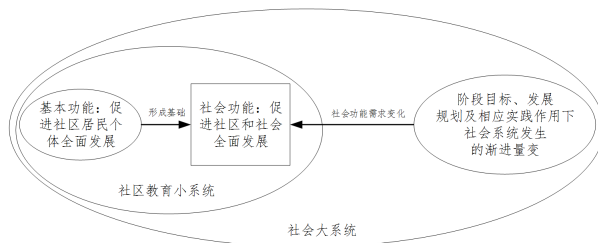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形成发展机制

(二) 新时代社区教育功能的社会需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清晰勾画了203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在为新

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指明方向的同时,也蕴含着对我国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展的新需求。立足新时代我国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社区教育功能的社会需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党的建设教育需求。党是领导和推动社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加强党史教育学习,不断推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对社区教育功能提出了党建新要求。

第二,社会法治教育需求。法治中国与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新时代社会发展愿景的重要内容,对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推动城乡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出了新的法治教育需求。

第三,社区治理教育需求。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社区教育通过法治教育、管理教育等具体形式服务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四,就业创新教育需求。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针对欠发达地区或经济困难群众生活生产需要,加强就业技能、致富技能、发展技能的教育培训需求,不断推动城乡教育普惠性和均等化发展,加大城乡教育均等化供给,以公平、均等、普惠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是社区教育服务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着力点。

第五,文化繁荣教育需求。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繁荣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提升社区群众文化素质,针对留守儿童、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加强针对性社区教育关怀力度,从而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群众基础,是新时代国家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对社区教育提出的重要社会需求。

第六,绿色发展教育需求。新时代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倡导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社区教育功能注入了绿色发展新需求。

三、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内涵结构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催生了社区教育新的社会功能需求,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内涵结构必须对标新的功能需求进行再审视和适应性调整,这样才能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匹配,更好发挥社区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 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结构框架

因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需求变化,结合社区教育服务新时代“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和“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国家战略推进实际需要,依据社区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党和国家建设以及其他社会事业发展关联关系,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进行再定位,其社会功能总体结构框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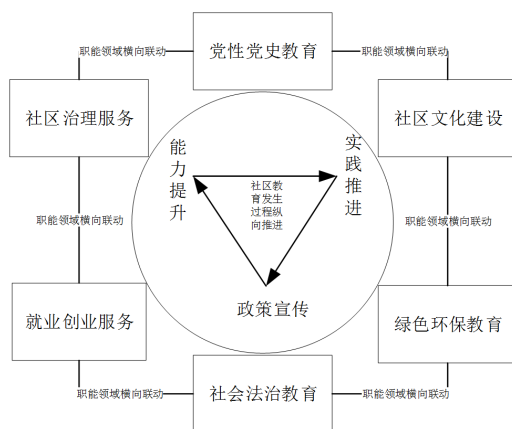


图2 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结构框架

从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生作用的过程环节看,社区教育是一种始于思想教化、发于能力培养、并最终作用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社会化开放式实践性教育活动,社区教育社会功能也因其发生作用过程环节不同可划分为政策宣传、能力提升与实践推进三大功能类型。同时,从社区教育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职能领域看,新时代社区教育必须回应党和国家关于社会发展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以及因之产生的各类教育需求,对标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需求结构,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相应地也具有党性党史教育、社会法治教育、社区治理服务、就业创业教育、文化建设服务、绿色环保教育等六大具

体功能板块。基于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生作用过程的纵向三大功能类型与针对具体社会需求和教育职能领域的横向六大功能板块,构成了贯通政策宣传、能力提升、实践推进等多环节和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区发展与党和国家建设等多方面的立体化社区教育社会功能体系,三大功能类型与六大功能板块之间通过社区教育发生过程与社会发展职能领域交织互动相互影响,以纵横交错的网格化系统联动方式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二) 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具体内涵

从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生与作用的过程分解看,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包括政策宣传、能力提升和实践推进三大功能类型。社区教育活动作用于社会系统,在思想层面主要表现为向社区居民开展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历史和国家发展战略宣讲、法律与文化知识普及等具体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教育活动所发挥的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可称为政策宣传功能;在政策宣传和知识普及基础上,社区教育活动会进一步影响和塑造社区居民发展能力和社区治理能力,一方面表现为社区居民接受创新创业技能、就业技能、职业技能、生活技能等各类型社区教育技能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表现为社区管理队伍接受社区矛盾化解、社区物业管理、社区运营维护、社区环境治理等各类型管理能力教育培训,这些社区教育能力培训发挥的主要功能在于提升社区居民发展能力和社区管理队伍治理能力,可称为能力提升功能;在政策宣传和能力提升外,作为与社会实践存在天然密切联系的开放式社会化教育活动形式,社区教育活动尤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它通过在社区居民中广泛开展文娱活动、绿色环保实践活动、党史教育实践活动、平安社区创建活动、文明组织创建活动、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等各类型实践教育活动,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建设实践高质量发展,这些实践性社区教育活动发挥的社会功能可概括为社区教育的实践推进功能。

从社区教育作用于社会职能领域和响应新时代社会需求看,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具有党性党史教育、社会法治教育、社区治理服务、就

业创业教育、文化建设服务、绿色环保教育六大功能板块。结合新时代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实际需要,可以进一步对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六大板块的具体内涵做如下厘清:第一,党性党史教育,针对社区党员居民开展党性修养和党史教育学习活动,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纯洁性和战斗力,以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第二,社会法治教育,对社区居民进行普法教育,推进法治社区建设,进而促进平安中国和国家法治建设的社区教育功能。第三,社区治理服务,主要是社区教育发挥教育培养社区居民规范社会行为和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管理服务技能作用,以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社会服务功能,其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强应对疫情的防疫应急教育,是社区教育服务社区应用治理能力建设的新的新功能。第四,就业创业教育,主要是针对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群体开展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以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和提升弱势群体经济收入,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第五,文化建设服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为指导,推动公民道德教育、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青少年科学精神教育、家风家教教育等社区公民教育服务发展,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增进社区居民美好文化生活获得感、培养和塑造积极健康的社区文化风尚的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第六,绿色环保教育,是对社区居民进行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知识宣讲,宣传普及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助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健康生活风尚,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和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实现。

四、新时代我国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建设路径

对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结构和内涵进行理论厘清的目的是为社区教育更好发挥社会功能促进新时代社会全面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的。针对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新定位和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新时代我国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建设路径,以推动社区教育功能切实转化

为促进社区建设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

(一) 树立大局意识,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国家战略需求是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展的牵引力量, 从我国社会发展大局出发,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是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从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着眼谋篇布局社区教育发展, 积极主动加强社区教育发展规划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功能对接, 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推进新发展理念宣传、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能力提升和新发展目标实现中的促进作用, 应成为当前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建设的基本原则。

(二) 建立联动机制, 促进社区教育社会协同

社区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区教育社会功能是建立在社区教育与社会其他部门和其他事业密切联系基础上的。坚持系统性思维, 研究社区教育与社会大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治理、生态及其他方面要素的协同联动机制, 不断拓展社区教育服务其他社会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同时调动和激发其他社会资源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潜能, 促进社区教育与其他社会事业之间形成正向反馈、协同共进的良性发展互动模式, 是新时代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实现机制建设的重要工作。

(三) 加强政策引导, 增加社会功能评价权重

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在社区教育发展评价中增加社会功能的权重, 有利于推动社区教育向更充分实现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 在社区教育发展政策和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中, 要确立社会功能与基础育人功能并重的政策导向, 不仅要重视基础性育人功能建设的政策支持, 更要加强对社会功能建设相关政策的研究设计; 另一方面, 在社区教育发展评价和工作考核中, 要提高社会功能相关指标的权重比例, 建立社会功能发展的有效工作激励机制, 通过评价考核和激励奖惩调动社区教育发展向更有利于社会功能建设的方向推进。

(四) 推行开放模式, 凝聚功能建设社会合力

各级公办社区学校是承担社区教育发展和实现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教育主体, 其他各类社会办学机构是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实现的社会化补充力量。一方面, 应发挥公办社区学校主体作用, 在公办社区学校中推行开放办学模式, 鼓励各级公办社区学校向社区、学校、企业、园区等社会机构开放教学资源, 引导公办社区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开展合作办学, 推进公办社区学校社会化社区教育基地网络建设, 为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主体机构支撑; 另一方面, 应积极培育和扶持给类型社会办学机构发展, 通过企业办学、社会团体办学、社区自主办学和居民自主性学习组织建设等方式, 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建设中来, 不断凝聚和壮大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建设的社会合力。

(五) 充实课程资源, 夯实社会功能教学支撑

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 在具体实践层面主要依赖于具体的社区教育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应针对社会需求, 加大相关社会资源整合和社会服务性课程开放力度, 构建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教育课程体系, 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党的建设、疫情防控、智慧助老、家庭教育等社会发展急需的社区教育课程集群, 锻造一支具有社会服务意识、社会发展视野、社区教学能力的社会化社区教育师资队伍, 为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社会化教学资源和师资保障。

(六) 革新技术手段, 扩大社区教育普惠效应

新时代是数字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 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社区教育的覆盖面和可及性将得到空前提升, 更有利于发挥影响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应在社区教育中积极推行教育管理、教学方法和教育评价的数字化技术革新, 打造社区教育大数据管理平台, 开发社区教育微视频课堂, 建设社区教育慕课资源库, 推动城乡社区教育资源共享网络建设, 构建社区教育自主

学习数字终端矩阵和服务体系,通过数字化网络化自主化方式不断扩大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普惠广度与深度。

参考文献:

- [1] 陈乃林. 解读社区教育的本质与功能[J]. 当代教育论坛, 2003(11): 89-91.
- [2] 郝有隽. 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历程与启示[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 [3] 李惟民. 社区教育功能的定位与构建[J]. 当代继续教育, 2018, 36(06): 15-22.
- [4] 吴遵民, 蒋贵友. 公共危机背景下社区教育功能再思考——基于社区治理的视角[J]. 教育研究, 2020, 41(10): 92-101.
- [5] 孙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功能定位探析[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02): 92-96.
- [6] 孙灿成. 社区教育社会功能初探[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02): 116-120.
- [7] 缪涛江.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教育社会功能的探索——以无锡新区为例[J]. 江南论坛, 2015(06): 26-27.
- [8] 米海敏, 郭胜. 终身教育视阈下社区教育的社会功能探析[J]. 经济研究导刊, 2021(06): 141-143.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U Xiaobing^{1,3}; HU Hongli^{2,3}; ZHAO Junjing^{1,3}

-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nnovation,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3.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Xi'an Hi-tech Zon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functions that serve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support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to serv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have three functional types (policy publicization, capacity improvement and practice promotion) and six specific functional blocks (education of the spirit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cial rule of law educ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servic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ervice,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1) a sens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2) a linkage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promote social coordination, 3) policy guid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weight of evaluation, 4) an open model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unite all social sectors, 5) curriculum resources should be enriched to consolidate teaching support, and 6) technical means should be innovated to expand the inclusive effects in view of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social function structur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oci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connotation 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 教育教学改革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实践研究基本架构

——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通识课程

张小虎, 黄鑫, 卢卓元

(西安欧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侧重“一流课程”建设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 分析了研究背景, 述评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介绍了已有通识课程建设与研究基础后, 提出了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并对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创新特色、价值意义与研究思路及其所依据的理论进行了阐释说明, 为进一步构建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西安欧亚学院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促进一流通识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做先导。

关键词: 一流课程建设; 通识课程; 线上线下教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 西安欧亚学院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45-09

2020年初,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拉开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在线教育实践帷幕, 2021年12月, 新冠肺炎疫情在西安大规模复发, 打破了西安的平静。面对疫情, 西安各高校全面开展线上教学。伴随着疫情时期及其疫情后在线教育的大量涌现, 大学教育形态正悄然发生了变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模式更有效地定义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将成为高等教育的“新常态”。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混合式课程教学设计是成功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关键。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从2012—2021年连续数年将“混合式学习设计”与“混合学习模式的广泛应用”列为促进高等教育领域技术运用的关键趋势。国外对混合式课程教学设计的研究更关注对混合式教学具体环节的设计。例如: 混合式教学交互的设计^[1-2]、

教学策略的设计^[3]、教学环境的设计^[4]、评价与反思的设计^[5-6]、工具与资源的设计^[7-8]等。国外对混合式课程教学具体环节与实践设计突显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而国内则较多聚焦于混合式教学全过程的设计^[9], 其实践与研究一般侧重支撑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有学者对近十年国内外混合式教学文献分析比较后发现, 国内论文大多只在澄清混合式教学概念, 介绍和探讨顶层设计理论, 但国外更倾向于针对具体教学情境去验证、探索混合式教学的设计和 implement 策略, 在实践研究上积累颇丰^[10]。

根据有关文献国内混合式课程教学设计与教学模式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以活动为中心, 此类研究大多基于活动理论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 强调混合式教学中的活动设计^[11-12]。第二, 基于技术环境视角, 此类研究大多从支持混合式教学的技术环境视角出发

收稿日期: 2022-01-23

基金项目: 2021年度陕西省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欧亚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实践研究”(21BY177)

作者简介: 张小虎, 男, 陕西富平人, 西安欧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 智慧教育研究。

探讨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13-14]。第三,三段式,此类研究所构建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最终落脚为“课前一课中一课后”三段式模式^[15-16],这种模式更适合以线下面授教学为主导的混合式教学。尽管三种分类有时也相互交叠,但相比国外多关注如何利用混合式教学支持学生的学,国内实践则多关注如何利用混合式教学支持教师的教。已有调查研究发现,国内高校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大多仍然只是辅助、补充和促进课堂面对面教学,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并未发生本质改变^[17]。为了改变诸如此类传统的教学模式,2018年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号),第一次正式使用“淘汰‘水课’、打造‘金课’”的“金课”新概念(即“一流课程”)。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两性一度”,并适时提出了建设“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主张^[18];也有学者基于疫情期间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深度融合,认为弹性教学时空和多元教学方法的弹性教学以及面向个性化培养的主动学习将成为未来教育新“常态”,而主动学习的倡导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是迈向未来教育的基本动力^[19];也有学者认为后疫情时代应采用“双线教学模式”和“线上线下交换授课制”,进而打造混合式教学“新常态”^[20];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混合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能为学生创建一种真正高度参与性的个性化学习体验^[21];甚至有学者基于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出了线上线下融合(Online Merge Offline, OMO)教学新样态^[22]。

教学改革研究基于新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与5G发展态势和目前学术界最新研究动态,企图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综合“一流课程”建设要求与弹性教学及“互联网+”混合式教学的特点与优势,以西安欧亚学院重点通识必修课程“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线上与线下课程建设现状及其研究实践为基础,基于大学“一流课程”建设来建构欧亚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旨在改革通识课程传统教学弊病,解决目前民办高校优质

的教学资源单一,学生学习自主性不强、缺乏主动学习意识、线下教学与在线学习缺乏有机结合,课堂“低头族”泛滥,大量学生浅层学习与低效学习的问题,提高民办高校教学质量。

二、课程已有建设与实践研究基础

(一) 思考与创新课程

通识必修课程“批判性思维”,后升级为“思考与创新”是欧亚学院通识课程体系的建设比较成熟的DNA课程,其建设与研究实践基础如下:

2012年9月,西安欧亚学院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2013年9月,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秋夜青语”将新媒体技术引入课程中。2014年4月,与超星合作拍摄了7集“批判性思维”在线课程。5月,《学会独立思考(学习篇)》教程出版。10月,“在线教育与传统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以批判性思维课程为例”获批为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15年6月,《轻松学会批判性思维》教程出版。8月,周末“批判性思维训练营”上线。2018年9月,批判性思维课程升级版“欧亚思维课”获批校级重点课程。同年9月,与智慧树合作录制了32学时的“轻松学会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在线课程,目前课程上线并跨校共享,累计100余所高校2.71万人选修,获广泛好评。2019年“轻松学会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课程被陕西省教育厅认定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20年,“思考与创新”经申报被陕西省教育厅认定为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即陕西省“金课”。目前新编课程教材《思考的艺术——让创新成为你的DNA》已经出版,正在积极准备努力申报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二) 写作与表达课程

“结构化写作”,后改为“写作与表达”,是西安欧亚学院通识课程体系的建设比较成熟的DNA课程,其建设与研究实践基础如下:

2016年,西安欧亚学院开设“结构化写作”课程,16课时,1学分,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结构化写作能力。2017年7月,“结构化写作”通识课程被评为校级重点课程。2019年9月,

《结构化写作——让表达快、准、好的秘密》教材出版。同年“结构化写作”课时调整为32课时,2学分。2020年,与智慧树合作拍摄录制了32学时“妙笔生花的秘密——结构化思维与表达”MOOC,该课程目前完整运行4学期,30余所学校2万余人选课,本校学生万余人学习,课程线上与线下衔接,已经开始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同时开发B站写作短视频服务于教学,目前点击量1.5万余次。同年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并结项。2021年7月“写作与表达”课程经申报被陕西省教育厅认定为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即陕西省“金课”。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努力申报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三、基于畅课的通识课程线上与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

畅课(TronClass)智慧教学系统是西安欧亚学院为了适应未来智慧教育与“互联网+”混合教学而推出的以学生、教师与教务为中心,结合云端技术打造的学习、行动与社交一体化的在线智慧型教学管理平台。它致力于用领先科技促进现代教育,打破了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充分展现移动社交化学习、碎片化学习与泛在学习的时代特点,旨在运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为师生提供一个混合式学习的教学实践平台,为每一位学习者及教育者提供更贴近生活实际的新体验。畅课(TronClass)有助于通识课程“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互联网+”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以丰富课程教学资源,为学生创建一种真正高度参与性的个性化学习体验,促进并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深度学习,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进而建立起独立规划个人学习成长路径、提升自身数字化素养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的能力。

(一) 需解决的教学问题

1. 如何有效解决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

民办高校教师群体普遍年轻、教学经验欠缺,优质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等问题。因此,如何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

进而构建通识“一流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共享应用优质在线MOOC资源,对缓解民办高校发展中优秀师资缺乏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等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提升民办高校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是教学改革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 如何解决学生学习自主性不强的问题

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方法与学习评价单一,线上教学和线下学习缺乏有机结合与有效交流互动,往往忽视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和习惯培养,导致学生自主学习、独立学习时空狭小。甚至有的课程教学内容陈旧,缺乏课程“思政元素”与创新创业因素渗透,教学偏离需求和问题导向,致使一些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学习动力不足,缺少主动探究与批判质疑能力,课堂“低头族”泛滥。因此,如何在西安欧亚学院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构建混合式学习模式,解决学校课程线上教学与线下学习缺乏有机结合以及学生学习自主性不强与“低头族”泛滥为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3. 如何解决学生浅层学习与低效学习的问题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教室与教材为中心,教师教学大都照本宣科,很少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思维习惯,最容易导致学生浅层学习的动机,学生会将学习重点放在被控制的课程内容而非思维技能方面,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再加上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学生学习大都是碎片化学习,缺乏研究性、引导性、指向性和选择性,学习带有盲目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学生浅层与低效学习问题。因此,如何在西安欧亚学院开展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构建以深度学习和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解决大量学生浅层学习与低效学习将成为教改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 研究价值

1. 来源于民办高校发展与教学改革的迫切需求

民办高校快速发展对优秀师资与优质线上教学资源的需求:“互联网+”时代的“爱课程”“智慧树”等网络课程平台中的中国大学MOOC与国家线上“一流课程”资源,为民

办高校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供了发展机遇。诸多网络课程平台中有关线上优质资源如何在通识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中共享应用,缓解了民办高校发展中优秀师资缺乏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促进了民办高校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变轨超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 民办高校通识课程建设与培养学生获得核心通识能力的需求

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两门通识必修课程旨在培养和训练学生通用的分析和综合信息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而这些核心通识能力是学生谋求职业所必需的通用能力,项目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通识“一流课程”的建设构建“互联网+”混合式学习模式与评价模式,探索培养与训练学生的核心通识能力的有效实践路径,能为民办高校建设同类通识课程训练学生获得这些核心通识能力提供经验与借鉴。

(三) 实践意义

“互联网+”时代,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及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是顺应了新时代召唤和人工智能时代大学课程教学改革发展内在需求而产生的新型课程与教学模式,不但能推动民办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也具有解决通识课程教学问题的天然优势。教改与实践成功,将会解决民办高校通识课程教学中学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班级授课制统一性要求相矛盾的问题,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和习惯,以及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的需求,并且能推动跨时空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推广和利用,同时也能为提升课程教学互动效率提供新的可能性,促进学生学习效果反馈及时性和有效性。这样不但会加强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与学习效果,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而且还会加快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1. 目标

针对目前西安欧亚学院通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以“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通识课程为例,基于现代教育技术

与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要求建设西安欧亚学院通识课程,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学生创建一种高度参与的个性化学习体验,旨在通过通识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及其“互联网+”新型学习与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丰富学校教学资源、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改变大学生浅层化低效学习的现象,使“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能够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真正实现大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提高,从而促进欧亚通识“一流课程”建设,加强课程思政教学,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培养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创新性与创造性人才。

2. 内容

针对民办高校教学资源单一,线下教学与在线学习有机结合不紧密,学生学习自主性不强,大量学生浅层学习与低效学习等问题,基于现代教育技术与“一流课程”建设要求建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来改革传统课程教学以促进大学生进行“互联网+”混合式学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互联网+”混合式教学文献研究与学生学习需求调查。“互联网+”时代混合式教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上线下学习方式的组合,而是在线学习、移动学习与线下学习充分融合,是一种带来教学模式与设计变革的新的教学范式。通过文献搜集国内外混合式教学最新成果与线上线下“一流课程”建设成功范例进行研究,然后分析与精选各网络课程平台大学MOOC、校内通识SPOC与校本线下通识课程,借助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定义课程核心问题,掌握混合式课程建设与教学基本情况,加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

(2) 制定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方案。在梳理有关混合式学习发展历程,研究国内外基于建构主义、联通主义等学习理论指导的混合式教学成功案例基础上,结合“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及其教学模式建构,精心挑选线上中国大学通识MOOC、加工校内SPOC,完善线下通识课程“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教学大纲,依据学情与

学生混合式学习需求制定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方案,突出目标导向、学生中心,通识能力培养,注重线下教学与在线学习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两性一度”。

(3) 基于民办高校教学资源单一探索线上优质资源应用模式。民办高校的建设发展和公办高校相比具有发展时间短、教师群体年轻、教学经验欠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互联网+”时代海量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MOOC为民办高校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变轨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通过探索线上优质的大学MOOC资源如何在西安欧亚学院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中有效应用,对缓解西安欧亚学院发展中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促进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4) 基于深度学习的“互联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在研究“互联网+”时代深度学习特征及影响深度学习相关因素等内容基础上,探索研究“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如何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实现过程,研究课程思政元素如何在“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渗透,核心目标导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如何在通识课程中运用,以此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解决民办高校线下教学与在线学习缺乏有机结合,大量学生浅层学习与低效学习问题。

(5) 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评价研究。由于在线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痕迹的易获得性,学习分析评价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在线教学实践中。项目对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大数据与输出性评价,基于智慧学习系统搭建全程全方位学习记录平台,对学习者的学习进行大数据跟踪学习评价研究,以此探讨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多元评价、自主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模式,以此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深度学习与全面、特色个性化发展。

(6) 基于问题与项目驱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学校重点通识课程“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课程为例,

基于设计思维设计“一流课程”混合式教学,以问题与项目驱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增加合作、互动与交流,渗透课程“思政元素”与创新创业因素,融合创新混合式教学模式,减少低头率,培养大学生主动探究精神与批判质疑能力。通过研究与实践为学习者探索创建一个真正参与性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为民办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路径。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特色

1.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搜集国内外混合式学习相关文献、基本理论与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成功范例,全面把握近几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应用实践,吸纳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中最新成果,使研究有一个较高的立论起点。

(2) 调查研究。通过问卷、会议座谈、网上交流等多种方法了解在校师生对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的关注与需求,对学校课堂教学基本现状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把握项目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加强研究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3) 行动研究和案例研究。根据教师教学和学生特点,以通识“一流课程”建设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的行动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解决混合式教学中的问题为目标,结合案例边研究边行动边总结,将实效性作为成果可行与否的价值判断依据,在真实、开放、灵活与动态发展的教学情境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2. 创新特色

(1) 教学模式创新。引入连通主义理论与畅课(TronClass)云班课等现代教育技术,基于智慧教学平台优化整合课程学习资源,构建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弹性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2) 课程设计创新。引入美国“创新设计思维”,融入“互联网+”线上线下混合式通识“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创新设计之中,以问题和项目为导向,共享优质网络资源,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才。

(3) 学习模式创新。引入新建构主义与

跨界学习,从读纸质教材“硬知识”转向学习网络“软知识”与大学 MOOC 建设的诸多与课程紧密结合、具有鲜明通识特色的在线课程,师生共建“互联网+”“软知识”。

(4) 评价模式创新。引入大数据与输出型评价,构建“互联网+”智慧课堂混合式教学开放式考核评价体系,探讨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教学多元评价、自主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模式,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深度学习与全面、特色个性化发展。

(五)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搜集国内外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与国内“一流课程”建设改革成功范例,吸纳其最新成果,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其次借助智能化教学系统整理分析、归纳精选“爱课程”“智慧树”等网络课程平台中国大学 MOOC、校内 SPOC 与校本线下通识课程,借助问卷、座谈等多种调查方法掌握混合式课程建设与教学基本情况,了

解学生学习需求,定义课程核心问题,加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把握课题研究起点和基础。

针对学生学习需求和教学中存在问题,制定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方案,突出目标导向、学生中心与诸多教学要素创新,注重线上教学与线下学习有机结合,通识素质与能力培养,有效提升课程建设“两性一度”。第三,运用混合式教学多种要素创新,结合教学案例与行动研究进行全方位、多纬度实证性分析,将实效性作为成果可行与否的价值判断依据,以其探寻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有利因素、有效构成要素和制约条件,希望得出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与评价等核心要素创新形成机制。第四,通过示范教学进行验证、修补与发展成果,确保其有效性、实用性、先进性、复制性与示范推广,逐步推动通识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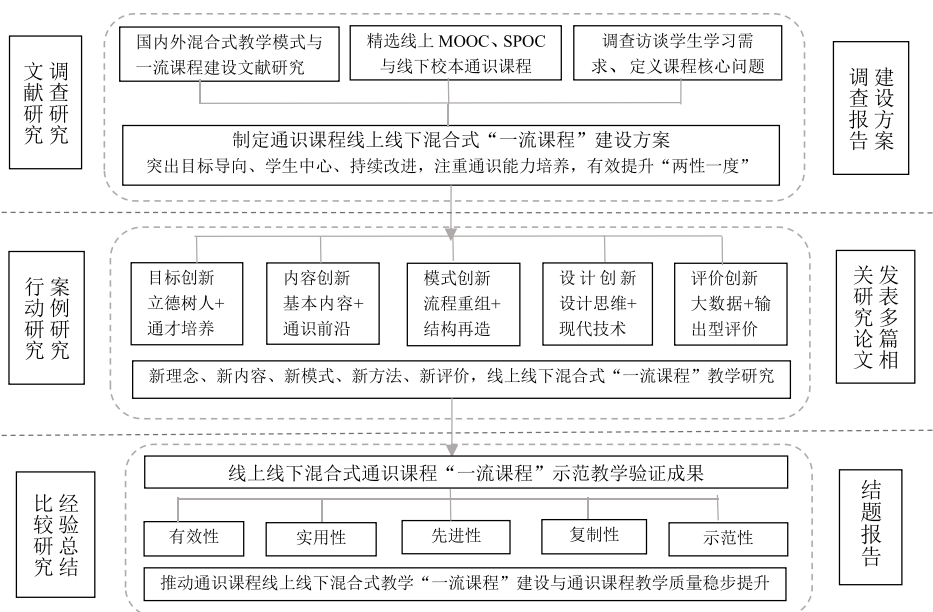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六、研究依据的基本理论

(一) 混合学习理论

混合学习理论大致产生于 20 世纪末,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e-Learning 在推动教育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教学思想,混合学习的理念由此开始产生。何克抗^[23]教授

认为,所谓混合学习(Blending Learning)就是把传统教学的优势与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既要发挥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引导、启发和监控作用,又要调动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混合学习在表面上是传统学习方式和网络

化学习的结合,而更深层次的结合包括:教学中教师主导地位和学生主体地位的结合;课堂教学与在线自主学习的结合;不同教学媒体的混合等等。因此,混合学习理论是教育理念和教学策略层面的变革,它与智能化课堂的教学与智慧课程的学习一样强调要尽可能融合所有的教学资源,混合运用多种教育技术工具,综合多种教师讲解、小组讨论、网络交互、项目实践等学习方式,为学习者提供多种多样的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混合学习理论使智能化课堂教学与智慧性课程多元学习形态与多元学习模式的融合发展有了理论根据,使教师能在全面、混合的立体智能化网络环境中运用新技术激发学习者“转识为智”来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

(二) 深度学习理论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Ference Marton和Roger Saljo^[24]进行了有关深度学习的研究,并于1976年联名发表了《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和过程》,首次阐述了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与浅层学习(Surface Learning)这两个相对的概念。浅层学习是一种被动、机械式的学习,忽视对知识的深层加工、深度理解及长期保持,无法实现知识建构、迁移应用及问题解决。而深度学习是指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学生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想和事实,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而且能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系,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并作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25]。深度学习的目的是发展高阶思维能力,实现有意义学习,其核心思想体现了批判、理解、整合、迁移、反思、创造等认知科学领域的概念。

“一流课程”的建设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构注重激发学习者主动学习、探索学习,注重将抽象的知识具象化,注重开放性内容的投入以促进大学生深度学习的进行,核心是培养高阶思维与创新创造型人才。混合式智能化系统建构的智能化课堂教学能促进大学生深度学习,能使学习者在理解基础上主动探究性的学习,能够使大学生进行深度的信息加工、主动的知识建构、批判性的高阶思维、有效的知识转化、迁移应用及实际问题解决,从而产生高层次思维,深层次的体验和内在品质

的提升,能促使智能化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实现。

(三) 情境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让·莱夫(Jean Lave)教授和独立研究者爱丁纳·温格(Etienne Wenger)于1990年前后提出的一种学习方式。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一个社会过程,并且要关注学习发生的社会文化情景,从而使学习有意义^[26]。

情境认知认为,当学习发生在有意义的情境中是最有效的,强调情境与学习者经验建立有意义联系,以促进知识、技能和经验提升。情境意识或情境化学习,已经成为有意义学习和促进知识向现实生活迁移的一个重要依据^[27]。情境认知揭示了学习的有效性离不开具体情境,无论这种情境是真实世界还是虚拟空间。即将到来的5G智能手机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无疑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学生创设了充满情境、探究与互动的学习氛围,营造更为丰富的环境,有助于探究学习、项目合作学习以及创客学习等的开展,能够充分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更好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协作、创新意识等能力。

5G时代基于“一流课程”的建设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智能化课堂教学的跨时空性、开放性与虚拟化为大学生课堂多种学习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支撑。因此,基于智能手机为工具的混合式智能化课堂应重视学习情境的设计,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新型教学方式,而且课堂教学内容应具有现实性、实用性和适用性,使学习者能在全面、立体化的网络课堂学习环境中实践新技术,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

(四)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Embodiment cognition)又译涉身认知、寓身认知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识论、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以及现象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探究人类认知、知识等话题的当代最新成果以及时代精神的核心体现^[28]。具身认知理论的学术

信条在于批判传统认知理论身体与心智、心智与世界以及知识与行动相割裂的一系列“离身”特征的二元论，并重建了认知的具身性、情境性以及生成性等维度^[28]。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源自身体的体验，环境是认知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学习过程是认知、身体和环境的动态统一过程，认知是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生活世界中物体互动的结果^[29]。在概念形成和推理中，人的知觉和运动系统扮演了更重要的基础性角色，人的认知是身体、环境、活动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具身认知关于人的认知、身体和环境是动态统一体的思想为智能化课堂教学改革与智慧型课程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混合式智能化系统建构的一流通识课程智能化课堂将技术置于整个人类实践的语境中考察，探索如何将先进技术用于扩展学习者的认知系统并付诸实施，在此过程中，技术从“可见”走到“隐形”^[30]；同时将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有机结合起来，提供学习者实践参与的、个性化、高互动的学习环境，强调多元性、差异性和创造性，学习在一个合作共变的过程中得以发生，能够有效促进教与学绩效的提升。

（五）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起源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德国哲学，采用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活动和意识动态变化的观点^[31]。被维果斯基提出，成熟于前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与鲁利亚，是社会文化活动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活动理论强调了活动在知识技能内化过程中的桥梁性作用。活动构成了心理特别是人的意识发生、发展的基础。活动理论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社会—历史”的理论视角，设计者通过它可以分析人类活动系统。活动理论认为，有意识的学习是从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有意识学习的前导，它关注人类活动和意识在与其相关的环境情境中的相互作用^[32]。活动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人类思维和活动方式的视角。

“活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人类与周围客观事物交流与改造的过程，是人类完成对客观环境认识和需要的目的的过程。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行为，是人类创造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过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学习就是学习者的劳动，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完成学习活动即是对认识需要的获得与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所以在活动理论中对于课堂教学范畴而言，“活动”即教与学过程中行为的总和，是学生对知识认知与技能发展的总和。

随着5G移动化智能终端在教育教学中的逐步普及，可以充分应用网络中的各种学习资源（视频、音频及交互式学习平台等）与现有教学内容、活动进行整合，充分借助3D/4D打印及游戏化学习元素（比如，角色扮演、教育戏剧）等，营造一个“增强学生体验、帮助学生深度理解所学知识、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环境，从而增强有效的智能化课堂活动，优化学习过程，提升学生深度学习能力。

综上所述，分析了研究的背景与现状，介绍“思考与创新”“写作与表达”课程已有的建设与研究基础，提出了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并对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创新特色、价值意义与研究的思路及其所依据的理论进行了阐释说明，旨在使读者能够了解研究的基本架构，为进一步构建基于“一流课程”建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促进一流通识课程建设及其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做先导。

参考文献：

- [1]Vaughan N. Designing for an inquiry based approach to blende and online learning[J].Revista Eletr nica de Educao,2015, 9(3): 30-47.
- [2]Poon, & Joanna.Use of blended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ngagement in property education[J].Property Management, 2012, 30(2), 129-156.
- [3]Miyazoe, T.,& Anderson,T.Anonymity in blended learning: who would you like to be?.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11, 14(2): 175-187.
- [4]Simarmata, J., Djohar, A.,et al. Design of a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Merrills Principles.
- [5][6]Shih, R. C.Can web 2.0 technology assist college students in learning english writing?integrating facebook and peer

- assessment with blended learn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1, 27(5): 829-845.
- [7] Miyazoe, T., & Anderson, T. Learning outcome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online writing: simultaneous implementation of a forum, blog, and wiki in an e-blended learning setting[J]. *System*, 2010, 38(2): 185-199.
- [8] McCarthy, J.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us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o enhance the first year experienc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0, 26(6): 729-740.
- [9] 冯晓英, 王瑞雪. “互联网+”时代核心目标导向的混合式学习设计模式[J]. *中国远程教育*, 2019(7): 20.
- [10] 马志, 孔丽丽. 国内外混合式学习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6(4): 54-56.
- [11][16] 马婧, 韩锡斌, 程建钢. 促进学习投入的混合教学活动设计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3): 67-75, 92.
- [12] 郑燕林, 秦春生. 研究生课程“探究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成与教学设计[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8(4): 69-75.
- [13] 多召军, 赵蔚, 李玉斌, 任永功. 问题解决学习视角下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混合式学习设计[J]. *电化教育研究*, 2018, 39(2): 32-38.
- [14] 张成龙, 李丽娇. 论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中的学习支持服务[J]. *中国远程教育*, 2017(2): 66-71.
- [15] 姚巧红, 修誉晏, 李玉斌. 整合网络学习空间和学习支架的翻转课堂研究——面向深度学习的设计与实践[J]. *中国远程教育*, 2018, 526(11): 27-35.
- [16] 郑静. 国内高校混合式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8(12): 44-48.
- [17] 吴岩. 建设中国“金课”[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12): 4-9.
- [19] 黄荣怀. 未来教育之教学新形态: 弹性教学与主动学习[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0, 32(03): 3-12.
- [20] 王竹立. 替代课堂, 还是超越课堂? ——关于在线教育的争鸣与反思[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0, 32(05): 35-40.
- [21] 冯晓英等. “互联网+”时代混合式学习设计的方法策略[J]. *中国远程教育*, 2020(08): 25-32.
- [22] 祝智庭等. 技术赋能后疫情教育创变: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样态[J]. *开放教育研究*, 2021, 27(01): 13-20.
- [23] 何克抗. 从 Blending Learning 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 (9): 37-38.
- [24] Marton F, Saljo R. On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I—Outcome and proces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6, (46): 4-11.
- [25] 何玲, 黎加厚.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J]. *计算机教与学*, 2005(5): 29-30.
- [26] Julian Sefton - Green, 技术支持的“非正规学习”研究新进展[J]. 焦建利, 译. *远程教育杂志*, 2007(6): 4-14.
- [27] 陈梅香. 情境学习理论与我国当前高校教学改革[J]. *江苏高教*, 2008(2): 75-77.
- [28] 张良. 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中课程知识观的重建[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3): 65.
- [29] 李海峰, 王炜.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教育游戏设计研究——从 EGEC 框架构建到“环卫斗士”游戏的开发与应用[J]. *中国电化教育*, 2015(5): 50-57.
- [30] 陶侃. 数字游戏中的学习脉络与场域生态[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9): 75-79.
- [31] Leont'ev A. The Problem of Activity in Psychology[J]. *Journal of Russian &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1982: 95-108.
- [32] Jonassen David H, Lucia Rohrer-Murphy. Activity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9(1): 61-79.

(下转第59页)

■ 教育教学改革

基于胜任力的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任红艳, 刘晓莉

(西安欧亚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旅游管理专业是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 在实践教学方面有很多优势条件。依据 OBE 教育理念, 基于内外部环境确定专业培养方向及层次, 分析主流招聘网站大数据并调研确定基于未来的目标岗位, 建立初步的胜任力模型; 通过调研校友、标杆院校进一步验证胜任力模型并形成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项目组设计了入门、提升、综合三个层次, 包含课程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三种类型的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 以期实现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

关键词: 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人才胜任力模型; 实践教学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

中图分类号: F590-4;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2022)01-0054-06

我国《“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指出: 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综合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现代化旅游体系, 努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高质量人才队伍的支撑, 本文认为, 只有紧紧围绕能够区分优秀和平庸的旅游管理人才胜任力特征, 加强实践环节, 才能为企业提供高质量人才。

一、旅游管理专业胜任力模型构建

胜任力(competency)是驱动员工产生优秀工作绩效, 可预测、可测量各种个性特征的集合, 是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知识、技能、个性与内驱力等, 是决定并区别绩效差异的个人特征^[1]。胜任力模型是要求任职者具备的一系列不同胜任力的组合。

(一) 人才需求分析

为促进人才培养方案改革, 西安欧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成立了项目组, 负责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工作。依据 OBE 教育理念, 项目组通过

对前程无忧、智联招聘、最佳东方等招聘网站进行招聘大数据分析, 确定了基于未来的岗位目标群。

1. 酒店业人才需求

调研样本量为 168 家, 按照酒店类型分类, 快捷酒店占比为 42.86%, 涉外酒店、国际酒店占比为 57.14%。需求量较多的岗位依次是客房服务、会议销售、网络销售、礼宾员。

2. 旅游景区人才需求

2019 年末, 全国共有 A 级旅游景区 12 402 个, 全年接待总人数 64.75 亿人次, 比上年增长 7.5%^[2]。据《旅游调研》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旅游业从业人员 600 万人, 而市场实际需要专业旅游人才 800 万人以上, 人才市场需求“缺口”超越 200 万人, 其中旅游开发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空间更是巨大。

3. 旅行社人才需求

2019 年末全国共有旅行社 38 943 个, 比上年末增加 2 940 个, 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 41.06 万人。2019 年度全国旅行社营业收入

收稿日期: 2022-03-25

作者简介: 任红艳, 女, 陕西蒲城人, 西安欧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6621.76 亿元, 营业利润 30.06 亿元^[3]。需求量较多的岗位依次是导游、旅行社计调、市场营销、旅游电子商务、创意策划。

4. 文旅产业人才需求

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6 624 亿元, 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 7.0%, 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需求量较多的岗位是文旅产业公共管理、文旅产业经营管理、创意设计。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电话访谈, 确定旅游管理专业目标岗位为智慧旅游运营、国际酒店运营、文旅项目策划与运营。

(二) 企业调研与企业专家意见征集

项目组按照目标岗位分成 3 个小组, 分别依据目标岗位设计调研问卷, 对样本企业进行调研以确定初步的岗位胜任力。对典型企业进行深度访谈, 并征集企业专家意见, 验证岗位胜任力模型。胜任力分为通用胜任力和专业胜任力, 通用胜任力主要指所有组织成员都应当具备的基本胜任力和行为要素; 专业胜任力指员工为完成某一类专业业务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与行为要素。

1. 智慧旅游运营岗位胜任力调研

调查问卷以定向发放为主, 包括电子邮件定向发放和面对面发放, 辅以旅游类网络媒体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批量在线发放。定向发送问卷 208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35 份; 在线批量发放回收问卷 15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71 份, 合计有效问卷 206 份。参与访谈单位共 21 个, 其中旅游主管部门 2 个、旅行社 5 个、景区 5 个、在线旅游企业 7 家、智慧旅游服务商 2 家。对携程旅行网、陕西华商旅游网、陕西骏图旅行网等知名企业进行深度访谈, 向企业专家 10 人征集意见, 确定了智慧旅游运营岗位胜任力模型。

通用胜任力模型包括职业道德、表达沟通、分析与解决问题、管理能力、设计思维、实践应用能力、团队合作、写作能力、信息处理、学习能力。专业胜任力包括旅游数据分析、旅

游产品开发、旅游产品运营、旅游企业管理、旅游渠道拓展。

2. 国际酒店运营岗位胜任力调研

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选择旅游主管部门、酒店、在线旅游企业、旅游信息化服务商等不同类型的单位开展调研。共发放问卷 2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80 份, 问卷有效率 90%。访谈主要通过和用人单位预约后上门访谈形式开展, 或结合行业活动与相关单位预约后集中访谈。访谈企业包括: 希尔顿酒店集团、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卡尔森国际酒店集团等 9 家知名酒店。通过调研, 确定了国际酒店运营岗位胜任力模型。

通用胜任力包括职业道德、表达沟通、管理能力、设计思维、写作能力、抗压能力、团队合作、外语能力、信息处理、学习能力。专业胜任力包括产品营销能力、投诉处理能力、宾客关系处理、企业运营能力、数据分析能力。

3. 文旅项目策划与运营岗位胜任力调研

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选择旅游主管部门、文旅企业、旅行社、在线旅游企业、旅游信息化服务商等不同类型的单位开展调研。共发放问卷 284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67 份, 问卷有效率 94%。访谈主要通过和用人单位预约上门形式开展, 或结合行业活动与相关单位预约后集中访谈。访谈企业包括陕西旅游集团、陕文投、曲江文旅集团等 12 家知名文旅企业, 确定了文旅项目策划与运营岗位胜任力模型。

通用胜任力包括职业道德、表达沟通、管理能力、设计思维、写作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团队合作、外语能力、信息处理、学习能力。专业胜任力包括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数据分析、旅游产品运营、旅游企业管理、旅游渠道拓展。

调研发现, 智慧旅游运营岗位和文旅项目策划与运营岗位胜任力重合度较高, 因此合并为一类, 统称为智慧旅游运营。经过企业专家对目标岗位胜任力要素评估和确认后, 形成了旅游管理专业胜任力模型(见表 1)。

表1 旅游管理专业胜任力模型

类别	胜任力要素	胜任力要素定义
通用胜任力	职业道德	在旅游职业活动中所遵循的,符合职业特点的道德规范,以及形成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等
	沟通能力	能深入理解他人,了解他人动机;倾听与反馈他人
	设计思维	提出创新的想法和创意,以解决特定旅游人群的实际问题
	实践能力	运用已有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团队合作	积极主动促成团队合作,努力化解团队冲突
	写作能力	将“知识储备”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学习能力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获得和运用知识
	信息处理	对信息的接收、存储、转化、传送和发布等
	抗压能力	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让他人冷静,并控制自己的情绪
	外语能力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及对英语语言的运用
专业胜任力	数据分析	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并形成结论
	产品开发	根据市场需求,对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和旅游景点等进行规划、设计、开发和组合
	产品运营	通过分析旅游客户画像,在特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方法、话术、着陆页让客户转化成旅游业客户
	产品营销	把市场观点反馈给旅游产品团队,将旅游产品推向市场
	旅游企业管理	对旅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活动
	旅游渠道拓展	为旅游销售而进行的业务开发活动
	投诉处理	倾听客户不同意见,妥善处理客户提出的不同事项
	宾客关系处理	与客人互动,了解客人体验或建议,以便酒店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调研和标杆院校调研

1. 毕业生调研

根据麦可思2019年对西安欧亚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旅游管理专业2019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6%,比2018届就业率高出9个百分点;2019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达32%,毕业生主要从事的主要行业是旅客住宿业,与全国旅游院校毕业生从事旅游行业的比例保持一致。项目组采用毕业生线上问卷调研的方式,在线回收毕业生信息215份,占毕业总人数42.5%。调研发现,旅游管理

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旅行社、酒店、旅游景区等,其中酒店就业比例最高,占比为45.7%;旅行社从业比例次之,占比为35.2%;旅游景区就业占比1.4%。酒店就业的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内资品牌酒店工作,其中中华住、亚朵、美豪三个品牌人数最多,毕业生基本成长为基层及以上管理者;从事旅行社工作的岗位主要集中在导游和计调,新兴的线上岗位逐步在增加。

2. 标杆院校调研

为了提高培养方案的科学性,打造专业特色,项目组对标杆院校进行了调研。调研对象

选取国内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应用型大学, 国外院校选取康奈尔酒店管理学院、英国萨里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调研发现, 标杆院校顺应产业趋势, 依托优势学科, 采用了“旅游+数据分析”“旅游+地理”“旅游+文化创意”等培养模式, 体现了养成式教学、定制培养、实践教学、订单班等培养特色。

(四) 确定专业培养目标

根据前期的调研和数据搜集, 根据《旅游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世界旅游组织教育质量认证标准(旅游管理专业于2019年通过认证), 结合学院定位和发展, 旅游管理专业确立了人才培养目标: 旅游管理专业旨在培养重品德、会思考、善沟通, 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良好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 具备服务

意识、创新精神, 能够在各类旅游企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从事项目策划、营销推广、运营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旅游管理专业是综合性和应用型很强的一门学科, 为了凸显专业特色, 体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专业设置了入门、提升、综合三个层次, 包含课程实践教学、专业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三个类别的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从根本上来说, 课程实践教学是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 有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技能结构; 旅游专业实践教学是供旅游专业的综合训练, 有助于加强学生的专业理论和技能; 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形成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见图1)。



图1 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一) 入门层面

入门层面实践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管理思维和专业认知能力。在这个阶段, 学生对于旅游管理专业有了初步的了解。入门层面实践教学主要在大一、大二进行, 包括新生入学教育、军事训练、课程实训、认知实习、社区参与等。课程实践包含专业课和通识课程中的实践部

分, 涉及问题辩论、课题探究、考察体验等。专业实践中的新生入学教育, 从学生入校开始, 涵盖大一整个学年。包括校友讲座、行业大咖分享、学生活动等, 将集中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在社会实践的社区参与方面, 学校根据学生住宿地点不同, 分为8个青年社区, 学生则根据个人兴趣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入门层面的实践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通用胜任力,如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写作能力、外语能力、信息处理、团队合作等。

(二) 提升层面

提升层面实践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管理实践和旅游业务运营。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旅游管理领域有了全面的了解,专业知识积累相对丰富,思考问题更加多元和系统化。提升层面实践教学主要在大二、大三进行,包括第二课堂、专业实习、学生社团、景区调研、工作室等。课程实践的第二课堂包括职业素养和学科竞赛,学生通过参加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等,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在专业实践上,学院成立了走你旅游工作室,引导学生参与真实旅游项目,进行职业实践。在社会实践的学生社团,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加入学生社团,有针对性提升实践能力。除了关注通用胜任力外,提升层面实践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胜任力,如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品运营、旅游渠道拓展、产品营销、企业运营、宾客关系处理等。

(三) 综合层面

综合层面实践教学主要培养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在这一阶段,学生专业综合能力继续加强,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持续提高。综合层面实践教学主要在大三、大四进行,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工作坊、沙盘模拟、订单班等。课程实践的工作坊通过举办酒类品鉴、领导力工作坊等,使学生旅游运营实践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专业实践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方面,将学生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学生

通过实习获取企业资料,真题真做完成毕业论文。社会实践教学的订单班由学院与企业联合举办,由企业教师授课,课程完成后学生在企业直接就业,带动学生高质量就业。综合层面实践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及旅游专业综合能力。

总之,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设计以旅游管理专业为平台,以课程实践教学为主体,以专业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为两翼,与理论教学结合,共同为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而服务。旅游管理专业作为通过国际认证的特色专业,与产业关联紧密^[6],通过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将有效促进旅游管理专业优秀人才的培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彭剑锋.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237-24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19.
- [3]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 西安欧亚学院2019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R]. 北京: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 2020.
- [4] 瞿群臻, 王萍. 我国旅游人才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J]. 江苏商论, 2011(10): 104-106.
- [5] 时伟. 论大学实践教学体系[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7): 61-64.
- [6] 李雪丽, 陈艳, 张振国.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J]. 实验研究与探索, 2019(7): 262-273.

Construction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Based on Competency

REN Hongyan, LIU Xiaol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Xi' an Eurasia University, Xi' 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is a comprehensive and applicable branch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many advantages in practice teaching.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OBE, this paper is based up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o determine the training orientation and levels of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and it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big data of mainstream websites of job market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future-based target posts and establish a model of preliminary competency. Besides, the paper makes a survey of the schoolfellows of Xi' an Eurasia University and some benchmarking colleges to further validate the model of competency and specify the objectives of training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the project team designs three layers: entry level, promotion level, and comprehensive level. In each layer, there is a three-dimen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 course practice, the specialized-field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Th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raining talents of the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and to provid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model of competency;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bjective of training talents

(上接第 53 页)

Basic Architecture of Hybrid Teaching Mode and Its Practical Study: Cour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Based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ZHANG Xiaohu, HUANG Xin, LU Zhuoyuan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Xi' an Eurasia University, Xi' 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the reform and practical study of the hybrid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of its study, review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y of the subje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study of the existing cour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paper raises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expounds the objectives, content, methods,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values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study subject as well as its study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e paper is expected to help the formation of the hybrid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for the cour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at Xi' an Eurasia University based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and to be a guid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as well a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odes.

Key words: talent training of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talent competency model; course of general education;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hybrid teaching mode; Xi' an Eurasia University

■ 教育教学改革

信息化视域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刘晓明, 谢颖妮

(西安欧亚学院 高职院校,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对于继续教育的学生而言, 提升技术技能和获得学历提升是进行继续教育的初衷, 但现实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由于办学定位、资源限制、师资水平等问题, 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基于信息化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分析, 总结信息化教育的特征, 即学习方式灵活自主、多维方向性、交互性、可控性。利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方法, 分析目前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信息化视域提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信息化教育; 课程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34; G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60-04

继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职人员更新专业知识、提升职业技能的非常重要途径, 是建设技能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如何改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体系, 提升课程质量, 推进继续教育信息化进程, 成为各继续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信息化视域下教育的特征

(一) 信息化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

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与传统教育相比, 信息化教育强调学生利用信息技术, 建立终身持续学习的目标, 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 注重学习者学习之后能做什么, 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技能是否能够掌握; 信息化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 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合作者和咨询者, 双向参与、双向沟通、平等互助, 实现知识的人本价值。信息化教育打破了地域的限制, 强调跨域、跨界的交叉学习, 基于学生

知识、需求层次的不同, 实现多元化学习目标。

(二) 信息化教育特征

信息化教育给予了学习者足够自由的学习空间, 更适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能够克服大多数在职学习者的时间不确定、地点不确定、学习资源有限等种种困难。

1. 学习方式灵活自主

信息化教育以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手段, 实现远程学习, 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不受职业和地域限制, 为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支持, 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2. 多维方向性

学习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实现多个维度的信息双向交流与沟通, 如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学资源、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学习资源等, 使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信息高效传递, 提高师生沟通效率和学生学习效率。

3. 交互性

信息技术激发学习者学习上的交互性, 既可以向教师答疑解惑, 也可以与其他学习者交

收稿日期: 2022-03-18

基金项目: 西安欧亚学院校级重点课题“民办高校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19ZD0010)

作者简介: 刘晓明, 女, 山东烟台人, 西安欧亚学院高职院校讲师,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研究。

流,实现探究式学习、发现式学习、主动式学习,提高学习的效果,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探索。

4. 可控性

信息化教育与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样,必须给予教学必要的监控,基于信息技术的双向性、交互性等特点,能够适时、精准监控学生的学习效果,实现客观评价,为课程评价提供合理依据。

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模式,也是提高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随着行业对从业者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要求的不断提升,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习者人数逐年增加,大规模的教育需求对高校的继续教育模式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目前,高等学历的继续教育模式主要有成人高考、自考、网络教育、国家开发大学四种类型,主要面向的人群是社会在职人员。利用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多家房地产、金融、软件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继续教育学院基地进行调研,发现目前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 教育理念滞后,教育定位不准

现行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大部分沿袭高校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理念和教学定位与本科教育相似,这显然不符合继续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定位。陕西省曾停办138个高等继续教育教学点,其原因是教学理念落后,教育定位不清晰,导致的培养模式单一,学历文凭认可度不高,非学历教育实效差。继续教育学院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定位,基本跟随隶属学校的办学定位,未能凸显继续教育本身的教育目标和特色教育体系。继续教育学院在办学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办学定位和方向,往往忽略继续教学的办学初衷。

(二) 课程体系设计目标模糊,课程模块比例设置不合理

继续教育的实质应以职业定位的超越发展为目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此为依据进行课程设置。但是,针对目前正在进行

继续教育或已完成继续教育的学生群体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实践课程的比例评价,71%的人认为目前的继续教育课程实践比例偏低,23%的人认为合适,6%的人认为偏多。访谈中发现,81.2%的继续教育学员对于所学课程的目标了解不清晰,对于部分课程评价较低,认为学了没用,由此说明继续教育的课程设置目标实用性不强,课程设置未能结合学员职业发展需求。虽然绝大部分课程设置满足了继续教育学员的学历需求,但课程体系的设计、课程目标的设置,未能根据学科特点、行业特色、学员需求,做出精准化、科学化的规划与制订。

(三) 课程设置模式单一,课程资源投入不足

根据课程设置模式的问卷调查统计显示,70%以上的学生认为继续教育的课程模式过于单一,不够灵活。继续教育学生的身份一般呈现多元化特征,即学生、职员、家庭成员等,其能够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并不饱和,所以在课程设置过程中,要求时间灵活、可控、线上和线下想结合。但实际的继续教育课程模式,除了网络教育或远程教育外,还存在类似传统夜大的模式,课程设置单一,17%的学生对课程满意。另外,学生对于继续教育线下课堂授课方法的满意度也比较低,认为课程教法枯燥,难以集中精力,所授内容与自身工作实践匹配度不高,从而影响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继续教育的资金保障、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课程资源的投入不足,实验实训条件满足不了课程需求,且受疫情影响,原有的实践课程无法安排,影响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的全方位衡量,导致学生对整体课程体系的评价和满意度。

(四) 师资队伍匹配不佳,课程满意度不高

师资队伍是继续教育的重要保障,高水平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不仅能够保证课程教学质量,还能促进教师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服务企业和区域经济,推动继续教育产学研教育模块体系的构建。通过对继续教育基地的实际调研发现,绝大部分继续教育学院聘请的是兼职教师,且对教师的考核和素质要求较低,教学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三、信息化视域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体系改进策略

为实现教育目标,课程体系要设计出学习者的学习方案或课程规划。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设计必须体现系统性、动态性、递进性:课程体系设计是一个学习系统,要以学生的继续教育需求为基础,贯穿学生的学情特点和学习规律,确保课程体系的系统性;要以行业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满足学生职业发展诉求为目标,结合时代进步特点,确保课程体系的动态发展;要以继续教育学生的职业发展、技能提升为路径,由易到难,进行课程难度的递进设计,确保整个课程体系的递进性。《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重要文件相继出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要不断思考信息技术与课程体系的融合路径,从总体考虑课程体系设计的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评价等。

(一) 精准继续教育定位,寻求专业特色发展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要与区域经济发展、行业发展、技术发展等有效结合,强调自身办学定位,提升自身办学质量。随着高等院校服务区域经济、服务社会的目标定位增强,继续教育要明确自己的独特定位,寻求特色发展道路^[1]。比如,依托高校建立的继续教育学院,利用高校的办学定位优势,同时结合专业设置属性、行业发展更新、国家政策支持等一系列影响因素,明确专业特色,凸显实效性、技术性和实践性,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只有精准的教育定位和特色化的办学理念,才能保证继续教育的持续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口碑,实现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 整合教育资源,匹配优秀师资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教师资源也非常紧缺,继续教育要在精准定位、特点发展的基础上,多渠道探索资源的利用与共享。比如,借鉴目前高职院校特色的产业学院模式,与行业内优秀企业合作,整合校企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丰富线

上教育资源,发挥规模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在对继续教育基地、企业的调研中发现,部分企业在战略发展规划中,会匹配资金、师资等资源与高校建立合作学院,促进继续教育基地积极、主动与企业进行沟通、合作,推动创新产业学院的建设。针对继续教育教师资源匮乏的问题,各高校和继续教育基地可以借鉴俄罗斯的教师继续教育体制模式,既要加强现有教师的继续教育,定期进行脱产学习和培训开展教师竞赛,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又要建立教师教育评价机制,引进优秀、“双师型”教师,不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2]。

(三) 依托信息模块,重构课程体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继续教育学生的职业发展和工作实践离不开信息技术。因此,在课题组对继续教育学生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构。课程体系分为四个模块:第一模块: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主要包括国家规定的思政类课程、思维创新与训练、基础写作等课程。第二模块:专业教育课程模块,也是继续教育的核心模块,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岗位技能课程和实践课程三部分,既有理论基础知识学习,也有实践技能提升,满足学生实践学习需求。第三模块:信息技术应用模块,满足职场发展的信息技术应用需求,包括视频剪辑、网页制作、Python、Office 软件的创新应用等基础课程。第四模块:能力拓展课程模块,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由选择,包括兴趣课程和能力拓展的选修课程,实现学生多元化发展。对于课程的比例,各高校和继续教育基地可以根据所设专业特点、行业发展需求、专家意见等进行合理配比,同时建立的弹性选择机制,满足增加实践集成模块的需求,为不同层次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课程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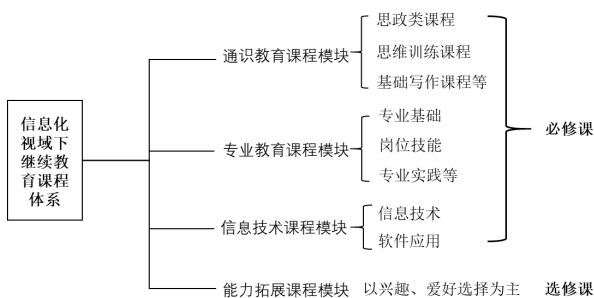


图2 信息化视域下继续教育课程体系

(四) 借助数字化平台, 促进课程改革

教育信息化是社会发​​展成果作用于教育的结果, 教育的数字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也为网络教育改革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教育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可以强化逻辑教育, 优化教学的逻辑, 使学生通过良好的学习体验完成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化^[3]。随着高校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普及和应用,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以借助数字化学习平台, 科学、合理设置课程的学习模​​。比如, 充分利用线上的学习平台和软件平台, 结合学习时间、学情特点, 推动课程授课模式、授课方法、考核方式的改革。以学生为中心, 满足学生学习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数字化学习平台, 合理设置继续教育课程体系​​中线上和线下课程的比例, 利用平台后台数据, 合理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让继续教育学生学有所获, 促进自身专业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

四、总结

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 基于信息化视域重新思考继续教育的发展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课程是继续教育的核心, 重构课程体系, 能够保证继续教育办学目标的实现。各高校及继续教育基地在举办继续教育时, 既要展示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理念、办学成果、办学特色, 满足学生继续教育需求, 也要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 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谢颖妮. 学生多元化发展视域下的民办高校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J]. 教师, 2021(8): 119-120.
- [2] 李宇辉. 俄罗斯教师教育课程和继续教育研究[J]. 继续教育, 2014(12): 131-133.
- [3] 王卓妮, 叶梦姝, 邓一. 网格化继续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初探——以气象行业为例[J]. 继续教育, 2017(7): 3.

Reform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alization

LIU Xiaoming, XIE Yinni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students who want to participate into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ir objectives are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y and skills and to increase their academic levels,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school-running orientation, limitation of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teaching faculty,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udents' objectives. Based up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formationalized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alized education: flexibility and autonomy, multi-dimensions, interaction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des. By use of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oday's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it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higher academic continuing education; edu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 教育教学改革

新工科视阈下“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职业期望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宫安铭

(山东大学 商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以部分“双一流”高校的新工科专业毕业生为对象探究职业期望的影响因素,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使用感知重要性—实际表现性分析方法(IPA), 分析新工科专业毕业生职业期望的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被试的实际表现性均低于感知重要性, 反映新工科专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职业期望与现实存在距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双一流”高校; 新工科; 高校毕业生职业期望; IPA

中图分类号: G64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2022)01-0064-05

一、引言

新工科建设是“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领头雁, 是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重中之重, 是推动我国“双一流”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的关键举措。2017年4月在天津大学举行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研讨会, 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的《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中提出: 新工科的建设和发展不应单纯以学科为导向, 更应该适应产业需求和行业需求。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技术、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的存储、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突破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广泛应用, 在数字、物理和生物技术共同推动下, 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促进、不断融合, 催生了新的产业, 这迫切需要新的人才作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国家发展靠人才, 民族振兴靠人才, 当前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新工科新时代的人才要顺应国家重大战略的导向, 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供示范和引领, 深入探索新工科专业与传统工科专业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路径和模式, 打破二者之间的隔阂, 提升新工科专业人才与市场的匹配度。

二、文献综述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报告》, 我国云计算工程师、云架构师、数据挖掘工程师等新工科专业岗位的缺口非常大。以机器学习、算法工程师、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职位月薪普遍在1.8万元以上, 这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对新工科专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十分旺盛。

职业期望是求职者对某项职业的期待与向往, 指劳动个体对职业的态度倾向, 一般被视

收稿日期: 2022-03-03

作者简介: 宫安铭, 男, 北京人, 山东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为组织文化和形成员工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职业期望对于员工工作态度、工作动机、工作绩效和后续职业生涯管理都有密切关系。

国外职业期望相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个体层面到社会层面的发展过程，早期的员工职业期望的研究主要围绕入职期望、职业期望趋势和职业期望调整展开。Buckley^[1]等人研究发现，企业为了满足自身对人才的需要，往往夸大企业的优势条件，工作中的职业期望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会受到组织认同程度的影响，基于组织目标与组织价值观，组织内的员工会基于情绪表达，不断调整自身的职业期望，从而尽可能减少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冲突。Atkinson^[2]认为人力资源组织通过提供符合求职者职业期望的组织管理措施，进而能够满足组织承诺和提高员工工作绩效。Gottfredson^[3]从劳动者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出发，认为职业期望是个体能力、兴趣与工作机会、社会需要等外部环境因素的中介变量，对自我职业期望过高会产生认知偏差，由此引起员工职业懈怠、组织忠诚度下降和离职倾向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管理实践中对员工职业期望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李祥飞、张再生^[4]认为新入职员工的职业期望目标实现与否，决定着员工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也间接影响员工离职倾向的程度。张西超^[5]等研究发现员工的职业期望越高，说明员工对组织的态度越积极，相对应的组织犬儒主义越低。刘取芝^[6]对比了男女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差异，探究了外部环境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经济水平对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影响。胡晓玲^[7]以女研究生为被试，通过职业期望的差异性分析发现其最为看重的相关因素是福利和稳定性、自我实现和声望地位。彭湘莹^[8]等探究了大学生职业期望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发现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的职业期望更高，尤其是职业声望地位、职业稳定等方面。朱晓文^[9]等结合国际比较视角，认为职业期望在代际流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背景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职业期望，这种影响在青少年中存在性别差异。王宁、段巍^[10]基于STEM（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教育理念，研究发现媒体、学校教育、非正式教育等通过提高学生的科学自我效能感，从而提高学生的职业期望。

当前国内有关大学生和高等学校毕业生职业期望方面的研究并不系统，针对这一特定群体职业期望的评估工具也不尽统一，尚没有以新工科为研究背景，探究“双一流”高校新工科专业高等学校毕业生职业期望的影响因素，缺乏定性研究更缺乏实证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本土新工科教育的现实基础，探究新工科专业毕业生职业期望的影响因素，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量表的开发、问卷设计与发放

为了加强研究的针对性，在进行量表开发之前，采用质性研究中访谈的方法采访了部分高等学校创新创业学院专家，与此同时为了加强研究的针对性，也与几位企业人力资源部总监或主管进行了访谈。一部分受访者表示，新工科与传统工科在人才方面的区别是，新工科专业人才不仅需要学业优秀，而且还需要具备多学科思维，能够运用新技术解决问题，符合现在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不单纯是满足知识型员工的要求，要树立全方位的人才观。

借鉴李祥飞、张再生^[4]和宫安铭^[11]的研究，职业期望相关的变量和因子一方面考虑员工自身的因职业发展、工作舒适、物质利益和声望地位等。在具体设计的调查问卷中，涉及到的问卷题目都是使用李克特5级量表，数字5、4、3、2、1分别代表“非常重要（非常满意）”“重要（满意）”“一般”“不重要（不满意）”“非常不重要（非常不满意）”。

调查问卷一部分是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等基本资料，另一部分是职业期望量表。调查问卷既有纸质版调查问卷，也有通过网络渠道发放和收集的调查问卷。将填写链接发到部分受调查“双一流”高等学校的网络社区和论坛、50人以上的QQ群、学校百度贴吧、Bilibili网站。与此同时也采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账号的主页设置问卷链接。调查时间从2021年10月1日~2021年12月30日，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920份，回收率

96%，剔除无效问卷进入数据分析的问卷总数是1850份。

四、实证分析

IPA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方法，即感知重要性——实际表现性分析，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服务性要素的衡量与评价。通过相应的评价指标来测量期望值（也就是感知重要性）

利用 SPSS 软件对样本进行信度检验，问卷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是 0.812，表示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经过配对样本 T 检验，各个题目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适合进行 IPA 分析。

通过描述性分析，可以了解“双一流”高等学校新工科专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期望的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变量		频数	百分值 (%)
性别	男	789	42.7
	女	1061	57.3
年龄	18岁及以下	33	1.8
	19岁	212	11.5
	20岁	444	24
	21岁	508	27.5
	22岁	334	18.1
	23岁	177	9.6
	24岁	27	1.5
	25岁及以上	115	6

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利用统计软件分析了研究变量的感知重要性和实际表现性得分和差值（见表2）。

表2 感知重要性与实际表现性得分、差值

变量	感知重要性	实际表现性	差值
高收入	4.21	3.17	1.04
优福利	4.21	3.25	0.96
职业稳定	4.14	3.32	0.82
受教育机会多	3.90	3.25	0.65

续表2:

变量	感知重要性	实际表现性	差值
出国机会多	3.48	2.96	0.52
社会地位较高	3.74	3.07	0.67
利于施展才能	4.16	3.30	0.86
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齐全	4.23	3.35	0.88
工作环境好	4.06	3.22	0.84
契合兴趣爱好	3.99	3.21	0.78
机会公平	4.23	3.04	1.19
晋升机会多	4.04	3.06	0.98
受雇单位知名度高	3.55	3.14	0.41
受雇单位规模大	3.50	3.16	0.34
学以致用	3.84	3.25	0.59
交通便利、信息畅通	3.85	3.30	0.55
工作自由	3.91	3.07	0.84
工作有挑战性	3.60	3.19	0.41
容易成名成家	3.19	2.93	0.26
受雇单位级别高	3.43	3.00	0.43
受雇单位在大城市	3.52	3.14	0.38

根据表2可知，职业期望的相关影响变量中感知重要性得分最高是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齐全（得分4.23）、机会公平（得分4.23）。说明这两个变量是新工科专业毕业生最为看重的两个变量。反映出提供满足和利于员工职业成长和发展的相关工作福利和工作条件，有利于员工职业发展，也有利于组织激发员工的潜能，从而提高工作绩效。

通过 IPA 模型图更直观的展示了各变量感知重要性和实际表现性的状态。以所有变量感知重要性均值（3.84）和实际表现性均值（3.16）的交点划分上下两个对称轴，分为纵轴和横轴，构建了一个两维度四象限的矩阵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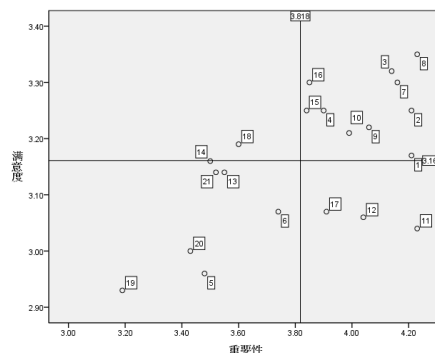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期望感知重要性与实际表现性的 IPA 模型

备注：1. 高收入；2. 优福利；3. 职业稳定；4. 培训教育机会多；5. 有出国机会；6. 社会地位高；7. 利于施展才能；8. 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齐全；9. 工作环境好；10. 契合兴趣爱好；11. 机会公平；12. 晋升机会多；13. 受雇单位名气大；14. 受雇单位规模大；15. 学以致用；16. 交通通讯发达；17. 工作自由；18. 工作有挑战性；19. 容易成名成家；20. 受雇单位级别高；21. 受雇单位在大城市右上部分是优势区，这一区域的变量的感知重要性和实际表现性的得分值都在 3.15 以上，共有 10 个职业期望的相关变量落入该区域，包括：高收入、优福利、职业稳定、培训教育机会多、利于施展才能、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齐全、工作环境好、契合兴趣爱好、学以致用、交通通讯发达。

左上部分是保持区，这一区域变量的感知重要性较低，但实际表现性较高，相关变量并不适合刻意追求提高。这一区域的 2 个变量是受雇单位规模大、工作有挑战性。说明这 2 个变量不是新工科专业毕业生职业期望的主要影响变量。

左下部分是改进区，这一区域的变量感知重要性和实际表现性得分都较低。有 6 个变量落在该区域，这些职业期望的相关变量是有出国机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雇单位知名度高、容易成名成家、受雇单位级别高和受雇单位在大城市。说明这些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

右下部分是弱势区，这一区域是感知重要性分值，而实际表现性得分低的区域。这说明，机会公平、晋升机会多、工作自由这三个职业期望相关变量实际表现性的得分最不理想，需要重点努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双一流”高等学校新工科专业毕业生职业期望构成要素的多维度的度量，分析了新工科专业毕业生职业期望的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结果显示部分“双一流”高校的新工科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望的实际表现性和感知重要性存在一定的距离。当前，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围绕“双一流”高等学校新工科专业毕业生职业期望，探求有

针对性的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坚持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既吸收当前新科技革命的先进理念，也要扎根中国大地，增加政策供给，加强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强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和需求推动新工科建设，以新工科建设引领高等教育质量革命，不断优化新工科相关领域专业结构，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要素、环节和阶段，同时要改革新工科人才培养机制，进一步丰富人才质量标准体系的有效路径，形成包容性、开发性、科学化和多元化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和人才培养机制，从而延伸技能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

作为“新工科”发展的主阵地，“双一流”高等学校应该立足于培养面向全球工程发展的新时代工程人才的战略定位，借鉴国际工程教育的经验，精准把握政策动向，发挥基层首创精神，一方面对外要适应行业需求和产业需求，拓展产学研合作空间，提高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质量；另一方面对内要挖掘潜力，深入开展新工科课程体系改革和实践教学改革，升级人才培养方案。通过新工科学科发展来孕育新技术和催生新产业。加强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既促进学科交叉也拓宽研究领域，不断以研促学、以教促研、以学促教，提升服务贡献。

“双一流”高等学校新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应理性评估自身能力素质与理想职业的匹配程度，动态校正和调整职业期望和职业发展目标，积极主动开展新工科创新创业。在当前自由宽泛的就业大环境下，新工科专业求职者要转变择业观念，深刻理解自身专业优势的发挥不只是单纯依靠理论知识更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开发自己的新思维和新创意，树立清晰的职业发展目标，从专业角度拥抱新科技、提升新技能，有本领才能有担当。

参考文献：

- [1]Buckley M R, DB Fedor, et al. Investigating newcomer expectations and job-related outcom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83 (3) :452-461.
- [2]Atkinson, Carol. Career management and the changing

- psychological contract[J].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02, 7 (1): 14-23.
- [3] Gottfredson L. S. Applying Gottfredson's Theory of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in Career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005.
- [4] 李祥飞, 张再生. 高校毕业生职业期望的满足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作用研究[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 (02): 156-162.
- [5] 张西超, 韦思, 等. 新入职员工的职业期望与组织犬儒主义的追踪研究[J]. 经济科学, 2014 (04): 106-115.
- [6] 刘取芝. 研究生的职业期望及其与家庭经济压力、自尊的关系[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4 (04): 21-26.
- [7] 胡晓玲. 女研究生职业期望问题研究[J]. 教育探索, 2015 (04): 77-79.
- [8] 彭湘莹, 刘惠娟, 李长庚.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职业期望的关系: 独生子女的调节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24 (07): 1032-1035.
- [9] 朱晓文, 李玉磊, 成昱莹. 青少年职业期望的中美比较[J]. 青年研究, 2021 (05): 35-50.
- [10] 王宁, 段巍. 什么因素影响中学生的科学职业期望[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1, 20 (04): 39-48.
- [11] 宫安铭. 基于IPA法的大学生职业期望衡量评估——以山东省某重点高校为例[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3, 34 (05): 438-441.

Empirical Study of Influencing Elements of Job Expectations of Graduates from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GONG Anm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some graduates in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from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s as a study subje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fluencing elements of job expectations by use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IPA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b expectations of graduates in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real performance tested is lower than the importance apperceived, which shows that the job expectations of the graduates in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from colleges are higher than the actual job markets. As a result, the pap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m the aspect of policies.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pecta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for their careers; IPA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 高校图书馆管理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现状调查与分析

李静

(西安欧亚学院 图文信息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以“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等方法对其网站互动栏目设置现状及服务项目进行调研, 分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转变观念, 树立互动服务理念; 设置醒目的互动栏目, 规范统一栏目标识; 增强互动服务方式的多样性、实用性, 优化网站互动栏目页面; 完善互动栏目服务内容, 强化易用性、体验性、前瞻性等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策略。

关键词: 双一流; 高校图书馆; 互动栏目; 互动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69-07

一、引言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速普及的数字时代下, 互动作为图书馆与读者沟通交流的主要途径被赋予新的内涵。“互”是交替、相互; “动”是使起作用或变化。互动是指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高校图书馆多有体现, 如其网站的互动栏目、馆员解答读者利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等。数字时代, 图书馆服务变革势在必行, 高校图书馆应想方设法吸引读者利用图书馆, 通过交流与沟通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赢得读者的信任。高校图书馆网站的互动栏目因其能够增强图书馆的亲和力、提升读者的交互体验, 备受高校图书馆管理者的重视。实践中, 高校图书馆网站均设有互动服务内容, 如“联系我们”“参考咨询”“读者俱乐部”等, 但由于分布于不同的栏目, 且服务方式单一、服务内容不明确, 读者不易查找与利用。

目前学界针对图书馆互动栏目的研究较为充分, 以调研分析为主, 如赵雪芹^[1]等调

研分析 90 家 iSchool 联盟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建设情况; 明均仁^[2-3]等调研分析美国 20 家高校图书馆和英国 58 家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建设情况; 马爱芳等^[4]对“211 工程”院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的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王东亮^[5]等对首批 28 家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图书馆网站的 10 个互动交流服务栏目进行调查分析; 王其和^[6]等对北京市 66 家本科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的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以上研究均基于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与启示, 为学界持续研究高校图书馆互动服务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发生了深刻变化。鉴于“双一流”高校代表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 研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情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基于此, 本文运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等研究方法, 以 42 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研究对象, 探寻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设置规律,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以期提升高校图

收稿日期: 2022-03-21

作者简介: 李静, 女, 陕西西安人, 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馆员, 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的整体效能提供参考。

二、“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调查

互动栏目是指图书馆网站上设置的与读者交流互动以满足读者需求,进而提升馆藏资源利用率与服务水平的栏目。互动服务是指通过开展参考咨询、资源荐购读者调查等为读者提供参与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途径的信息服务模式^[7]。

笔者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现有文献对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的调查揭示为线索,以42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进行探索性预调研。借助百度、360搜索等引擎依次访问42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探索“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情况和发展趋势。调查内容为互动栏目设置情况和服务项目,调查时间为2021年1月24日~2021年2月24日。具体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42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一览表

序号	图书馆名称	互动栏目名称	服务项目
1	北京大学图书馆	互动交流	阅读服务、服务预约、教学与培训、用户共建
2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互动	意见与建议、PQDT学位论文荐购、学位论文提交、教学参考书推荐、电子资源荐购、书刊捐赠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互动&交流	资源推荐、LAB新体验、读者调查、读在清华、读者之声、失物招领、大家的图书馆、服务宣传月、联系我们、图书馆与读者、百年馆庆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无	读者留言、服务指南、微信公众号、新生专栏
5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无	研讨室、座位预约、复印、学生管理员、校友服务、常见问题、荐购与捐赠、校外访问、论文提交
6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咨询推荐	常见问题FAQ、馆长信箱、图书捐赠、资源荐购、读者留言、咨询台
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互动与沟通	咨询台、馆长信箱、馆长接待日
8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无	咨询台、读者荐购
9	南开大学图书馆	咨询互动	微博、人人网、Lib@南开bbs、E-mail、QQ在线咨询
10	天津大学图书馆	提供服务	论文提交、图书捐赠、资源荐购、文化活动、学生社团、阅读推广、培训园地、咨询小图、联系我们
11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关注我们	咨询热线、微信平台、移动图书馆、读者留言、FAQ
12	吉林大学图书馆	无	回音壁、学位论文提交系统、预约多媒体、咨询服务FAQ、移动图书馆、自助服务、图书捐赠、教学与培训、书刊荐购、校外访问
13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交流互动	交流荐书、问卷调查、书柜预约、志愿者、座位/空间预约、联系我们
14	复旦大学图书馆	互动	读者调查与反馈、资源荐购、上架新书介绍、咨询委员会、图书馆愿者、读者之友协会、新媒体、展览申请、图书捐赠、校友捐赠、参观来访
15	同济大学图书馆	互动交流	咨询台、咨询反馈、图书捐赠、电子资源校外访问途径、报告问题、常见问题、服务指南、问卷调查、相关下载
16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互动	读者荐购、思源资讯、留言板、图书捐赠、参观访问、常见问题、相关下载
17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互动	咨询反馈、荐购捐赠、资源利用动态

续表 1:

序号	图书馆名称	互动栏目名称	服务项目
18	南京大学图书馆	无	咨询留言、捐赠、联系我们、研究小间预约、移动服务、智慧图书馆
19	东南大学图书馆	互动交流	智能咨询、常见问题、微信微博、学科馆员
20	浙江大学图书馆	无	留言板、微博、微信、自助服务、用户培训、书刊推荐、书刊捐赠、咨询服务、信息共享空间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无	图书捐赠、相关业务联系人、常见问题、图书荐购、学位论文提交、自助文印服务、图书馆志愿者、微信图书馆(掌中的图书馆)、留言板、讲座培训
22	厦门大学图书馆	无	论文提交、在线咨询、失物招领、自助文印、校外服务、咨询与培训、图书捐赠、研讨间预约
23	山东大学图书馆	互动交流	资源荐购、文献捐赠、图书漂流、我的读记、最新活动、服务大数据
24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无	联系方式、咨询台、国际捐赠、学位论文提交、信息共享空间、研讨间预约、教学服务
25	武汉大学图书馆	无	资源荐购、预约服务、教学培训、自助服务、移动图书馆、咨询服务、博硕士论文提交、校外访问
26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互动咨询	失物招领、读者咨询、FAQ 知识库、问卷调查
27	中南大学图书馆	融入图书馆	读者咨询、培训园地、资源荐购、新生入馆培训、书刊捐赠、读书月活动、学管会、联系我们、座位预约
28	中山大学图书馆	无	图书荐购、联系我们、馆长信箱、咨询台、读者培训、论文提交、复印服务
29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无	论文提交、校外访问、研修室预约、自助文印、图书捐赠、馆长信箱、联系我们
30	四川大学图书馆	互动推荐	读者留言、馆长信箱、好书推荐、每周一书、主题资源(推送)
31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无	留言板、校外访问、论文提交空间服务、移动图书馆
32	重庆大学图书馆	无	捐赠服务、文献资源荐购、志愿者、图管会、学位论文提交、移动图书馆、校友服务、预约研讨室、参考咨询与建议、联系我们
33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互动	常见问题(FAQ)、咨询台、联系人、建议与意见、书刊荐购
34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交流共建	咨询台、新书通报、资源荐购、试用库评价、书刊捐赠、学生服务团队、读者调查问卷
35	兰州大学图书馆	联系我们	在线咨询、联系电话、移动图书馆、读者俱乐部
36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无	参观交流、图书荐购、图书捐赠、图书馆空间预约
37	东北大学图书馆	无	图书馆与读者、学位论文提交、研讨室预约、大学生素质教育导读目录
38	郑州大学图书馆	无	资源荐购、校外访问、自助预约、微博、微信、移动图书馆、常见问题
39	湖南大学图书馆	互动与沟通	资源荐购、读者调查、上架新书介绍、利用统计、读者留言、CALIS、CASHL、CADAL、馆员评价、图书馆微博
40	云南大学图书馆	咨询互动	电话互动、E-mail 咨询、图书馆在线咨询、CALIS 虚拟参考咨询
4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互动交流	书刊荐购、新书通报、图书捐赠、校外访问、读者排行榜、阅读推广
42	新疆大学图书馆	咨询台	我要咨询、咨询服务、图书荐购、热门推荐、自助打印复印、新书通报、图书馆导航、校外授权访问、微信

三、“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 互动栏目调查结果分析

(一) 互动栏目设置层次不同、称谓不一

由调查可知,42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中有25家设有互动栏目,占比约59.52%,其中呈现于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即一级栏目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等22家高校图书馆,占比约52.38%,另有4家高校图书馆将互动栏目设置为二级栏目,即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快捷通道——咨询互动、东南大学图书馆的教学支持——互动交流、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大厅——互动推荐、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入馆指南——交流共建。这表明“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整体上比较重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多将其设置为一级栏目,置于网站显著位置,图书馆与读者交流互动正在逐步强化,这是图书馆服务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调查结果显示,17家(占比约40.48%)“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未设置相关互动栏目,而是将互动服务相关内容分布在不同的栏目。如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图书荐购、图书捐赠设置于“文献资源”栏目下,图书馆空间预约设置于“空间设施”栏目下,参观交流设置于“本馆概况”栏目下。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高校图书馆网站存在互动栏目称谓不一、界定不清现象。称谓相同的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5家高校图书馆为“互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7家高校图书馆为“互动交流”“互动 & 交流”或“交流互动”;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等3家高校图书馆为“互动咨询”或“咨询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为“互动与沟通”。单个图书馆自行定义互动栏目的如四川大学图书馆为“互动推荐”。部分高校图书馆的栏目名称未显示“互动”一词,如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为“咨询推荐”、天津大学图书馆为“提供服务”、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为“关注我们”、中南大学图书馆为“融入图书馆”、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为“交流共建”、兰州大学图书馆为“联系我们”、新疆大学图书馆为“咨询台”等。以上现象容易造成读者视觉疲劳、理解有

误,不利于读者有效利用互动栏目。

(二) 互动服务方式多样,个别服务方式与项目混淆、页面设计单调

服务方式与服务项目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不同的服务项目有相应的服务方式支撑,如资源荐购中荐购服务方式有荐购系统(如OPAC荐购等)、电话荐购、邮箱荐购、现场荐购等;书刊捐赠方式有现场捐赠、邮寄捐赠、上门提取等。“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中的服务项目涉及的服务方式多样,如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咨询互动栏目强调咨询中互动交流的效果,咨询与交互相融合,专指性强、服务方式明确,包括微博、人人网、Lib@南开bbs、E-mail、QQ在线咨询。多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有相同的服务项目,但其服务方式有所差别。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6家高校图书馆咨询台的服务方式不尽相同。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咨询台服务方式包括微信咨询、邮件咨询、电话咨询、现场咨询、表单咨询、常见问题;同济大学图书馆的咨询台服务方式包括电话咨询、现场咨询、微博;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咨询台服务方式有服务热线、BBS咨询、Email咨询、实时咨询;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咨询台服务方式包括邮件和电话咨询、QQ实时咨询。读者可以在不同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咨询方式,进行“一对一”个性化咨询。但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服务方式与服务项目混淆,含糊不清。有的图书馆将微博、常见问题(FAQ)等与资源荐购、志愿者服务等一并作为互动栏目中的服务项目,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降低读者与图书馆互动交流的积极性。二是部分互动栏目页面设计单一,与图书馆其他服务的链接较少,服务方式网页无法显示,如个别图书馆互动咨询栏目的FAQ知识库,BBS无法打开,给读者利用造成困扰。

(三) 互动服务内容丰富,部分服务项目分布不合理、更新滞后

互动服务内容往往包含文献信息检索与咨询、文献传递、信息推送(如新闻、通知公告、新书通报等)、交流与讨论(如阅读推广、文化活动等)、常见问题解答(FAQ)、读者意见和建议等。整体上,“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互动栏目服务内容丰富。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互动&交流”栏目包括资源推荐等11个服务项目、天津大学图书馆的“提供服务”栏目包括论文提交等9个服务项目、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互动”栏目包括读者调查与反馈等11个服务项目、同济大学图书馆的“互动交流”栏目包括咨询台等9个服务项目。但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个别服务项目未能列入互动栏目。在图书馆服务实践中，咨询台属于参考咨询服务范畴，其交互性较强，也是互动服务项目之一。但个别图书馆未将咨询台纳入互动栏目，读者不能及时找到目标服务，造成读者使用不便。二是不同高校图书馆互动栏目的服务项目设置各有侧重、多寡不一。如在设有互动栏目的25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有15家设有资源荐购服务，占比60%；12家设有捐赠服务，占比48%，资源荐购与捐赠在互动栏目服务项目中占比较大，说明高校图书馆比较重视读者参与图书馆资源建设。而个别服务项目设置较少，如志愿者相关服务方面，仅复旦大学图书馆设有“图书馆志愿者”、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设有“学生服务团队”。三是较少设置读者数据统计项目，且数据滞后。设有互动栏目的25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年度阅读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资源利用动态、山东大学图书馆有服务大数据、湖南大学图书馆有利用统计、西北农林大学图书馆有读者排行榜。其中个别高校图书馆服务大数据中的资源建设服务内容最近更新时间为2016年；利用统计中的文献（读者）借阅排行榜、读者入馆排行榜、学习研讨空间访问统计等均为2019年12月的统计数据。此外，教学与培训、阅读推广、新技术体验等互动服务项目设置不足。以上种种现象均不利于读者获取图书馆服务，导致服务效率偏低。

四、“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完善策略

（一）转变观念，树立互动服务理念

互动服务是知识流动的过程，是图书馆强化服务创新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实现图书馆服务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认识到互动服务的重要性。数字时代，高校师生思想活跃、务实求真，重视作为主人翁的主体性，参与图书馆管理的意愿增强，促进了读者间、读者与图书馆员间、读者与图书馆管理者间的交流与沟通，这就需要“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馆员转变观念，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牢固树立互动服务意识，研究读者需求，为读者营造和谐、温馨、有利于思想与知识迸发的互动情境。

（二）设置醒目的互动栏目，规范统一栏目称谓

1. 设置醒目的互动栏目

数字时代，“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应以读者为中心展开，读者间、读者与馆员、读者与图书馆管理者间的互动交流应是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建设应契合“以人为本”的时代发展趋势。未设置互动栏目的“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应结合自身实际，在网站设置相关互动栏目，提高读者的体验感与参与度；已设置互动栏目的“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应遵循“从有到优”“从优到精”^[8]的原则，结合各自情况，取长补短，优化与规范相关互动栏目。由调查可知，有22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将互动栏目设置为一级栏目，彰显其重视程度，其他高校图书馆亦可将相关互动栏目设置为一级栏目，置于网站醒目位置，具体可参照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将互动栏目设置为一级栏目，下设读者调查与反馈、资源荐购、上架新书介绍、咨询委员会、图书馆志愿者、读者之友协会、新媒体、展览申请、图书捐赠、校友捐赠、参观来访等二级栏目，读者可通过点击不同二级栏目获取所需信息。如参观来访中包括不同校区图书馆参观来访的注意事项、联系方式等，鼓励学界同行互动学习。

2. 规范统一互动栏目称谓

当前“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相关互动栏目称谓不同，不利于读者查找使用相关服务。互动栏目称谓中使用“互动”一词最多，因此建议高校图书馆网站将栏目称谓统一为“互动”，简单易懂，方便查找利用。此外，“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还要注意网站页面设计的实用性，并施以人性化管理，注重对互动服务的宣传推广等。

（三）整合互动服务方式，优化网站互动栏目页面

1. 整合互动服务方式

由调查可知，互动服务项目包含微信、微博、FAQ 知识库等，高校图书馆应明确区分服务方式与服务项目归类，将服务方式归纳整合到咨询台、参考咨询等服务项目。不同互动服务方式的信息交互内容及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阅读讲座、读书分享等可以通过 BBS 发帖、新闻公告等途径获取，服务预约如展览展示服务、研讨室、研修室、和声厅、特色阅览室、校外读者入馆、来访预约、3D 打印等服务可通过电话咨询、E-mail 咨询等方式预约。各高校图书馆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宜的服务项目与服务方式，满足读者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2. 优化网站互动栏目页面

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页面设计要简洁、清晰，布局要合理，符合读者浏览网站的习惯，网站链接层级要控制在四级内。如东南大学图书馆互动交流栏目设有学科馆员项目，点击学科馆员后自动跳转至学科馆员页面。这种方式也可应用于互动服务中其他项目与内容的链接，如可将交流互动栏目与一些访问量较高、读者问题较多的资源服务类栏目建立链接，并保持服务项目与内容链接畅通。

（四）完善互动栏目服务内容，强化其易用性、体验性、前瞻性

虽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栏目服务内容多样，但不提倡“一刀切”，建议不同的高校图书馆有条件地选择适宜的服务内容，补齐短板。

1. 将咨询台、资源荐购纳入互动栏目必选内容

咨询台汇集了虚拟咨询、电话咨询、当面咨询等不同类型的互动服务方式，使用便捷，读者往往愿意通过咨询台寻求图书馆的各种帮助。同时，咨询台不仅对与本馆资源和服务利用有关的问题作答，而且提供投诉与建议渠道，保障读者权益。因此，建议将“咨询台”列为必选互动栏目内容，便于在读者与图书馆之间建立快捷通道，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资源荐购是读者参与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

要渠道，互动性较强。读者可以通过 OPAC 荐购、水木荐书、ProQuest 国外学位论文荐购等荐购平台进行文献浏览、推荐并发表意见，或者借助电话推荐、邮箱推荐、微信微博荐购等方式积极参与资源荐购。资源荐购是师生通过资源推荐的形式把读者需求反映给图书馆，进而参与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互动服务的重要内容^[9]。由调查可知，15 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其互动栏目设有资源荐购服务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因此建议将资源荐购纳入必选互动栏目内容，以激发读者的荐购热情，增强读者黏性。

2. 重视图书馆相关数据统计工作

图书馆事实数据统计工作是对图书馆进行计量化管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10]，因此建议高校图书馆重视资源与服务利用动态内容建设，定期更新与维护相关数据，保证数据统计严谨有序，统计数据完整、准确。

3. 确优化新技术应用体验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用户信息获取途径发生了较大变化，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提供方式也面临重大变革，5G 的逐渐普及亦将为新兴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创造条件。清华大学图书馆“互动 & 交流”栏目中的新技术体验服务值得其他高校图书馆借鉴。LAB 新体验包括清华学者库、智能聊天机器人、OPAC 新体验^[11]。其中，清华学者库是基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或采购的海量数字文献，为清华学者建立唯一学术标识；全面汇集清华教师的学术论文，展示教师完整学术历程；为教师追踪学术论文的被收被引情况；为教师提供灵活的数据管理方式；为教师展示个人科研合作网络；为学术生产力分析提供数据支撑。智能聊天机器人是指图书馆智能聊天机器人“小图”，为读者提供图书馆知识问答、馆藏图书查询、百度百科查询、自我学习和训练等服务。OPAC 新体验是以用户为中心，重视用户利用馆藏目录的易用性、体验性，如 OPAC 图示馆藏地点、显示书封图片、书评及评分等。新技术还包括虚拟现实（VR）技术和增强现实（AR）技术，读者可借助手机 APP 使用 3D 导航地图快捷、精准地查找资源，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服务体验。综上，高校图书馆在完善网站互动栏目服务内

容的同时,还要注重其易用性、体验性与前瞻性,以增强读者黏性,提高图书馆服务利用率。

参考文献:

- [1] 赵雪芹,李天娥. iSchool 联盟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现状调查与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2020,(16):23-40.
- [2] 明均仁,袁圆,等. 美国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的建设现状及其启示[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9,37(06):121-125.
- [3] 明均仁,赵鹤. 英国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的建设现状及其发展启示[J]. 图书馆学研究,2018,(02):96-101,8.
- [4] 马爱芳,赵建梅. “211工程”院校图书馆主页互动交流型栏目的构建情况分析[J]. 图书馆论坛,2012,32(01):76-79,28.
- [5] 王东亮,陈玉平,罗雨舟. 高职院校图书馆互动交流栏目的构建状况与思考——基于对国家首批高职示范院校的调研[J]. 河北科技图苑,2018,31(06):61-66.
- [6] 王其和,明均仁,焦莹君,甘恬. 面向北京市高校图书馆网站互动交流栏目的调查及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2017,(08):35-43.
- [7] 尹雪聪,郭婧华,林强. 基于“互联网+”的图书馆智慧互动服务模式研究——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8,36(02):77-80.
- [8] 刘敏.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服务现状及优化策略[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11):15-24.
- [9] 张畅. 高校图书馆“芸台购”读者荐购服务平台现状调查与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20,(16):50-56.
- [10] 耿曼曼. 美国图书馆的事实数据统计工作[J]. 图书馆论坛,2020,40(12):19-28.
- [11]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LAB 新体验[EB/OL].[2021-02-24]. <https://lib.tsinghua.edu.cn/service/lab.htm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teractive Columns of Library Website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s

LI J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librarie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s as a study subject, by use of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network survey, this pap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esent setting situations and service items of the interactive columns of the websites of the college librari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ir existing problem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active columns of the websites of college libraries: 1 (giving up old concepts to take the new ideas of interactive services, 2 (setting eye-catching interactive columns to regulate and unify the names of related columns, 3 (increasing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practicability of interactive service modes to optimize the pages of the websites' interactive columns, and 4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the services of interactive columns to strengthen the features of easy use, experiencing, and forward looking.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library; interactive column; interactive service

■ 学科理论与实践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旅游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设计

雷可为¹, 王小辉²

(1. 西安欧亚学院 休闲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2. 西安邮电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1)

摘要: 为解决信息过载导致景区推荐系统推荐效果差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 系统由表示层、业务层以及数据层三部分构成, 数据层的数据模块采集景区属性、用户特征信息以及用户行为数据等信息发送至业务层, 业务层的个性化推荐模块利用基于域适应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算法通过辅助分类器训练目标分类器, 将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应用于已训练的目标分类器实现景区个性化推荐, 并将推荐结果通过表示层的显示模块发送至微信公众平台的人机交互界面。仿真测试结果表明, 该系统可将景区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准确推荐至用户, 且具有较高的覆盖率以及多样性。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 旅游景区; 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

中图分类号: TP1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76-06

一、引言

随着网络高速发展, 采用移动设备作为通信社交方式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 微信是目前移动社交用户端的重要方式^[1], 微信所属公司为腾讯公司。随着微信的高速发展, 微信目前已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 可支持20多种语言, 目前用户数量已超过11亿, 是用户量最大的APP, 微信已成为移动终端的龙头应用^[2]。微信公众平台是微信重要功能之一,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获取热门信息已成为人类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推荐用户所需数据具有较高推广性。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升, 旅游业已成为目前发展极为迅速的产业, 用户可通过网络不同渠道获取景区信息^[3]。

网络中信息量过大, 严重的信息过载情况无法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个性化需求。个性化推荐可针对用户具体需求推荐相关信息, 有效解决网络中信息过载问题^[4], 鲜明的个性化景区推荐服务可有效提升推荐质量, 具有较高适用性。

以往的景区推荐算法通常采用基于大众行为的推荐算法, 并未针对个体差异为用户推荐符合用户需求的推荐结果, 推荐性能较差。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依据用户需求有针对性的推荐景区, 通过基于域适应的个性化景区推荐针对不同用户个体差异做出精准的个性化服务^[5], 高效挖掘不同用户的潜在兴趣, 获取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结果, 便于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高质量景区内容, 吸引用户长期关注, 维持用户忠诚度。

收稿日期: 2022-03-18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信息技术赋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20JZ089);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陕西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SWHHLTKT202013); 西安欧亚学院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旅游接待业’课程”(2019KC023)

作者简介: 雷可为, 女, 陕西西安人, 西安欧亚学院休闲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旅游市场和旅游教育研究。

二、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

(一) 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景区推荐需求设计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 总体结构主要包括表示层、业务层和数据层三部分(见图1)。

系统的数据层由数据模块组成, 数据层负责收集景区属性、用户特征信息以及用户行为数据, 所采集数据通过个性化推荐模块利用个性化推荐算法获取最终推荐结果^[6]。数据层内包括海量用户信息以及景区信息, 数据层内海量数据为业务层调用提供方便。数据层主要包括景区属性信息、用户特征信息、用户行为数据三部分, 用户行为数据指用户对景区项目评分的信息。

系统的表示层由显示模块组成,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显示界面与用户实现人机交互, 推荐系统用户与系统管理员具有不同的交互界面^[7]。

业务层是系统的核心部分, 业务层由个性化推荐模块组成, 业务层接收表示层用户请求后, 利用个性化推荐算法快速实现景区推荐的数据处理, 推荐数据处理过程由数据库提供数据支持^[8], 推荐结束后将推荐结果返回至表示层将推荐结果展示至用户。用户以及管理员各项操作均需通过业务层调用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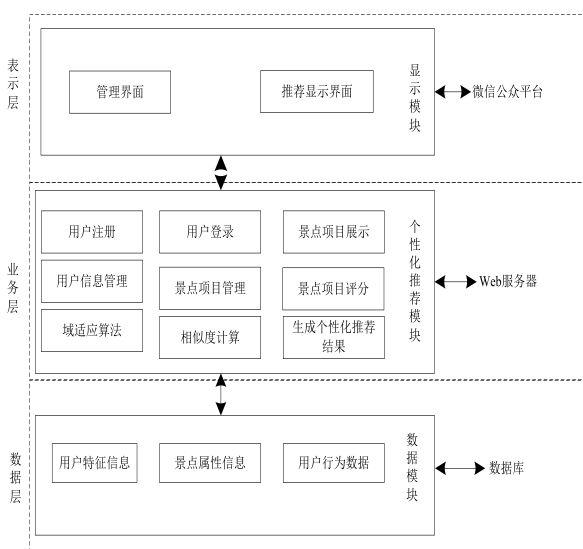


图1 系统总体结构图

(二) 系统功能模块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功能结构图, 如图2所示。系统主要包括用户特征信息管理、景区属性信息管理、个性化推荐展示三部分, 用户特征信息管理部分包括用户注册、用户登录以及信息管理; 景区属性信息管理部分包括删除景区项目、修改景区信息、添加景区项目三部分, 用户登录后选择该功能可将感兴趣景区添加加入收藏^[9], 并删除已不感兴趣景区, 并可将所收藏景区标签修改; 个性化推荐功能包括展示推荐结果以及用户评价反馈两部分, 用户通过该功能获取系统个性化推荐景区结果, 可依据系统个性化推荐结果提出评价以及反馈, 帮助系统进一步优化^[10]。用户登录系统后可实现自身信息、景区的管理, 可浏览与查询景区项目, 通过浏览与查询结果反馈用户个人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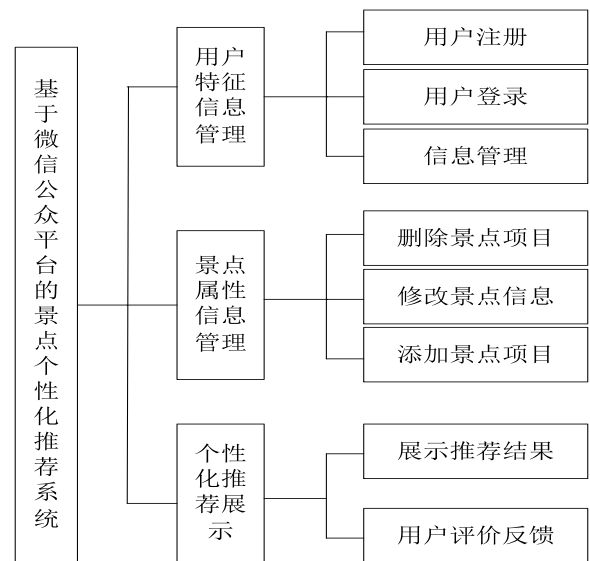


图2 系统功能结构图

(三) 基于域适应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算法

设景区类型数据集以及用户相册数据集分别为 D 以及 T , 为保证目标域数据与辅助域数据相同分布^[11], 需要降低 D 以及 T 的分布差异, 二者的数据分布差异公式如下:

$$DIST_k(T, D) = \left\| \frac{1}{M} \sum_{i=1}^M g(G_u^i) - \frac{1}{N} \sum_{i=1}^N g(G^i) \right\| \quad (1)$$

式中, M 与 N 表示景区类型数据集数量以及用户相册数据集数量; G_u^i 表示用户相册特征; G^i 表示景区类型数据集特征, $\mathcal{G}(\cdot)$ 为特征映射函数, 存在 $k(G_u^i, G^i) = \mathcal{G}(G_u^i)\mathcal{G}(G^i)'$ 。

可知景区类型数据集与用户相册数据集间的分布差异可利用最小化 $DIST_k(T, D)$ 减小。

用 $g^a(x)$ 表示辅助分类器, 通过已标记的景区类型数据集 D 训练该分类器获取可精准分类用户相册数据 T 集的 $g(x)$, 用 $\Delta g(x)$ 表示分类器修正指数, 可得公式如下:

$$g(x) = g^a(x) + \Delta g(x) = g^a(x) + \tau^T \mathcal{G}(x) \quad (2)$$

τ 表示修正系数, 获取目标函数如下:

$$\min_{\tau} \frac{1}{2} \|\tau\|^2 + B \sum_{i=1}^N \zeta_i \quad (3)$$

式中, B 与 $\sum_{i=1}^N \zeta_i$ 分别表示惩罚函数以及

度量目标分类器的错误率。

可得:

$$\tau = \sum_{i=1}^N \lambda_i y_i \mathcal{G}(x_i) \quad (4)$$

其中, λ_i 与 μ_i 均为拉格朗日乘子,

$$\lambda_i = B - \mu_i, \forall i.$$

公式 (1) 与公式 (4) 相结合可得:

$$\begin{aligned} g(x) &= g^a(x) + \tau^T \mathcal{G}(x) \\ &= g^a(x) + \sum_{i=1}^N \lambda_i y_i \mathcal{G}(x_i) H(x, x_i) \end{aligned} \quad (5)$$

可知:

$$\|g(x) - g^a(x)\| = \|\tau\|^2 \quad (6)$$

以上过程可知, 再生希尔伯特空间内, 利用正则式 $\|\tau\|^2$ 可减小 $g^a(x)$ 与 $g(x)$ 间的距离, 辅助分类器错误分类以及正确分类 x_i 时, 获取较大权重 λ_i 以及较小接近 0 的权重 λ_i , 分类结果分别与辅助分类器存在差异以及相同^[12-14]。

通过以上过程完成目标分类器 $g(x)$ 的训练, 利用 $g(x)$ 分类用户相册数据集获取用户相册景区类型 y_i , 利用所获取景区类型选取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实现个性化推荐过程如下:

选取余弦相似度计算方法计算不同用户间的相似度, 设 $F(u)$ 与 $F(v)$ 分别表示用户 u 以及用户 v 偏好景区类型集合, 两个用户间余弦相似度公式如下:

$$\text{sim}(u, v) = \frac{|F(u) \cap F(v)|}{\sqrt{|F(u)| \times |F(v)|}} \quad (7)$$

当用户数量为 n 时, 获取相似度矩阵 $M \in R_{n \times n}$, 用户 u 与用户 v 间相似度越高时 $\text{sim}(u, v)$ 越大。

利用相似度矩阵获取与用户 u 相似度最高的用户数量为 J , 用集合 $T(u, J)$ 表示, 分类集合 T 内景区, 并将该用户已偏好景区去除, 用户 u 对剩余景区类型 y_i 的感兴趣程度公式如下:

$$q(u, i) = \sum_{v \in T(u, J) \setminus F(i)} \text{sim}_{uv} \times e_{vi} \quad (8)$$

式中, e_{vi} 与 $F(i)$ 分别为景区类型 y_i 受用

户 u 的偏好程度以及偏好景区类型 y_i 的全部用户集合, 且 e_{vi} 均为 1。依据用户对候选景区类型的偏好程度实现用户的个性化景区推荐。

三、仿真测试

为检测本文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有效性, 选取 CPU 为英特尔酷睿 i9 9900K, 内存与硬盘大小分别为 8G 以及 800G 的计算机, 利用 Myeclipse10 软件作为系统开发工具搭建本文系统, 选取 100 名用户作为景区个性化推荐系统测试对象。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荐景区至随机用户界面, 如图 3 所示。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系统可针对该用户偏好为用户推荐符合用户个性化的仙居风景区、屈家岭万亩桃园等景区, 有效验证系统景区个性化推荐有效性。



图 3 系统景区推荐界面图

受推荐用户对所推荐景区感兴趣概率为推荐准确率, 统计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推荐精度, 并将系统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比, 对比结果如图 4 所示。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推荐精度为 85.6%, 而多核学习系统以及支持向量机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推荐精度为 45.2% 以及 51.5%, 测试结果有效验证系统推荐精度明显高于另两种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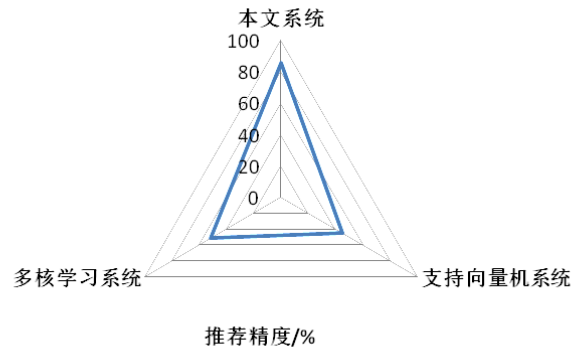


图 4 推荐精度对比图

统计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推荐查准率以及查全率, 并将系统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比, 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采用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查准率与查全率均高于 90%, 而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查准率与查全率均低于 80%, 系统的查准率与查全率明显高于另两种系统, 测试结果说明系统具有较高的推荐性能。

表 1 查准率与查全率对比

用户数量	本文系统 /%		支持向量机系统 /%		多核学习系统 /%	
	查准率	查全率	查准率	查全率	查准率	查全率
10	92.54	91.54	75.64	71.52	76.85	69.52
20	93.42	92.67	79.52	75.18	80.64	70.52
30	92.45	92.85	77.58	76.58	75.64	74.52
40	91.54	92.64	71.54	70.46	71.62	79.18
50	90.52	91.75	73.64	71.52	73.52	78.46
60	91.54	90.25	76.52	75.46	74.69	76.26
70	92.64	91.25	71.54	76.58	77.85	71.54
80	93.65	93.42	70.26	71.64	79.85	79.25
90	92.85	91.54	72.94	74.85	74.51	74.85
100	91.75	91.08	71.46	73.51	71.52	76.52

用户感兴趣景区被准确推荐的且采纳的概率为推荐召回率, 统计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召回率, 并将系统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比, 对比结果如图 5 所示。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采用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召回率高达

27.5%，而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召回率仅为 16.8% 以及 14.7%，系统的召回率分别高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 10.7% 以及 12.8%，测试结果有效验证系统的召回率明显高于另两种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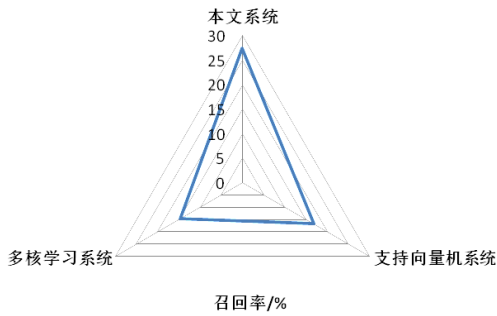


图5 召回率对比图

系统推荐用户景区的覆盖范围可采用覆盖率衡量，系统的覆盖率是景区项目以及用户评价系统推荐性能的重要指标，系统覆盖率需符合景区项目提供者要求，系统覆盖率较高时，用户选择性增加，系统容易受到更多人认可。统计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覆盖率，并将本文系统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比，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平均覆盖率为 60.5%，而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平均覆盖率仅为 48.5% 以及 39.4%。测试结果说明系统可有效解决部分系统存在仅针对热门景区推荐令系统产生局限性情况，再次验证系统景区推荐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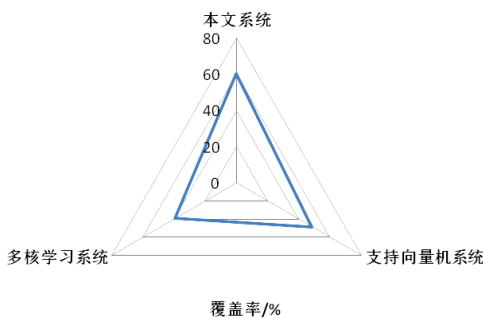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系统覆盖率对比图

景区推荐系统的多样性可提升用户忠诚度，系统推荐众多类型景区时更容易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多样性是评价景区推荐系统重要指标。统计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多样性，并将系统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比，对比结果如图 7 所示。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多样性为 72.6%，而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多样性仅为 51.9% 以及 43.9%，系统多样性明显高于另两种系统，说明系统所推荐景区具有丰富的类型，用户未局限于其中一类景区中，可满足用户对景区丰富性的个性化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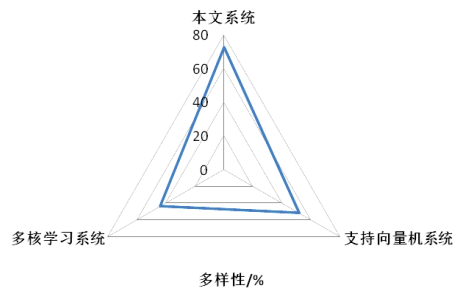


图7 多样性对比图

推荐系统的新颖程度可有效衡量系统推荐至用户景区项目的新颖程度，通过流行度指标衡量景区推荐系统新颖程度。统计系统对 100 名用户个性化推荐景区的流行度，并将系统与支持向量机系统以及多核学习系统对比，对比结果如图 8 所示。推荐系统流行度越小，表明其新颖程度越高，主要原因是景区项目流行程度高表明该景区项目新颖程度低。如图 8 所示，系统推荐景区流行度明显低于另两种系统，说明系统新颖程度明显高于另两种系统，系统可在保持景区多样性的同时保持较高的新颖度，验证本文系统具有较高的个性化推荐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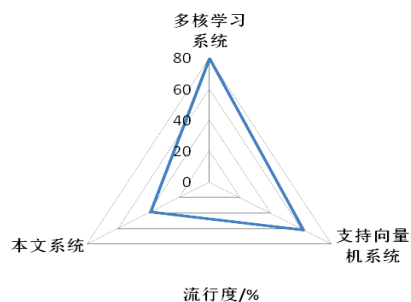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系统流行度对比图

四、结语

目前景区推荐网站数据量逐渐增加, 推荐算法性能极为重要, 研究系统所使用算法可有效提升景区推荐性能。系统可依据不同用户兴趣偏好推荐适合用户的个性化景区, 并通过仿真测试验证系统推荐性能, 该系统具有较高的推荐精准性以及全能型, 可应用于实际景区推荐中。

参考文献:

- [1] 刘涛, 刘佐. 一种面向新文章的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J]. 控制工程, 2018, 25(06): 999-1006.
- [2] 刘宇焜, 彭雪峰.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群的成人英语教学部分翻转研究[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1(02): 195-200.
- [3] 刘兵, 朱叶珊, 梁林. 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多元治理主体识别及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分析[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9, 36(08): 69-79, 127.
- [4] 薛婧媛, 游滨.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学术友好型内容策划及形式策划[J]. 编辑学报, 2019, 31(03): 313-315.
- [5] 姚凯, 涂平, 陈宇新, 等.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效果研究[J]. 管理科学, 2018, 31(5): 3-15.
- [6] 王征, 刘帅.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老年教师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06): 41-48.
- [7] 贾中浩, 古天龙, 宾辰忠. 智能系统学报, 2019, 14(03): 430-437.
- [8] 高慧艳. 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科普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9, 30(06): 621-628.
- [9] 李昆仑, 郭昌隆, 关立伟. 一种融合近邻用户影响力的矩阵分解推荐算法[J].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2018, 39(01): 37-41.
- [10] 匡海丽, 常亮, 等. 上下文感知旅游推荐系统研究综述[J]. 智能系统学报, 2019, 14(04): 611-618.
- [11] 王娟, 熊巍. 基于矩阵分解的最近邻推荐系统及其应用[J]. 统计与决策, 2019, 35(06): 17-20.
- [12] 张志鹏, 张尧, 任永功. 基于覆盖约简的个性化协同过滤推荐方法[J].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2019, 32(07): 607-614.
- [13] 周俊, 董晓蕾, 曹珍富. 推荐系统的隐私保护研究进展[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9, 56(10): 2033-2048.
- [14] 王璞珏, 刘红云. 让自适应测验更知人善选——基于推荐系统的选题策略[J]. 心理学报, 2019, 51(09): 1057-1067.

Design of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LEI Kewei¹, WANG Xiaohui²

(1. School of Leisure Management, Xi'an Eurasia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71012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recommendation effects of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of scenic spots caused by overloaded inform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the presentation layer, the business layer, and the data layer. Feature information and user behavior data are sent to the business layer.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module of the business layer uses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for scenic spots based on domain adaptation to train the target classifier through the auxiliary classifier, and it applies the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o the trained target. The classifier implements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sends the recommendation result to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face of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hrough the display module of the presentation lay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tests, the system can accurately recommend scenic spots to users through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with high coverage and diversity.

Key words: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ourist attraction; tourist attraction

■ 学科理论与实践

中国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助推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赵云洁

(许昌学院 图书馆,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和政策的吸引力,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产生的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强国之道。文学可影响民族的意识形态, 弘扬人性的光辉, 塑造人的思想品格, 影响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网络文学已是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 携带着中国元素和民族基因, 体现着中国精神, 彰显着中华文化软实力。网络文学助推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应对的策略是: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拓宽创作题材; 坚持本土化的市场定位, 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遵循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规律, 加强规范化管理。

关键词: 中国网络文学; 文化产业; 中华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2-QT003 (2022) 01-0082-06

中国网络文学的高速发展, 使阅读与写作这一行为方式从以往的精英阶层扩展到了普通民众, 促进了全民写作、全民阅读时代的来临。携带着中国基因、民族传统文化密码的网络文学一经在人民大众中流行开来, 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形成了一项成熟的文化产业, 不仅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养, 而且已传播到世界各国, 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秀范例, 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我国的战略目标

(一) “软实力”的概念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美国哈佛大学

约瑟夫·奈^[1]教授, 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他指出软实力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 以价值为核心, 以吸引力为手段, 以同化为目的的影响力, 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 与依靠威胁或报酬等产生的影响力不同,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可以通过这种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吸引他国, 进而同化他国, 以便达成本国的政治目的。

(二) “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习近平同志指出: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产生的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2]”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功能,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3]教授认为: “对一个国家来说, 文

收稿日期: 2021-12-28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2021年度调研课题“中国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助推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SKL-2021-537)

作者简介: 赵云洁, 女, 黑龙江伊春人, 许昌学院图书馆馆员,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研究。

化软实力的功能就是为国情把脉、为发展导航、使社会增强凝聚力，使民族提振精气神。文化软实力研究就是回答如何使这一功能发挥得更好。”文化软实力是汇聚了多种因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它不仅仅取决于文化发展的高度、创新的力度、传播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等社会诸多领域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社会诸领域的合力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石，文化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携带着现代元素的先进文化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前进方向，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

（三）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要求，强调“加强文化对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提出“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奋斗目标。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是为了通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推进我国优秀文化的创新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自觉为人类文明作新贡献，勇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义务，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

文化软实力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强国之道，是社会进步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必须大力建设。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文化渗透、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等手段，不断加强美国文化对全球的影响。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三大电视网的娱乐节目、时代华纳的流行音乐、迪士尼动画、迪士尼乐园、麦当劳快餐、西部牛仔

服饰等文化产品都具有十分强劲的影响力，令美国之风席卷全球。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征服领土、控制经济生活，而是为了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以此种手段向他国推行本国的强权政治。针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政策，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扶植本土的文化产业，以抵制美国的文化渗透，对此我们国家也积极行动起来，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

二、中国网络文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是宝贵的财富，不能让它长期处于休眠、沉寂、无人问津或孤芳自赏的状态，而应该妥善开发，综合利用，促进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一系列高瞻远瞩的、富有洞察力的国家战略部署和体制政策，采取倡导、约束、治理、实干、助推等有益的举措，卓有成效地将国家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对外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国家的民族气节、精神品格、政治面貌、文化品味和民心所向等等，从而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往来中最引人注目的名片，为国家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威望。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彭学明^[4]指出：“在文化强国和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过程中，文学也是一种树立信仰、塑造灵魂的事业。”中国网络文学通过“付费阅读”模式步入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凭借其体量巨大的用户群体，围绕核心内容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容量，拥有着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担当起了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任——网络文学通过拓展国际影响力逐步实现自身从文学事件、文化效应、产业经济到文化生态的积累成长，在传播中国文化、构建大国形象、推进文明互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5]。

三、中国网络文学助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 中国网络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

中国持续了40年的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政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们生活富足,生活目标由过去单一的追求温饱转为追求人生价值、信仰、娱乐及文化,特别是民众对文化的追求,迸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热情,这为网络文学提供了生根成长的土壤。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科技互联网普及到千家万户,上网人数逐年增多,文学网民的数量与日俱增,形成了互联网上全民写作、全民阅读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促成了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规模为100亿元^[6],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268.1亿元,同比增长24.5%……2020年网络文学平台加大重点作品的版权开发力度,一部网文同时跨类改编为多种体裁,并创新推出“短视频+阅读”的IP短剧模式,推动变现模式进一步多元化^[7]。

网络文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历经20余年的沉浮、磨砺,从当初的“野蛮生长”到近年来的精品频出、风靡全球,已经具有了令世界瞩目的规模,创作出了如《诛仙》《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赘婿》《庆余年》《陈情令》《楚乔传》《诡秘之主》等享誉海内外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以网络文学文本为源头,带动下游同主题的影视剧、游戏、动漫、有声书等泛娱乐领域的产业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孵化出了“阅文”“掌阅”“中文在线”等上市公司,这是网络文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网络文学领域结出的硕果。网络文学从“文化”走向“文化产业链”,进而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彰显出改革开放的创新活力之于新兴文化领域的磅礴力量,展示了强大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二) 中国网络文学携带着中国元素和民族基因体现着中国精神

中国网络文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沃土,诞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蕴含着普通人的情感体验,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了现实生活更多的能量、价值和意义,以独具特色的情调和魅力影响着文学发展的走向,丰富着文化库藏的品类。中国网络文学致力于中华优秀本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它种类繁多,现有玄幻、修仙、科幻、言情、军事、历史、穿越、现实、职场、青春校园、家庭伦理等种类,体现着网络文学宏阔而丰富的特征。它所细分的每一个类型都蕴含着中国数千年来文化体系的密码,以及丰富的东方文化元素——它不仅展示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诸子百家、明清小说、民国文学等熠熠生辉的中华文化,还让孔孟之道的精华、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更是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权谋推理等演绎得趣味横生,光芒四射。

走过了五千年风雨迷雾的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坎坷命运,所成就的辉煌成绩,在网络文学中都有体现——中国网络文学蕴含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贵和尚中、达观自信、求是务实、平等平均等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价值观,塑造了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坚韧不屈、蒸蒸日上、繁华富饶、雄壮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中国网络文学讲述的中国故事体现着中国精神,通过国际互联网辐射到全球各地,影响着亿万网文读者和网文IP改编作品的观众,使他们在获得网文娱乐快感(又称“爽文效应”)的同时,也能接收到网文中所传递的精神动力、灵魂抚慰、价值关怀,从而寻觅到生活参照、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操。如《陈情令》《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庆余年》等网文及其改编作品的影响力遍及全球,足以说明网络文学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和内在生命力。

(三) “网文出海”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

在当今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及文化国力的竞争中,流行文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软实力无处不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其流行文化承载着美国价值观行销各地^[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络文学的优秀作品传播到海外,以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和优异的市场业绩,

与美国的流行文化分庭抗礼，并跻身“世界四大文化奇观”之列，被业界公认为可与美国好莱坞电影、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相媲美，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流行于世界的先锋力量。

“网文出海”把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输送到了世界各国，重新向世界解读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文化产品和文化理念，让世界人民更真切、更直接地了解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文化内核及价值理念等等，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网文出海”成为我国向国际世界输出文化影响力的代表性符号，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合作，彰显了强大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四、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化发展助推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策略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宽网络文学创作题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认知世界的智慧结晶^[9]。价值观是文化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是生成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内涵，它蕴含在各种文化形式当中。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战略。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网络文学在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级文艺指导部门的引导下，拓宽了创作题材，不再局限于玄幻修仙类小说、穿越历史小说，而是出现了科幻小说、正面描写历史的小说及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如《欢乐颂》《战狼2》《朝阳警事》《当医生开了外挂》等，它们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创作使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多方面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强大力量。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网络文学加大了扶植力度，网络文学肩负着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任，更应该尊重社会公序良俗，注重对网民的教化功能。年轻一代的网民更倾向于在网文构建的故事中获得纯净、崇高、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等情感体验，所以，网文IP产业链开

发应着重关注网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主体价值认同，激发网民参与现实世界的热血；同时要加强现实题材的作品的创作力度，多创作反映社会现实、与主流价值观相呼应的作品，给网民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如《国家战疫》《一诺必达》《你好普通人》《武汉我为你加油》《武汉加油》《在 frontline 奋斗》《急诊科的夜班故事》《宅在家里的100天》等，这些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们所讲述的抗疫、医疗、信守承诺、援助社会、脱贫攻坚等中国故事，蕴含着奋斗、热血、奉献、勇敢无畏等中国精神和时代风尚，展现着中国的凝聚力，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这说明以社会现实为题材，体现主流价值观的网文作品，同样可以聚集大量的人气，成为网络文学当中的经典之作。

（二）坚持本土化的市场定位，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0]。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元素，具有能激发人们激情、渴望和梦想的力量。传统文化只有“活”起来，传播开来，才能展现生命力，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国家崛起的支撑实力。而“活”起来的文化也会融入到国民的文化素养当中，成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养料，并以此为基石，形成新的文化再生力，源源不息，长盛不衰，使文化精华得以延续、拓展、积蓄成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的古代神话、古典小说、历代民俗风情、典章制度等传统文化，早已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素材宝库，产出了许多优质的网络文学作品，例如《琅琊榜》这部网络小说就含有许多传统文化元素：雅致清幽的风景意象，不畏强权的民族大义，赤诚感人的家国情怀，荣辱与共、生死不弃的情义，崇高圣洁的操守……尤其是它所涉及的庙堂权谋文化、江湖市井文化、古代日常文化等，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该作品被拍成同名电视剧后，其艺术价值更上一层楼：在忠于原著的大前提下，巧妙地设置了部分故事情节，精心地塑造了人

物形象、性格,向观众呈现的影像、服饰、道具,人物的形态、语言、思想、信仰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美学元素,充分地展示了刚柔相济、美善并存的中华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三) 遵循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规律,加强规范化管理

网络文学20余年的成长历程及葳蕤生机,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版图。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提到“大力发展网络文艺”,网络文学是网络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政府、民间、资本三者正合力推进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推动网络文学从边缘化向主流化“进化”,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网络文学也肩负着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时代使命。然而网络文学自由化写作、零门槛发表的特征,一方面促成了网络文学百花齐放的盛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的局面,因此,国家相关的主管部门已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对网络文学创作实行规范化管理:

一是落实文学网站作者的实名注册、网站编辑及出版社单位署名等管理制度,以便于加强监管和责任追溯。二是培养一批业务能力强的网络文学编辑,对网络文学的题材、文字、主题加大监管力度,最大限度地净化网络环境,抑制网文创作低俗化、同质化现象,引导作者把握创作主旨,做好选题策划,协助作者选取素材、提炼主题,辅助作者创作出经典作品。三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育,引导网络文学创作、编辑、出版、传播等环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召集研讨会、设立培训班、吸收网文作者加入作协等方式,加强对网络文学从业者的思想道德建设,如2013年10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成立网络小说大学,莫言任名誉校长,成为国内首家培养网络小说原创作者的培训机构;同年10月31日,北京作协成立网络小说创作委员会;同年12月25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和盛大文学又联合创办了国内首个网络文学本科专业,这一行动引领

了国内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2014年1月7日,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带动了沪、粤、皖、川四省也相继成立了网络作协;2017年12月9日,中国网络作家村在杭州滨江区白马湖畔落地揭幕,吸引了众多知名网络作家入驻。这些举措在一度程度上培养造就了一批思想、业务、道德、水平高的网文名作家、名编辑,有助于网络文学产业的深入发展。

五、结语

中国网络文学以色彩纷呈的表现手法表现着人间百态,记录着社会进程,展示着时代风貌,满足着人们的精神诉求,在网络时代大放异彩:从当初的“野蛮生长”到近些年的精品频出、风靡全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现着强大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网络文学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该大力宣传我国的现代文化,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形象的现代元素,通过网络文学产业链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展现我国现代特色、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内核的优秀作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 [1]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M]. 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前言:2.
- [2]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8.
- [3]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要论选(第二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3.
- [4] 彭学明.文学怎样做好文化强国和国家软实力的基石[J].百家评论,2020(6):5.
- [5] 中国作家网.2019年度网络文学发展报告[EB/OL]. (2020-02-20)[2021-11-30].<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220/c404027-31595926.html>.
- [6] 《2017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发布[EB/OL]. (2017-04-25)[2021-11-30].<http://news.sina.com.cn/o/2017-04-25/doc-ifeypsra5553353.shtml>.
- [7] 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业研究基地.《2020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摘要版)[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6-10(008).

- [8] 沈壮海. 文化如何成为软实力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6: 113.
- [9] 瞿振元.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海峡两岸青年的共同价值追求 [J]. 重庆高教研究, 2016 (2) : 3-6.
- [10] 习近平.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N]. 人民日报, 2013-8-21 (01) .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ese Cyber Literature Boosting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ZHAO Yunjie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Soft power is the attractive force of a country's culture, politics and policies, and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is the cohesive force, life force, attractive force and influencing force of a country, generated from the country's culture. To increas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a country is the right way to strengthen its national power. Literature can influence the ideology of a nation, develop the brilliance of human nature, fashion the characters of readers, 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a society. Chinese cyber literature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since it is born with Chinese elements and national genetic factors, incarnating the Chinese spirit and representing the soft power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strategies for boosting the soft power of the Chinese culture: 1) develop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to widen creative themes, 2) insisting on the orientation of localized markets to innova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3)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the cyber literature industry to strengthen the regulated mana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yber-literature; cultural industry;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教育要闻

以教育数字化战略引领未来

——教育部举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启动仪式

3月28日，教育部举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启动仪式。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仪式并宣布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树深出席仪式并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主持仪式。

怀进鹏指出，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为总要求，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上线，是教育系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持续推进建设并充分运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将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有助于我们深刻思考新形势下“教育何为”的问题，有助于把数字资源的静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动能，有助于把制度优势和规模优势转化为教育发展的新优势，推动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

怀进鹏强调，要以平台开通为契机，紧紧抓住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机遇，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一要建立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平台，学生学习交流的平台、教师教书育人的平台，学校办学治校与合作交流的平台，教育提质增效和改革发展的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和教育现代化的平台。二要坚持优先服务师生和社会急需，支撑

抗疫大局。为抗疫一线师生打造一所永远在线的网上课堂，加强抗疫知识学习、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保障。三要坚持自立自强，强化效果导向、服务至上，引领教育变革。运用平台深化“双减”、赋能职教、创新高校教育改革、深化评价改革，突出效果导向，推进应用服务支持。四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共建共享。汇聚众力、广集众智，为各方协同发展、共建共享数字社会创造契机。五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合作，打造国家品牌。加强国际交流，探索数字治理方式，努力成为智慧教育的国际引领者，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启动仪式上，青岛市、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5个单位负责人作交流发言。启动仪式以视频形式举行，在教育部机关设主会场，在各省（区、市）教育部门、部直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部直属单位设分会场。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司局级联络员，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秘书局、教育部机关各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仪式。各省级教育部门、部直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部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仪式。

（来源：教育部）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围绕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和潜能， 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3月14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精神。会议重点传达了“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教育的工作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关于教育的内容。会议梳理了“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育的意见建议及媒体关注情况，对深入贯彻落实“两会”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指出，今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对于在新征程上凝聚奋斗力量、书写新的华章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五个必由之路”“五个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强调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强调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调贯彻依法治军战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过去一年我国发展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明确了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部署了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充分肯定2021年教育工作，围绕“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部署了2022年教育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国之大者”领悟到位，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学习贯彻“两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履行职责，切实把“两会”精神落到实处。

会议要求：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增强胸怀“国之大者”、善谋“党之大计”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意识、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局意识、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竞争意识，切实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

要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把关系民生的大事切实办好，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着力补齐教育短板，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进一步提高教育服务能力，有力服务制造强国战略、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双碳”目标。

要围绕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和潜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要围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防范风险、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教育事业发展的细化工分、抓好落实，毕力同心、苦干实干，进一步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要认真抓好建议提案办理答复，加强沟通、凝聚合力，结合工作、提高质量，持续推动教育领域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解决，使办理工作成为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美好期盼的重要渠道。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部党组成员，退出现职的部领导，秘书局、机关各司局和驻部纪检监察组副司级以上干部在主会场参会，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在分会场参会。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官网）

■ 高等教育动态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构建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新格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共修改了92处，教育部分的修改有10处，其他领域涉及教育方面的修改还有4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认真对比、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每一处修改，并用特殊的符号标注出涉及教育的内容。

“教育部分的修改是重中之重，这体现出党和国家将教育优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整个教育工作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周洪宇分析，“新时代，我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必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内容，就是教育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中，高等教育一共涉及6个方面——“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关于高等教育的任务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进一步体现了中央对高等教育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期待和重视。”周洪宇发现，这部分还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即“优化高等教育布局”。

为什么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周洪宇分析，当前，世界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能只停留在规模扩张上，而是要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设置和建设，要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等等。”他说。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重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层次类型与学科专业布局，另一个是空间区域布局。”周洪宇分析，在层次类型与学科专业布局方面，需要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探索建立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分类发展机制，引导高校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完善学科专业设置办法和程序。

近年来，中央提出要加强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等领域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支持行业特色院校发展。“高等教育要通过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提升教育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在周洪宇看来，“优化”包括了优化、调整、升级、换代、新建，要鼓励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适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新需求。

对于优化高等教育空间区域布局，周洪宇分析，长期以来因为我国东中西部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东高西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

“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推动教育协调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理念在教育中的体现。”周洪宇说，对于中西部教育的支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直接体现，即“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梳理近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洪宇说：“‘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这两句话几乎每年都会写入报告。这既体现了协调

发展理念，也体现了教育公平观。”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报告中有14处对教育内容直接或间接的修改，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国家对教育实实在在、真真切

切的重视。”作为人大代表，周洪宇反复翻看这份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激动地说，“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更有信心！”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03-13（01））

推动职业本科教育提质培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据报道，“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将遴选建设10所左右高水平职业本科教育示范学校。职业本科教育“是什么”“怎么办”“办成什么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自身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也应看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仍面临着吸引力不足、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数量不足等现实问题。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就业与教育需求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可以较好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并行、相互融通，进而改变“普教高、职教矮”，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办好职业本科教育，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教育选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千军万马”挤普通高考“独木桥”的现象。此外，培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有助于培养更多掌握复杂工艺操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更好满足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的需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学院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据悉，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现有32所，在校生12.9万人。《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切不可求快求全、仓促推进。科学设计、坚守定位、突出特色、确保质量，才能推动职业本科教育行稳致远。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首先应当明确职业本科教育“是什么”，厘清其与普通本科、职业专科的不同定位。在培养定位上，职业本科教育以培养联结研发环节与生产环节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在培养模式上，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贯穿培养全过程；在评价方式上，更加注重行业企业评价，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岗位适用度。同时，相比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并非只是延长了一年学制，应当更加适应职业岗位上移需要，更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复杂问题的综合解决能力以及技术创新思维的培养，突出技术技能的复合性。着眼长远，还要从理念与机制上，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发展路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办学体制，完善职业本科教育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引导职业本科学校坚持类型定位、突出自身特色。

今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攻坚克难的关键年。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中有进，力争让更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就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助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为高质量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

（来源：《人民日报》2022-03-28（05））

教育价值的三个层面

徐绪卿在《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撰文指出,教育价值的延伸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教育的国家价值、教育的社会价值和教育的学校价值。首先,任何教育都有自身的国家价值。“教随国定”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宗教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如果用来比喻教育的发展也完全适合。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教育价值凸显了国家对教育活动的目标设定要求。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基本问题。教育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为国家为民族发展服务的人才是教育最根本的职责。

教育的社会价值,是指教育对社会存在、延续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一些研究提出教育还应该“个人价值”,笔者认为这个也可以包含在教育社会价值以内,都是教育价值工具性的表现形式。受教育者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提高个体素养,掌握知识、技能,服务社会,获得自身的发展。

教育也体现了学校的价值。在教育系统中,由于人才培养的学段高低有别、类别不一,各级各类学校在遵循教育普遍规律的前提下,会

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目标,选择培养相关层次、相关专业的人才,形成自身的教育价值和培养特色,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获得学校自身的发展。并且,为了在教育市场中培育特色、获得优势,各学校个体也会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既符合教育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又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方向的教育的学校价值。

教育的国家价值、教育的社会价值和教育的学校价值是教育价值作用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教育的国家价值是教育价值最高层次,指导和规制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学校价值,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学校价值则是教育国家价值指导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们之间大多数时候应该是统一的,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正确处理国家、学校和个人利益以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关系。当代教育尤其需要满足社会教育需要和个人教育需要,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统一。教育应以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统一发展为不懈的追求和最高目标。当然,无论这三个层面的教育价值如何表达,它们与“对人和社会的意义或作用”教育价值的表达是统一的、相同的。